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陆定一推行「双百」方针始末

赵朴初在特殊岁月里

《遵义会议决议》是怎样起草的

最早的村委会诞生追记

「畏我论」及其演化

2009年第9期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北京）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访问团7月9日抵达台北机场时，受到中华伦理教育学会会长巴信诚、副会长兼秘书长席瑜等的热烈欢迎。

►《海峡两岸中华书画联合大展》在台北、高雄举行。
图为高雄的开幕式。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访问团

应邀赴台

(相关报道，见本刊29页)



► 张岂之拟词、刘文西书写的“天地和、人长久”横幅。

►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访问团全体成员在台北合影。



炎黄春秋

春 秋 笔

- 2 陆定一推行“双百”方针始末 陈清泉
9 赵朴初在特殊岁月里 汪东林
16 《遵义会议决议》到底是怎样起草的 何 方
20 陈铭枢与毛泽东的几次交往 孙琴安

陨 星 篇

- 24 洪湖赤卫队主角原型钱瑛 余 玮 巴 玖
30 成仿吾的“板斧”精神 谢尚品

时 代 风

- 34 最早的村委会诞生追记 徐 勇

亲 历 记

- 39 1948 年震惊上海的一·二九事件 蒋正禄
44 一个黄埔生的校园生活回忆 张慕飞口述
46 我在较场口救助李公朴 李祥凤

沉 思 录

- 48 讨回公道耗我 42 年时光 闫桂勋

赤 子 心

- 53 史学名家和爱国诗人连横先生 元 晴
54 从晚清举人到共产党员 王 勇

群 言 堂

- 56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李 凌
57 “肠梗阻” 杜导正

人 海 浪

- 58 “速成作文法”创始人的一生际遇 孙君仙

文 荟 苑

- 62 教师节忆名师 毅 生

九 州 景

- 66 才识绵山真面目 惠金义
68 张家口“大好河山”书撰者 杨继光 张恒宝

古 今 谈

- 70 “畏我论”及其演化 官伟勋
74 元朝的反贪诗和反贪谣 邱树森
76 李秀成:百万家财和百万大军的烟消云散... 魏文华

信 息 窗

- 29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访问团应邀赴台

顾问:

费孝通 程思远 胡 绳
陈 沂 杜润生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其庸 曲润海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学勤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 锲 张岂之
张国琦 欧远方 凌 云
曾彦修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社长(法定代表人):杜导正

副 社 长:

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刘家驹 舒元璋 吴 思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理事长:陈 渊

理事单位:

深圳市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581/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 1 号

邮编:100007

电话:64072452 84020890

美术设计\激光照排:

北京瑞和轩盛经济信息咨询中心
紫东图文设计工作室

印刷: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

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网上书店

网址:www.dragonsource.com

glb.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出版日期:每月 4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价:4.80 元

陆定一 推行“双百”方针始末

□ 陈清泉

在倡导和推行深受中国知识界欢迎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上，陆定一同志是有重要贡献的。

主张学术问题自由讨论

新中国建立后，陆定一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当时中宣部主管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科学、教育、文化、艺术等领域。如何发展中国的科学、教育、文化、艺术，这是陆定一经常思考的问题。特别是1956年，新中国进入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陆定一同志认为，中国有几百万爱国的知识分子，有先进的社会制度，中国的科学、教育、文化、艺术领域存在着加快发展的可能性，要使它成为现实，还必须加以正确的领导，实行有效的方针政策。

当时强调学习苏联，苏联确实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但也并非尽善尽美。陆定一对苏联一些做法曾产生过怀疑。他说：“1928年底到1930年夏天我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驻在莫斯科，开始还是感到苏联是相当民主的，许多问题一直传达到党的支部，让党员们讨论。后来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在哲学界就进行了一次大的斗争，被批判的是德波林。德波林是苏联老一代哲学家，是哲学界在革命胜利后唯一没有逃往国外的。斯大林当时为了批判他，派了几个人专跟他学习，学了以后就回过头来批判德波林，并用苏共中央决议的形式说他是孟什维克的唯心主义。唯心主义还是

世界观的范畴，戴上‘孟什维克’的帽子，就是政治问题了。在别的学科也有这种情况，比如在生物学界，树立李森科，就打倒摩尔根学派。甚至是工厂设计也只听‘权威’的，所以设计出来的厂房或机器都是千篇一律。这使我想起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时我怀疑这样的办法难道是社会主义的办法吗？我不相信社会主义对待科学和文化问题应当是这个样子。我们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又主管这方面的工作，因此就要多想一想这方面的问题。”

就在这前后发生了几件事情使陆定一深有感触。

一件是一位1925年入党的老同志，在苏联学了米丘林的遗传学，建国后是北京农业大学的主要负责人。他以粗暴的态度压制持摩尔根遗传学观点的教授，因此被调动工作到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但他的思想并未改变。有一次陆定一和他谈话，他仍贬低摩尔根学派是唯心主义的，因为摩尔根学派主张到细胞里去找“基因”，而基因是虚无缥缈的东西。他编中学生物教科书，不写“细胞”一课。陆定一看出他的门户之见。问他：“物理学找到物质的原子，后来又分裂原子，寻找出更小的电子、质子、中子，难道这也是唯心主义吗？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是可以无限分割的。摩尔根学派分裂细胞核，找出脱氧核糖核酸，这是极大的进步，是唯物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苏联以米丘林学派为权威，不许摩尔根学派存在，我们不要这样做，应该让两派平起平坐，各自拿出成绩来。这个同志照办

了。我国遗传学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另一件是一位担任卫生部副部长的老同志,他知道苏联的巴甫洛夫学说后,要改造中国的医学,对陆定一说:“中医是封建医,西医(以细胞病理学者魏尔啸的学说为主导)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陆定一想,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中医和西医都该反对,只靠巴甫洛夫的药(只有一种药,就是把兴奋剂和抑制剂混合起来,叫“巴甫洛夫液”)来包医百病,这会出大乱子。陆定一说:“中医和西医都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应该研究和发展,应当劝中西医合作。”这位同志没有坚持他的奇怪想法,后来他的工作也很有成绩。

再一件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要编写一部中国史教材,他们知道郭沫若和范文澜对古代史的分期看法不一致,这两位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究竟应采用谁的观点呢?他们拿不定主意,于是向中宣部请示。陆定一说:“这是学术问题,应当由地下发掘的资料,由专家研究来确定,中宣部不能拍这个板。”陆定一把这件事情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很风趣地回答说:“我同意你的意见,中宣部如果去管这些事,请马克思当部长,恩格斯当副部长,再请列宁也当副部长,也解决不了。”

这三件事情的解决,使陆定一感到学术问题应当放手让专家们自由讨论,才能繁荣、发展,支持一种观点,一个学派,压制另一种观点,另一个学派,必然会窒息生机,使学术界死气沉沉。

在此之前,“百花齐放”的口号已经提出来了。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有的文章说,1953年毛泽东说过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法要百家争鸣。但是50年代初这两个口号都是分别向一个领域提出的,而且“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并没有公开宣传过。

陆定一对这一问题十分用心,格外重视。在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他提出在学术、艺术、技术的发展上,我们不要做“盖子”。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



陆定一(摄于1994年)

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和纵容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发展严格区别开来),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决不要戴大帽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提高我国学术、艺术、技术的水平。为了发展自由讨论,又必须与党内党外各种各样的宗派主义门户之见进行适当的斗争。这是陆定一第一次公开阐明学术问题应当容许自由讨论的主张。

他向中央提出自己的这个观点,则是在这一年的4月。中共中央于4月27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陆定一在这次会议上作长篇发言。

陆定一说:“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来。这个问题从前我也不懂的,就是在那里瞎摸一顿,从实践中悟出来的。”

谈到生物学家胡先骕时，陆定一说，胡先骕的文章我看过，那时看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骂苏联，我们有气。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毛泽东插话：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吗？陆定一说，后来我们把这件事和缓了，报纸上没有点他的名，因此没有和他撕破脸。毛泽东插话：胡先骕那个文章对不对？陆定一说，他批评李森科的观点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康生插话，我问了一下于光远，他觉得胡先骕还是有道理的。胡先骕是反对李森科的。李森科说，从松树上长出一棵榆树来，这是辩证法的突变，松树可以变榆树（笑声），这是一种突变论。毛泽东问：能不能变？康生答：怎么能变呢？那棵松树上常常长榆树，是榆树掉下来的种子长出来的。这件事胡先骕反对是对的。

陆定一继续发言，他说：“知识分子会议开过以后，在一次宣传部长的会议上，各地的宣传部长都来了，我当时脑子里就有那么一种思想，我说，不能说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魏尔啸是资本主义医，中医是封建医，这是根本错误的。巴甫洛夫研究大脑皮层有成绩，但还未成为医学。在生物学方面，有的说摩尔根、孟德尔是资产阶级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这根本同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在物理学方面，不能说牛顿的物理学是封建的，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是资本主义的，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有人在实际研究问题时是唯物主义的，但他相信上帝，这完全是两回事。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社会进步只能帮助它发展，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它发展得快一些，在低级的社会，它发展得慢一些，但它自己的发展阶段不一定同社会的发展阶段一样。因此把那些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

“我再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苏联从前反对形式逻辑，说这是反对辩证法的，因而是资产阶级的（毛泽东插话：反了几十年，不要形式逻辑，后来学校又都教那个‘资产阶级’了）。后来又说数理逻辑是资产阶级的，现在又不反了，又不是资产阶级了。所以，这样乱套是不对的。

“还有一个同志也有他的套法。这个人在苏联学生物学，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当所长。要他搞多枝小麦，他说这是米丘林的，反对米丘林就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就是反革命。我说，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拿大帽子扣，可能会把我们的大科学家都搞掉。我们中国现在发展科学，向科学进军，他出来一个主张，把大帽子一扣，说某某学者或某某学派是资产阶级的，那个学科的发展就完蛋了。这样对我们的建设是很不利的。

“文艺问题也值得研究。文艺在苏联共产党内是干涉最多的一个部门，无数的清规戒律。最近开了一次会，我看了周扬的那篇文章，我说不不要搞反对公式主义这样的事。应当引导他，让他学习，光反对不行。公式主义、自然主义，这都是艺术性质的问题。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进步的文艺方向，但人家写点自然主义的作品有什么关系！他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在写作上不可以写几篇自然主义的东西？

“还有，要写新人物。写新人物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过去写老人物写得生动活泼，现在写新人物写得不生动活泼。可是，为什么只能写新人物呢？写一写老人物也可以么。我说那个旧社会写一写好得很。如果现在有人能把上海30年代社会的变化写出来，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说，好极了。（毛泽东插话：《乌鸦与麻雀》是部很好的电影，那是写上海新四军还没有进城的前夜，我们电影局就是不许它上演，这两天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见识见识，这是中国一篇很好的历史）。”

陆定一的这个发言虽然没有提出“百家争鸣”这个词语，但他主张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要让知识分子自由讨论，不赞成支持一个学派、反对另一个学派，实际上就是开展“百家争鸣”。

第二天，即4月28日，毛泽东作总结发言，在第五点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多。

详尽、透彻阐述“双百”方针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正式宣布中共中央确定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广大知识分子热烈欢迎。这个方针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将如何贯彻执行？知识界都切盼党中央能够作出说明。这个使命就历史地落在陆定一肩上。

应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的邀请，陆定一于1956年5月2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对一批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他谈了三个问题：一、为什么提出这样的政策，为什么现在才着重提出这样的政策；二、加强团结；三、批评问题和学习问题。

陆定一说：“我国要富强，除了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发展经济、发展教育事业，还必须使文学艺术和科学教育工作得到繁荣发展，缺少这一条是不行的。

“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拿眼前的例子来说，就是戏剧。几年以前，还有人反对京戏。那时党决定在戏剧方面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政策，现在大家都看到，这个政策是正确的，收到了巨大的效果。由于有了各剧种的自由竞赛和互相观摩，戏剧的进步就很快。在科学工作方面，我们也有历史经验。我国在二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学术方面曾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成了我国过去历史上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我国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讨论，那么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滞。反过来说，有了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春秋战国时代同现在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当时，社会是动乱的，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是自发的而没有有意识的统一领导，现在却是人民自己打出了自由的天地，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建立起来而且巩固起来了，人民要求科学工作的迅速发展，因而自觉地对科学工作进行全盘的规划，并采取‘百家争鸣’政策来促进学术工作的发展。

“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中共中央曾经指示，必须坚决反对阻碍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的思想。……必须坚持这样的原则：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以‘权威’自居压制批评，或者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熟视无睹，采取自由主义甚至投降主义的态度，都是不对的。同时，中共中央又指示，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这就是说，应当提倡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尖锐的学术论争。批评和讨论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应

同的，当时，社会是动乱的，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是自发的而没有有意识的统一领导，现在却是人民自己打出了自由的天地，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建立起来而且巩固起来了，人民要求科学工作的迅速发展，因而自觉地对科学工作进行全盘的规划，并采取‘百家争鸣’政策来促进学术工作的发展。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图为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怀仁堂报告会上作的报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当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评。应当容许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于在学术问题上犯了错误的人，经过批评和讨论后，如果不愿意发表文章检讨自己的错误，不一定要他写检讨文章。在学术界，对于某一个学术问题已经做了结论之后，如果又发生不同的意见，仍然容许讨论。”

“自然科学包括医学在内，是没有阶级性的。在某一种医学学说上、生物学或者其他自然科学的学说上，贴上什么‘封建’、‘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类的阶级标签，都是错误的”。

谈到批评和学习问题时，陆定一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有批评的自由和反批评的自由。对敌人的批评，可以是打击式的，‘一棍子打死’；在人民内部，必须是善意的同志式的批评。攀登科学和艺术的高峰是很困难的，要独立思考，进行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第一，单是知识不足，有时就会使人作出错误的判断；第二，本来是正确的东西夸张了，看得太绝对了，也会犯错误。正如列宁说过：‘只要向前再走一小步——看来仿佛依然是向同一方面前进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第三，在认识发展的过程中，思想的僵化，孤立、片面地看问题，会引导到唯心主义的错误。对于犯错误的人，应该积极帮助他改正错误。受到批评的人也根本不用害怕。”

陆定一代表党中央所作的这个报告，在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两天后，他在与部分省市宣传部长座谈时，又以鲜明的态度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战线要摆脱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走出一条党管理科学文化事业的新路来。这个观点受到许多人赞同。

50年代中国共产党有些重要举措，都向苏共中央通报。陆定一曾经和于光远到苏联大使馆告诉尤金大使关于“双百”方针的事。没有想到尤金虽然答应要转告苏共中共，却又对此不感兴趣，他拿出列宁的一篇文章要陆定一看，实际上是反对这个方针。回来时在汽车上，陆定一感慨地对于光远说：“苏联的教条主义真是厉

害。”

身体力行贯彻“双百”方针

陆定一在贯彻“双百”方针上身体力行。他总希望局面能够打开，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能够迅速发展。他找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同志，要他同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商量，就遗传学问题开展学术讨论。经过磋商，确定于1956年8月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

遗传学分为两个学派：孟德尔——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李森科学派。一般认为，在孟德尔遗传学定律被埋没了35年之后，于1900年被再发现以来，遗传学才开始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遗传学的研究已经从细胞水平进入到大分子水平，不仅理论被科学界所公认，应用方面也逐步被医学和农学的实践所证明。但是30年代到50年代，由于李森科得到苏共中央和斯大林及以后的赫鲁晓夫的信任，他所代表的“米丘林生物学”被苏共中央和学术行政方面封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真正的科学”；而孟德尔——摩尔根奠基的遗传学却遭到强烈的政治批判，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伪科学”的帽子。1949年以后，中国在“学习苏联”的强有力的号召下，李森科学派的一套也搬了过来，持摩尔根学派观点的中国遗传学家，大多数被停止了教学和研究工作，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文章。但是由于李森科这一派在学术上的不严谨，特别是在农业实践上的无效，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公开批判李森科学术观点。我国持摩尔根遗传学观点的生物学家们的意见也逐渐公开化。两派科学家们的种种意见，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陆定一对此尤为重视。这就是召开这次遗传学座谈会的背景。

这次会议认真贯彻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和陆定一上述报告的指导原则，遗传学中两个学派以及生物科学、农业科学的专家4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胡先骕、武兆发、乐天宇、谈家桢都出席了。陆定一特地对米丘林——李森科学派的乐天宇（乐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说：

“你要同摩尔根学派的谈家桢教授平起平坐，不能压人一头。”

会议主持人强调自由争辩和根据科学研究成果，实事求是地进行讨论。大家就遗传学的物质基础、遗传与环境、遗传与个体发育、遗传与系统发育四个问题进行系统讨论，然后再就今后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交换意见。

座谈会正式摘掉了过去强加给两派的各种政治标签，使尖锐对立的两派能心平气和地进行学术论争。会议没有作出任何学术结论，但建议主管部门采取措施改变只许一家独鸣的局面，这就使多年受压的摩尔根学派遗传学家也一样享有教学、研究和出版著作的权利。会上还散发了中宣部科学处整理的有关李森科事件来龙去脉的背景材料，使与会者特别是领导干部了解苏联历史上以政治干涉遗传学学术问题的错误事实和后果，吸取我国从建国以来在学习苏联方面照搬苏联错误做法的教训。

这年10月20日，中宣部邀请党内外科学家和学术、艺术工作者60余人举行座谈会，会上陆定一根据中央意图，就进一步贯彻“百家争鸣”方针、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问题，提出五点意见：

一、有准备有步骤地在高等学校开设资产阶级学说课程。凡是重要的学说，有人教又有书的，都可以逐步地有准备地开课。

二、请各国（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流学者来我国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可以请。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当然要请，唯心主义的也可以请。我国科学要在12年左右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首先就要向人家学一学。

三、关于出席各种国际学术会议，要分别轻重缓急，尽可能出席。同时请科学院考虑是否中国也召集一些国际学术会议。

四、关于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既要讲正面，也要讲反面。社会主义运动常常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只讲正确路线，不讲不正确路线，就没有对比，不容易了解，就会陷入背诵教条的情况。

五、讲历史，也要讲正面和反面。不但要出版孙中山选集和孙中山全集，也要出版蒋介石

选集和蒋介石全集。讲太平天国，就要讲曾国藩。讲国际问题，也要讲希特勒。反动的书不公开出卖，可以放在图书馆供人研究。

陆定一说，上述这些办法都是为了反对教条主义，刺激学术的发展，以便有可能在12年左右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事物的发展常常会出现反复。被称为“百家争鸣”的好开端、好典型的遗传学座谈会，不久就受到一股逆流的冲击，反右和“拔白旗”后，1960年全国高校普遍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摩尔根遗传学再度受批受压，批判方式仍是贴政治标签的那一套。陆定一在1960年10月的各省市文教书记会议上，1961年1月全国高等学校工作会议上，明确批评了再次对摩尔根遗传学搞政治批判的错误，从而制止了这一反复的进一步扩大。

于光远、李佩珊、黄青禾、黄舜娥四同志在陆定一逝世周年时写的一篇文章说：“遗传学的争论问题作为历史的一页已经被翻了过去，不过每当重温遗传学在中国曲折的发展历程，以及‘百家争鸣’方针在促进当代中国科学繁荣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时，陆定一在政策指导上极其重要的作用，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陆定一在倡导、推行“双百”方针中的功绩是不可泯灭的。

“百家争鸣”悄然无声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宣布“双百”方针是党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以后，艺术界、科学界甚为活跃，不少问题在进行讨论，如哲学方面有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经济学方面有美国经济危机和批判人民资本主义；历史学方面有中国农民战争问题等。报纸上的学术论文也增多了，学术空气浓了。

但是好景不长，就在毛泽东宣布中国共产党实行“双百”方针的时候，“双百”方针的贯彻已经隐伏着危机。党中央从未宣布停止执行这个方针，但是由于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因而影响到“百家争鸣”方针的执行。

赵朴初在特殊岁月里

□ 汪东林

初识赵朴初

60年代初，我作为一名二十出头的大学毕业生，跨进了全国政协机关的大门，在工作组（即今日之专门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而我初识赵朴初，则是在政协宗教组的一次座谈会上。

这次座谈会是赵朴初主持的。当时的宗教组组长达浦生经常不到会，赵朴初是副组长中实际主持日常工作的。出席这次座谈会的有巨赞（佛教法师）、陈樱宁（道教协会会长）、皮漱石（天主教主教）、阎迦勒（基督教牧师）等人。赵朴初居士其时已年过半百，但皮肤白皙，脸色红润，且慈眉善目，笑容可掬，看上去不过四十多岁，很是健康。因此，我的同事告诉我，赵朴初先生有心脏病，我都不大相信。

喜饶嘉措已八旬高龄，但身体健朗，着一身紫红色藏袍，那一把雪白的美髯正显示着他老而弥坚的神态。由于不通汉语，他还随身带了翻译。这位学位高、名望大的藏传佛教佛学大师在国民党时代，曾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解放后历任西北大区民委副主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等职，著述等身。在这次座谈会上，喜饶嘉措一开始就向主持人赵朴初示意，他要求发言。赵朴初请喜饶嘉措大师发表意见，大师立即通过翻译，滔滔不绝地说：

“我这个人说话不会拐弯抹角，因为我没有顾虑。我是佛门弟子，佛教是我的生命，我个人没有其他私念。因为佛门弟子也是国民，所以我爱教，也爱国；又因为现在的国是共产党领导

的，所以我也爱共产党。1949年以前，国民党、蒋介石待我不薄，让我到南京当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每月给我500元大洋的津贴，还经常送零花钱。国民党败退，蒋介石要我去台湾，我没有去，留在大陆。因为我知道，国民党政权外靠帝国主义，对内欺压各族人民，这个政权丧失民心，没有希望……

“我今天本着爱教爱国的愿望，想说一些心里话，有可能听起来刺耳，但忠言逆耳是古训，希望有关当局正确领会我的本意！我要说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成绩有目共睹，国威世界瞩目，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不是一党一派之功，更不是一人之功。再一点是近几年来，领导党和国家失误频频，有些做法太失人心，十分危险！共产党本有‘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但这几年来只实行一半，那就是只有批评，没有自我批评，只能批评别人，不能批评自己……

“把我这个人划为什么派是次要问题，不是左派，是中间派，还是右派？都可以的。我所求的是把各项工作真正搞好，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宗教信仰政策贯彻好，就比什么都强。共产党、人民政府在藏区搞民主改革，平息叛乱，反对分裂，这些都是为了国家、民族，也是为了藏族人民好，这些我明白，我赞同。问题是对若干事情步子迈得太快，急躁，盲目，想在几年内完成几十年、几百年、几代人努力才能完成的事，主观愿望是好的，但事实上不能成功。最可气的是，明明有了问题，已经出现了差错，却硬是看不见，或者装做看不见，自己不承认，甚至把错说成对，或者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

“有些稀奇古怪的说法，我就不能赞同。什么‘好心办坏事’、‘好人办坏事’、‘坏人办坏事’，等等。照我的看法，好事就是好事，坏事就是坏事，不管是谁干的，好与坏，善与恶，一定要分得一清二楚，不能含糊其词，模棱两可。也不能因为是好人干的，坏事也成了好事；或者因

为是好人干的，错了也不纠正，不批评。更不能根据某个人的喜怒好恶来判断是非曲直，那样非出偏差不可。我是怀疑，中央是否了解下边的真实情况……

“我一开头就说了，我说话没有顾虑，言重而心诚。我是人民代表，又是佛教协会会长。如果我知情而不讲真话，偏偏去讲一套假话，专门报喜不报忧，那我就有愧于人民的信任，有愧于作为佛门弟子对事实的虔诚而不移！我的话如有错误，我个人负责！”

喜饶嘉措大师的长篇发言，使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时针已指向中午12点。作为会议主持人的赵朴初，笑容可掬地征求其他人的意见。大家讲完后，赵朴初缓慢而响亮地说：

“今天的会开得好，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对于各位委员在会上所发表的意见、建议，本组将负责通过政协向中央有关方面反映，请各位放心。”

赵朴初没有在最后总结发言时点到喜饶嘉措的颇为“刺耳”的讲话，这给我初识赵朴初先生时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因为那时的各种会议，尽管已经比较放开，但人们仍然余悸未除，对于一些“右”的言论保持着“警惕”，特别是主持人，总要讲一点诸如“某某发表了一些个人的意见，一家之言，大家还可以讨论”，或者说“某某今天发表了意见，涉及面广，份量不轻，各位还可在会后掂量掂量，下次再发表高见”，等



赵朴初在政协会上发言(1996年)

等。当时我虽然刚离开大学校门，但经历过1957年的“反右派”，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脑子里还紧紧地守着“阶级斗争”那根弦，对于喜饶嘉措的言论，心里认为很“右”，因此我颇惊讶赵朴初为何对大师的发言没有直接表态。

因为是我第一次参加会议记录，散会后赵朴初向我走来，办公室的老同志为我引见，他即和蔼可亲地同我握手，要我整理会议记录，写份简报；还问我家乡哪里，毕业于哪个学校？听我答毕业于复旦大学时，他即改口讲上海话：“都是南方人！依在太湖那一边，我在太湖这一边（安徽省太湖县）；上海又同是你我的第二故乡！”一位知名人士、长者，对我这样一位初出茅庐的小青年，竟这样的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实在出乎我的意外！我紧紧握着他的手，答不上一句话。随后，他再一次关照我和办公室的同志，整理小组会的记录要力求全面、准确，送他过目后再视情况编写简报向上反映，但没有专门点出喜饶嘉措的发言。

当时全国政协的机构设置，是九个工作组（即专门委员会），但只有一个办公室，因此一个工作秘书常常交叉具体分管两个或几个工作组的秘书（含记录、简报、会务）工作。我是刚到任的大学毕业生，正充当实习生的角色，只要忙得过来，几乎有会必去。这次宗教组的座谈会记录，即由我整理，第二天直接送到赵朴初的家中。赵老住在北京西城和平门内的小宅院里，他那时刚从西四大拐棒胡同旧宅搬来不久。以后四十年间，赵朴老由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而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直至病逝，就再也没有搬过家。尽管院子小，房间少，且十分陈旧，有关部门曾数次催请搬迁新居，都被赵朴老婉言谢绝了。赵

朴老当时细细看完我整理的记录稿，改了几处，并以商量的口吻同我讲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改。到这时他才点出，简报内容的重点要反映喜饶嘉措大师的发言，因为内容重要。当然，他还讲了一些鼓励我的话。赵朴老平易、谦和的印象，一下子铭刻在我的心中。

赵朴初与梁漱溟

我在全国政协工作组（专委会）办公室工作不久，即调到当时工作更加繁忙的学习委员会办公室任学习秘书，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的工作何以繁忙？那是因为60年代，学委会的工作直接关系到非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近200人的经常性的思想改造工作，这在当时是统一战线范围内的头等重要的任务。因此在全国政协学委会之下，八个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都设立了分会和办公室，此外还有数十名无党派或无所属的非中共全国政协委员专门成立了一个政协直属学习小组，由政协学委会直接领导，办公室派学习秘书具体负责会务、记录和简报工作，我是这个学习组的工作秘书之一，自1963年开始，至70年代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结束了近20年的学习改造工作为止，我都没有离开这个岗位。十分巧合的是，赵朴初同志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是政协直属学习组的召集人（即组长）之一。另两位召集人也是全国政协常委，是无党派人士，一位是于树德，时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副主任；一位是王芸生，原大公报社的社长兼总编辑。在这个学习小组里，有许多知名人士，如马寅初、梁漱溟、巨赞、皮漱石、阎迦勒、向达（历史学家）、翁独健（民族学家）、董竹君（上海锦江饭店老板）、唐生明（唐生智之弟）、赵君迈（赵恒惕之弟）以及后来陆续入组的程思远、杜聿明、范汉杰、宋希濂、沈醉、爱新觉罗·溥仪、爱新觉罗·溥杰等等，其中最突出的人物是梁漱溟。

我这里所说的突出，并非指知名度，而是指梁漱溟先生在1963年至1978年的15年间，实际上是政协直属小组大批判的“活靶子”，详情我在拙作《梁漱溟问答录》（1988年出版）和《梁漱溟与毛泽东》（1989年出版）两书中作了记

述。概括起来，最集中的批判有三次：一是1965年“科学道德之事”（梁漱溟语），梁先生明确反对以“阶级斗争”来解释新中国15年来成就之取得；二是1974年江青之流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先生拍案而起，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百分之一百否定的“批孔”，也不理解“批林”竟能与“批孔”联系在一起；三是1978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梁先生几次长篇发言，探讨“文革”发生的原因，严词要求彻底否定“文革”。梁先生上述三次受批判，基本场所都在政协直属学习组，有时扩大到有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学习组成员参加的700人左右的联组批判会。但所有这些批判都是在政协内部进行的，当时的报刊未作过只字报道。笔者是参加了全过程的政协机关工作人员，即该学习组的工作秘书，因而在80年代之后陆陆续续披露了上述材料，并结合材料对梁先生进行了长期采访，最后出版了上述两本书，让世人了解此公案，这是后话。

赵朴初先生是这15年学习改造工作和批判梁漱溟运动的亲身经历者之一，而且是该学习组四位召集人当中的一位（于、王、赵之后，1974年后又增加了程思远先生为召集人）。那么，赵朴初先生对待梁漱溟先生的批判，持什么态度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还得概括地交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即在一条“左”的错误路线和指导思想的影响下，政协的内部学习改造和大批判运动与社会上政治运动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在方式上稍为温和些，比如也带帽子，打棍子，抓辫子，但没有体罚，最多是被某某人勒令站起来，但超不出一分钟，召集人又会招呼被批判人坐下，并强调要“摆事实，讲道理”，包括梁漱溟先生，虽然他早已被多次称为“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是“难得的‘反面教员’”，但在学习组内也没有受过体罚。实际上呢，尽管人人表态，与梁某人划清界限，但大多数人是违心之言，“口非心是”。敢出来公开为梁漱溟辩护者没有，但私下议论梁某人是“硬骨头”者大有人在。在每次大批判刚开始时，常常有一轰而上、挨个发言的场面，但不用多久就接不上气，有的人就在会下有意无意地为梁解脱，要求尽

快结束批判,转入正规学习,大可不必为梁一人而耽误了大家的学习时间,等等。在这样的大环境、大背景下,赵朴初先生当然也发过言,也“批判”过梁漱溟先生。然而我作为亲身经历者之一,觉得中国的这段历史,光看会议发言是不行的,它的面貌常常藏在会外。赵朴初先生其时之对待梁漱溟先生,也要从这个角度予以仔细观察。

从1963年起,梁漱溟先生坚持出席政协直属学习组的每周二次或三次的学习活动,但赵朴初先生则因工作繁忙或健康原因常常请假,大体上每周出席一次,平常的学习会前期主要由于树德、王芸生主持,后期则由程思远主持。梁这个人自称“面冷”,实际是很少与人交往,当然也不排除别人远离这个挂牌的“反面教员”的因素。在这个组经常到会的20名左右的成员中,真正能称得上与梁漱溟先生有交往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于树德,他与梁是交往半个世纪的朋友,虽然时断时续,但从年轻时代就相知相识了,加之同在政协这个组,于老与梁老同庚,是该组最年长者,而于老是全组公认的谦谦长者,“大事不糊涂”,对当时那一套“左”的东西,他是奉命维持,刚接火就朝天放枪,打了几枪就主张尽快熄火。梁和于心肚明白,自然说话、交往多了一些。另一个就是赵朴初,他与梁的交往,则是因为佛教文化的情结。我到这个组任小组秘书不久,有一天梁先生在散会后即走过来对我说:“今天赵朴老没有来,这是我向他借的两本佛经,请您替我还给他,也可以下次开会他来时再给他,免得我带来又带回。”我一看是每本两册的线装刻本,立即接过来:“您放心,我负责转交,负责保管。”梁先生笑着问我:“你对佛经有兴趣吗?有兴趣也可以看看,这两本书好。”我点头回答:“我恐怕看不懂。”他笑了。回办公室后,给赵朴老打电话,他立即答复,不急,先放在办公室,什么时候还都可以,有便再转交。自此,前后二十年时间,除去“文革”停止学习五年,我做这种梁与赵之间互借互还书籍(多是佛经)的事已记不清多少次了,往宽里说,每月总有一次吧。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互借互还书籍的事,有时甚至在批梁会议期间,也没有

停止过。1974年3、4月间,“批林批孔”运动已开始了一段时间,全组成员差不多都发言表态,“拥护”这场运动,惟独梁漱溟迟迟不说话,实际上他一直在家中准备着长篇发言,因为内容与时的运动顶牛,他一直在考虑是否全盘推出。当然,他最后终于和盘托出,引经据典讲了两个半天,共八个小时。其中第一个半天他引了一句毛泽东主席的话,他说:记得毛主席讲过,自孔夫子至孙中山,我们都要研究,这话就不是全盘否定孔子的意思,但我对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查了一次毛选却没有查着,不知出自哪篇文章,不过记忆中肯定是有的。这话一般人听着就过去了,没想到次日,即梁漱溟第二个半天讲话之前,赵朴老召我过去,交给我一个纸条,说:“你把这张纸条交给梁老。昨天回家我查了毛选,梁先生昨天讲的没有找到出处的毛主席语录,我给他找到了。”纸条上写着毛选第几卷第几页,题目:《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内容:“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梁漱溟接此条后深表谢意,但他在发言时并未再次选读这条语录。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许多事不可明言,只可意会,这件事就是一桩例证。

在粉粹“四人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赵朴初与梁漱溟的交往自然增多,但由于年高,更多的仍在思想文化的深交上。1985年,我写的《梁漱溟问答录》开始在北京《人物》杂志上连载。第一章刊出,梁老就嘱我,如刊物有富余,可每期送一本给赵朴老阅看,我照办了。1986年全书15万字结集准备出版,我请赵朴老题写书名,写了信并同时寄去刚出版的拙作《宋希濂今昔录》(此书由屈武先生题写书名),请他审看。1987年1月5日,他给我复信说:“大著《宋希濂今昔录》,已读了一遍。首先应向你祝贺,写得十分生动而又令人感到真实,确是一部成功之作。过去在会上听他(指宋)说话,觉得很豪爽,不过是泛泛的印象。读了传记后,对宋希濂其人,加深了认识。”并说:“你托我题写《梁漱溟问答录》书签之事,我立即照办了,早已寄去,不知收到没有?如没有,我还可以重

写。”《梁漱溟问答录》因故拖到1988年才正式出版,其时95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已重病住入协和医院。我手捧新书登门见赵朴老,他欣然与我长谈。他拿着《梁漱溟问答录》边翻边对我说:“你又做了一件好事。梁漱溟先生的一生,不简单呵。你的书特别留下了他在解放后四十年的许多珍贵资料,有意义呵,你是有心之人,能随时注意积累资料,值得我学习,我这人做了什么事,做过去就放在一边,时间一久也就忘了。梁老和我是一代人,与你之间的交往,可以称忘年之交了。此话自古有之,可见交朋友是不分年龄的。”他的一席话,说得我脸红,我就有意把话扯开,对他说:“我正运用《梁漱溟问答录》里的部分材料,并补充有关资料,以第三人称撰写《梁漱溟与毛泽东》的长文,以此文为书名并牵头,结集出版我近十年写的中短篇人物传记集,已与吉林出版社签约,计划明年出版,希望你再给题写个书名。”赵朴老当场击掌说:“好,好,我马上就写。”他当即伏案铺纸,我事出意外,也起身过去,见他信笔写下:“梁漱溟与毛泽东”,一连写了两张。然后说:“好,又是一件好事。”这一天赵朴老特别高兴,写完又同我谈起梁的为人。他举着毛笔,叫我:“你过来,我给你写几个字,再给你解释。”我又走过去,见他写下“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他解释说:梁老这个人,从表面上看,他总是很严肃,少见笑容;但一同他接触,就会感觉到他的内心是温暖的,有一团火。梁老的人格力量,除了有中国儒家的传统,还有佛家的

影响,这一点你有没有想到过?我连连称是,并说他茹素70多年,青年时曾潜研佛学,几度想出家未成。赵朴老听到此即打断我的话头,说:“你说的是他早年,那么晚年呢?你问过他老人家了吗?我再给你讲一段先生在几年前的事。80年代中期,中国佛教协会准备成立佛教文化研究所,由我出面,在广济寺素宴若干位佛学专家。与会者数梁老年龄最高,治佛学历史最早。大家都恳请他指点,他一开头就说:“许多人知道我治儒学,曾为儒学的复兴鼓与呼,但他们不知道,在我本身自度,我实际上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研读佛学远在研读儒学之前,并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是一名佛教徒,直至年过九旬的今天。因此对于研究佛教文化,成立佛教文化研究所,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他的发言博得与会者的欢迎。1989年我的第四本书《梁漱溟与毛泽东》出版,梁老已逝世一年。当我把这本27万字的书送去,登门拜访时,赵朴初又抚看着书,颇为动情地说:“梁老没有能看到这本书,可惜了。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虽有争执,但他们是相识相知的老朋友,这已载上历史,你的书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话声刚落,我又提出新的要求。我说:“梁老1988年6月病逝前,对他的后事没有任何遗言。山东邹平县是梁先生30年代搞乡村建设的实验县,前后有十年时间,在梁先生的一生中是件大事。现在邹平县政府通过县政协提出,要在当地的名胜黄山上找块地方作墓,埋葬梁老骨灰,并立一墓碑,逐步建成

一个墓地碑林,此事已得到梁先生家属的同意,都认为这是对梁先生的一种纪念方式,给后人留点思念。我受邹平县政协和梁先生家属的委托,请您开个头,为梁老题写墓碑。先立了墓碑,有了墓地,再陆续向梁老的亲朋好友和学生、敬慕者征字,逐步建碑林。不知朴老认为妥当否?”赵朴老听完我的话,几乎未加思索就欣然同意,说:“好事,又是一件好事。梁先生是中国文化名人,新华社发表的悼词生平里这样称呼他,当之无愧。梁先生的学问和人品,有许多地方受到当



赵朴初副主席(中)、丁克训副主席(左)和本文作者在一起
(1997年)

代人敬仰,也值得后人学习。我现在就写。”朴老是书法大家,但平时较少写大字。当我手捧赵朴初先生写就的“梁漱溟先生之墓”的大字时,我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负责以最快的速度送到邹平去。”不久,邹平县立碑后还专门拍了照片寄来,由我转送给赵朴老一张。自此,费孝通、启功、吴祖光等文化名人,都陆续为梁漱溟先生的邹平墓地碑林题词。

慷慨陈词 赞扬天安门诗抄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病逝,9日清晨广播这个噩耗,惊动了亿万中国百姓,政协直属学习组的老人们自然不能例外。9日上午正好是学习组学习的时间,9时前学习组成员都纷纷提前到会,召集人赵朴初、于树德、王芸生、程思远商定,学习会从即日起,暂时中止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实为稍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学习内容,改为悼念周恩来总理,并告我和另一位小组秘书向学习办公室报告,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自此至1月下旬,全组二十余人几乎人人发言,声泪俱下,追思自己与周恩来总理的接触,称颂周恩来于党于国的功绩,与此同时,天安门广场已出现过花圈和悼念周总理的诗词。三个月后的1976年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又掀起高潮,其锋芒明眼人都感觉得到是指向作恶多端的江青“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其时,政协直属学习组的老人们自然非常关切这桩大事,但鉴于年高和其他原因,他们多数人并没有直接参与,只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有的人按捺不住,让儿孙带他们到天安门广场看过那花圈和诗词成山、人群似海的壮观场面。据我所知,赵朴初同志居家离天安门广场不甚远,但其间并未直接去过,只是赵朴老是诗词大家,又感于失去周总理的举世同悲,自1976年1月中旬至4月上旬,他自己所写的悼念周总理的诗词有据可查,而由他看过甚至修改过的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诗词,则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至于这些写诗的熟悉的或不熟悉的朋友有没有把诗词贴到天安门广场上,他的确不得而知。谁能料想到,这些光明正

大之举,不几天就成了被追查的“罪名”?

1976年4月7日,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政协直属学习组的老人们再一次被局面的骤变弄得目瞪口呆。但学习会还得照常进行,同全国亿万同胞一样,人人都得对“天安门事件”表态,真心也好,违心也好,反正谁都不得置身度外,都得表白几句“拥护”的话。学习内容已不必躲躲闪闪,而是堂而皇之地推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其中最让老人们头疼的是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一是什么是“反革命政治谣言”不明确,不具体,但份量极重,谁也不敢胡乱揭发;二是谁第一个说出听到过什么“反革命政治谣言”,紧跟着就得说出“谣言”的源头,是谁传播给你的,在场的人都有谁,你有没有再向他人扩散,等等。老于世故的政协直属组的老人们自然不会自己给自己找麻烦,都无例外地表态自己耳目闭塞,从未听说过什么“反革命政治谣言”。学习会因此出现冷场,大家相对无语,召集人别无他法,只得转入关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在学习会上大段大段地宣读两报一刊上的大文章。但是,身居领导地位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机关的军代表难以向上级亦即是“中央文革”首长作交代,便进一步具体提出从天安门广场的政治诗词入手,追查后台,刨根问底,兴许可以挖出“大人物”来。但政协直属组的老人们依旧众口一词,表示没有参与过天安门广场政治诗词之事,自然只管自己,不保他人,也没有揭发他人。然而军代表领导的招术是有目标的,这个目标就是诗词大家赵朴初先生。军代表不仅通过当时的政协和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临时学习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在清查动员会上大讲什么“政协和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成员中多是高级知识分子,不少人精通中国古典诗词”,而且不惜派人登门找一些上层人士“了解情况”,“随便问问”,赵朴初先生即在其中。我清楚地记得,赵朴老在此期间身体不好,心情极坏,在这位笃信佛教的居士和处世待人称得上是谦谦君子的人身上,竟失去了笑口常开的音貌,连脾气也变得急躁起来。他经常因病

请假，每周3—4次的学习会最多只能出席1次，有时竟半月出席一次，而且在会上一言不发。一直到了1976年6月上旬的一次学习会上，赵朴初先生才主动提出，他要在会上郑重讲几句话，主持会议的于树德立即同意。赵朴老以其少见的严肃的口吻提高嗓音在会上说：

“各位委员，各位同仁，这些天来我一直有几句话想说一说。众所周知，读古典诗词，写古典诗词，是我个人的一大爱好。我大半生写过许多诗词，有的发表，有的留着，有的写完不满意就扔。我可以坦率地讲，写个人的诗词，关于周总理的诗词是写得最多的一个，无论是总理生前，还是身后，我都写得不少。那是因为我同全国人民一样，敬重他对党和国家作出的重大贡献，敬佩他对人民群众的无限功德和他本人的高尚品格！在他生前，我写他的诗词常常寄给他本人，或寄给邓颖超大姐转交；在他病逝后，我写的诗词，凡自己满意的都寄给了邓大姐。我同样可以坦率地讲，在周总理去世之后，不仅我自己撰写悼念周总理的诗词，而且还看过甚至修改过不少别人写的悼念周总理的诗词。那也是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都热爱周总理，心心相通之故，并没有什么深不可测的背景，更没有什么可调查、可责难之处！我自己写的诗词，你们可以向邓大姐调查去；我看过或修改过的别人写的悼念周总理的诗词，对不起，太多了，记不住了，但我可以负责任地答复，内容肯定都是一片赤心敬爱周总理，缅怀周总理，没有任何政治问题！我的这些话，在这里公开发表，也是对直接受派来访者的回答。我的态度是认真的，郑重其事的！”

赵朴老的慷慨陈辞，语中带气，但句句都是心里话，也是一篇铿锵有力的公开宣言。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父母之丧三年，而周总理的病逝留在我心里的忆念是永久的，周总理身上值得后人怀念的事情实在太多了！”粉碎“四人帮”之后，1977年1月，周总理去世周年祭，他写了《金缕曲》，曾被文艺界人士以多种艺术形式演唱，广泛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哀思和缅怀。1986年1月，周总理去世10年祭，他又谱写了散曲《折桂令》，在公开场合朗读，并不

止一次地一句句吟诵给来客聆听：

十年前情景难忘，望不尽梨花，遮断红墙。泪雨迷天，哀歌动地。国瘁人亡。喜今日平生愿偿，遍神州翥龙翔。引领风长，一瓣心香，祭告忠良。

为了印证赵朴初先生在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发生时的心态，特别是在这场大风大浪中所表现出来的凛然正气和铮铮铁骨，我恭录现任民进中央副主席、楚图南之子楚庄先生珍藏的赵朴老一首词，该词作于1976年，书法写于1978年。不久前楚庄在赵朴初先生追思会上公布了这首词，全文如下：

“春寒料峭欺灯暗，听风听雨过夜半。门前锦瑟起清商，陡地丝繁兼絮乱。人间自古多恩怨，休遣芳心轻易换。等闲漫道送春归，流水落花红不断。

芳心一词寄调木兰花。 1976年作。楚庄同志两正。 1978年8月赵朴初”

楚庄先生在追思会上解释说，“春寒料峭”指春天，也指政治空气寒冷。“欺灯暗”也指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当天晚上，扫荡天安门广场之前，把灯都灭了。“听风听雨过夜半”，是指清明节那天的半夜。“门前锦瑟起清商”，是指多日来天安门前多少学子、多少群众在那里悼念周总理。“陡地丝繁兼絮乱”，意指一阵狂风把天安门前扫荡了。楚庄说，这首词的前半段是用文学的语言记录了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至于词的后半段，不用一句句作解释，都能读懂，这是作者当时对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评价和展望。

凡是同赵朴老接触过的人，第一个感觉就是他的慈眉善目，他的一团和气，他的彬彬有礼。谁能想到他的内心竟是一团火，深藏着一把明辨大是大非的尺子，如果我们把这首词同赵朴老当时在政协直属学习组的慷慨陈辞加以对照，那么就更能完整地认识到，在那段“史无前例”的特殊岁月里，赵朴初先生的言行是多么令人肃然起敬了！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

（责任编辑 程 度）

《遵义会议决议》 到底是怎样起草的

□ 何 方

《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是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军事路线的第一次全面批判,也是对中国革命战争中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思想的第一次系统论述。它在党的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一直得到公认的。但是长期以来却没有人提到它的起草者是谁,甚至曾误传为毛泽东。建国后编《毛泽东选集》时,有人提出将此文收入,遭到毛泽东本人的反对,说那是张闻天起草的。但此说一直没有向外公布。第一次公布这一重要史实的,是1979年8月25日张闻天追悼会上的悼词。但悼词中同时指出,这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起草的。这一点,在悼词的原稿中并没有,是送审过程中修改时加上的。从此这便似乎成为定论,有关党史的著述和许多领导人的回忆录也都遵守这一口径。

关于《决议》系张闻天起草,已被此后发现的陈云在遵义会议开过不久的《传达提纲》所证实,并为史学界公认,已经没有争议。但是《决议》的起草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却由于缺乏证据仍然是个没有解决的问题。80年代初编辑《张闻天选集》,在为收入《决议》作题解时就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得到的解释是:第一,张闻天不懂军事,自认外行;第二,《决议》反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初始表述。所以在1985年出版的《张闻天选集》有关题

解中就作了这样的处理:“受会议委托,在会议讨论的基础上,特别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起草了这个决议”。同悼词稍为不同的是,这里加上了“在会议讨论的基础上”这句重要的话。

对悼词的提法后来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把“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变为“根据毛泽东发言”。例如伍修权1982年在《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一文中的说法就是:“会议后期,委托张闻天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精神,起草了……”,《毛泽东传》也说,“遵照会议的决定,洛甫(即张闻天)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这就是说,《决议》的起草不但是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而且这样做还是会议的“决定”。再后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也进一步发挥了原先的观点,说成是“张闻天同志根据毛主席发言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

据此,其他许多谈到这个问题的文章和书籍,大多要加上决议是根据毛泽东意见或发言起草的话。似乎这已经是定论。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只下断语不讲根据的结论,是很难令人信服的。细加考究,就会发现这一说法存在很多问题,实在说不大通。

首先,这一说法是前后自相矛盾的。《毛泽东传》在作出“遵照会议的决定,洛甫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的结论之前,对会前准备作了这



张闻天(刘英提供)

样的描述：“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会上“由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左’倾军事路线”。从这一看来可能比较合乎实际的叙述中，是得不出“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决议”这一结论的。证之以后发现的陈云在遵义会议闭幕后所作的《传达提纲》，其中提到“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按照文意顺序，只能是洛甫的提纲和毛王的意见。杨尚昆在《回忆张闻天》一文中的描述就更具体：“我清楚地记得，遵义会议上的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是闻天同志作的。他作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也确实是张闻天保持了一辈子的习惯作法；重要发言和报告都有一个详细的书面提纲）。既然如此，张闻天受委托起草会议决议，为什么要撇开“经过共同讨论”、代表三人“联合发言”、且为与会者“完全同意”的“报告提纲”，而只“根据毛泽东的

发言内容起草”呢？这无论如何也说不通。而且陈云的《传达提纲》也只是说会议“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并没有说会议“决定”要“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如果会议真有这个意向，那为什么不指定毛泽东自己起草呢？这样的作法在遵义会议后和延安整风前也并不是少见的。总之，根据毛泽东发言起草决议之说，有悖常理，不可能合乎事实。还是《张闻天传》作者程中原同志的说法比较合理，显得真实：“在遵义会议以后，张闻天是以他作‘反报告’的提纲为基础，依据会议讨论中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及其他同志的发言形成的意见，在行军路上，写成《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献的。”

其次，长征一开始，张闻天就同毛泽东接近起来，一路行军又走在一起，不但经常议论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而且如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期间写的《反省笔记》中所说，还“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周恩来1944年11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也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可见，毛泽东的意见，会前已多次讨论和交换过，张闻天也早已了解，无须只等这次会议上的发言。而且根据张闻天的习惯和他们之间的一贯作法，张闻天根据“经过共同讨论”写出的“反报告”提纲，必定给毛、王看过，他们有什么意见也一定会提出，并且作了反复磋商和再修改，最后才能成为代表三个人的“联合发言”。由此可以断定，毛泽东在张闻天作了“反报告”（也是他们的“联合发言”）之后的发言，既不会同张相互重复，也不能相互矛盾，而只能是表示同意和支持，然后作些补充，或对某些问题加以强调、发挥和提高。根据这样一个发言是无法起草出会议决议的，而且会议也不会作出根据一个人的发言起草决议的“决定”。如果现在通行的这种说法属实，而毛泽东的发言又确像一些人描写的那样全面系统，甚至说成“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见《遵义会议文献》一书130页），那就只能是：或者毛的发言和共同商定的《反报告》基本重复；或者毛在事前酝酿中没有把大部分意见和盘托出而要留作自己发言。但是按理，这两种情

况都不会发生,因此根据毛泽东发言起草决议的说法也难以成立。

还应提到的是,在政治局最后审查通过《遵义会议决议》的同时,还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布了一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据一些研究者的分析考证,这个《决议大纲》可能就是张闻天会前起草的那个提纲,经本人略加修改使之成为传达和贯彻遵义会议精神的中央书记处文件,和《决议》的内容只是详简之分,也不是另起炉灶(见《长征大事典》对这一问题的综述)。而且反报告提纲是在会上得到“完全同意”的,从法理和情理讲,起草决议都只能以它为蓝本,再吸收会上毛、王、周等人发言中的一些意见。而对于起草者张闻天来说,这样做不但是顺理成章和执行会上的决定,而且也比较容易完成任务。因为从遵义会议结束到决议的写成和通过,紧打满算只有20天左右。这期间,红军一直处于行军作战的流动状态,张闻天除必须随军行动外,还得经常(几乎每天)先是参加后是主持中央的会议,为书记处起草和签发一些重要的文件电报。

另外,张闻天终其一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坚持独立思考,不肯人云亦云。胡乔木在《回忆张闻天同志》一文中就说:“综观张闻天同志一生,我觉得,敢于独立思考,敢于独立地系统提出和坚持自己的政治见解和理论见解,这是他的品质高尚之处。”张闻天几十年的经历表明,他所写的文章和发表的意见,总要出于自己认为成熟的考虑(被迫的交代和检讨、反省除外),即使贯彻上面指示或吸取别人意见,也要自己融会贯通,决不生吞活剥。例如他无论在东北做地方工作还是后来进入外交战线,在向下面传达中央会议时,都是要综合会议精神并结合所在地区或单位的实际进行传达,如同布置工作一样,从不照本宣科地只念几个领导人的讲话记录。为此,下面曾提过不少意见。特别是50年代后半期在外交部,大家都想知道领导同志特别是毛主席具体说了些什么,要求很强烈。他这才接受大家的意见,大约从1958年开始宣读毛泽东的一些讲话,但往往还要加上自己的理解(他以前那种传达方式,也是1959年批判他的一项内容)。在毛泽东

的威望如日中天时,他尚且如此,设想在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才被大家推举为政治局常委,地位还在原有常委张闻天自己和周恩来之后,要张闻天不依大家同意的报告提纲而根据毛泽东的发言起草决议,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而且,张闻天受委托起草决议,主要还是由于他本身的条件,即不仅因为他当时在中央仅居博古之下的地位和公认的较高思想理论水平,更重要的还是他作的“反报告”和提出的提纲为会议定下了基调,得到会议“完全同意”,可以作为起草决议的基础,也表明他已和“左”倾中央及其路线宣告决裂,站到了正确路线方面。据研究张闻天的专家张培森、程中原等同志研究考证,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的转变、能够站出来作“反报告”和受委托起草决议,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自身的思想基础。张闻天原本就同王明等人的思想观点有差别,进入苏区参加实际工作后又逐渐觉悟,越来越多地批评一些极左政策。特别是福建事变和广昌战役后,他已同博古、李德的领导和指挥直接进行斗争了。进苏区两年,一直处于战争环境,整天接触和谈论的都是军队和打仗。他又是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委员,要经常参加军事问题的讨论。形势也在迫使他军事问题进行学习、思考和研究,因此不能说张闻天完全不懂军事。长征前他写的一些文章就是证明,如《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等,都直接谈到军事问题,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的几种表现,提出了若干正确思想观点。《遵义会议决议》不但反映了这些观点,还采用了很多表达这些观点的用语。这也证明,张闻天起草决议是以他的“反报告”提纲为基础的。

最后需要提出的是,关于《遵义会议决议》的起草,至今还没见到毛泽东、张闻天等直接当事人的说法。如果决议确系根据毛泽东的发言起草,那么基于决议在党史和毛泽东思想形成上的重要地位,在建国后编《毛选》时大概是会收进去的,毛泽东也不一定会反对。收入《毛选》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一节《中国社会》,就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毛泽东修改的(见《毛泽东选集》该文的题记),至于作为附录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更不用说了。另外,据《胡乔木

回忆毛泽东》一书透露,毛泽东著《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大部分就是李富春写的。类似情况在中共其他领导人之间也是有的。例如1945年11月的《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即著名的陈、高、洛电报,署名是陈云、高岗、洛甫,起草人是张闻天,1983年陈云在世时就已收入《陈云文选》。因此决议如果确系根据毛泽东发言起草,按理张闻天是会在《反省笔记》或其他谈到遵义会议的发言中作点说明的,但事实上却只字未提。周恩来、陈云,也都没讲过决议的起草问题,如果会议真有根据毛发言起草的“决定”,他们理应是会提到的。胡乔木虽然是党史方面的主要权威,他去世后还被人称为“中共党史研究和编纂的开拓者”,但他终究不是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他对遵义会议决议的起草问题虽说了结论性的话,却未明确说明其出处和根据,党史研究工作者对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存疑,便是正常的事了。

拨乱反正和批判“两个凡是”以后,不是一再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吗?这当然也适用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总不能说其中不包括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等人的贡献。那为什么在初步总结第二次国内战争经验的时候,已经站到了正确路线方面的张闻天就不能有其贡献呢?《遵义会议决议》的起草者张闻天也只能“根据毛泽东发言”而没有了自已的思想呢?

根据以上分析,关于《遵义会议决议》是根据毛泽东发言起草的说法,可以推论为人云亦云。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既非事实又悖逻辑的提法的出现呢?看来,需要我们遵循历史的足迹,探察一个问题的来龙去脉。遵义会议是中共党史上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重大贡献是不容置疑的。特别是后来,毛泽东同志作为党内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引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因而从延安整风起,对遵义会议就形成了一个根本论断,即会议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举行的,又在会上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从而,使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样一些事实,即在遵义会议上从组织上讲,毛泽东只是被补选为政治局常委,会后分工

毛还是另一常委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到陕北后毛头两年也仍然是分工主管军事,后来又加上统战;而遵义会议上推举和确定代替博古总书记职务、长期主持中央工作和召开中央会议的却是张闻天。这些情况,过去党史著作从来不作说明,人们也就无从知道。张闻天这一时期的贡献,也有意无意地被淡化,甚至被淹没了。所以在纪念张闻天诞辰85周年前夕,1985年6月22日,王震就曾向邓力群同志书面提出,“请你、乔木、胡绳同志考虑,能在修改党史时,将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特别是长征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史实载入史册。……许多同志似不知道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多年这一历史事实。历史要真实。”杨尚昆在1997年3月22日一次谈话中也说,“看来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可惜“文化大革命”以后,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虽然公布了《遵义会议决议》为张闻天起草的事实,但是笔者认为遗憾的是又留了一个尾巴,说决议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的。

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谈到1945年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决议“对毛主席过分突出。虽然以他为代表,但其他人很少提到”。后来胡乔木在1985年写的《回忆张闻天同志》一文(见《胡乔木文集》)中,又说:“现在回想起来,整风运动中对他(按:指张闻天)的批评也有些过头的地方……至于他在遵义会议前后在党的历史上所作的重要贡献之受到抹杀,就更加不公正了。”这些话无疑是正确的,这些话由胡乔木这样一位中共党史的权威说出来,更是难能可贵的。遗憾的是胡乔木同志没有来得及把批评张闻天“过头的地方”,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后在党的历史上所作的重要贡献之受到抹杀”的地方,展开来记叙,或许包括张闻天关于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及作遵义会议决议报告之类的问题吧!

党史研究只能贯彻执行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则是,非则非,不能溢美,不能隐恶。对于党史上的问题,凡违背实事求是的论断都应该允许辨析和订正。

(责任编辑 洛松)

陈铭枢与毛泽东 的几次交往

□ 孙琴安

陈铭枢将军字真如，广东合浦人，生于1889年。他是国民党陆军上将，在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与张发奎所率的第十二师，是北伐战争中主力之主力，世称“铁军”，曾参加过攻占湘南、衡阳、长沙、岳州、汀泗桥、贺胜桥、汉口、武昌、马回岭等许多重大战役。攻占武昌后，他曾任武汉卫戍总司令、第十一军军长，后又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等职。

陈铭枢奉命“围剿”朱、毛红军

1931年，陈铭枢去日本小住，回国后不久，蒋介石即邀他聚谈。当时广东反蒋呼声甚高，而江西朱、毛红军也在扩展势力，早就成了蒋介石的心病。他想利用陈铭枢在南方的声望和军事才能，到江西重领十九路军，既“围剿”朱、毛红军，又可对广东造成威胁。他坦率地对陈铭枢说：“共匪不是短期所能消灭的，到进剿一定阶段时，就要你担负起打回广东的任务。”

陈铭枢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随后就着手准备去江西指挥军事的事宜。在他临出发到江西的前一天晚上，蒋介石又电邀他到自己的官邸单独谈话，对他说：“革命大业的创造，还很艰难，北洋军阀虽然被打倒，赤祸又来，而我们党内各地同志，又各怀异心，隐患重重，现在又临到多难的时候了。”

同年7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率30万大军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三次“围剿”，而陈铭枢则被任命为右路军总司令。

毛泽东早就知道陈铭枢善于打仗，与朱德很重视这次反“围剿”的指挥，对蒋介石、陈铭枢的军情都作了了解和侦察。以后，他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一个月后，蒋介石亲自出马统率30万军队，要最后消灭‘赤匪’。协助他的有他最得力的将领陈铭枢、何应钦、朱绍良，每人负责一路大军。”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红军大学所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中还说：

第三次“围剿”的情况是：（一）蒋介石亲身出马任总司令，下分左右中三路总司令。中路何应钦，与蒋同驻南昌；右路陈铭枢，驻吉安；左路朱绍良，驻南丰。……

由于毛泽东对对方的军情了解得比较详细，又采取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而陈铭枢名义上统帅不少部队，如卫立煌、上官云相、郝梦龄、赵观涛等部都由他节制，但其中多属蒋介石嫡系，他很难指挥得动，再加上蒋介石到“围剿”后期，又急于想夺回由汪精卫、陈济棠统治的广东，要他率十九路军作前锋向广东进发，搞得他很不满意，于是在高兴圩与红军决战了3天后，就结束了这次“围剿”的军事行动。

“九一八”后，陈铭枢 开始与朱、毛秘密交往

此次“围剿”刚一结束，“九·一八事变”发生，从此，陈铭枢便竭力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

日。1933年5月,当他游历欧洲抵达香港后,就派梅龚彬等人到上海与中共接头,并写信给黄琪翔,要他积极配合,就近搞好联络工作。与此同时,他又派陈公培去福州,同蔡廷锴等研究与红军联系的问题,并写了一封亲笔信,派陈公培为代表,带此信由延平西南地区进入苏区,表示和谈愿望,主张双方先行停止战争行动,共同抗日。彭德怀等在8月初会见了陈公培,从此闽北地区出现缓和转机。

陈铭枢知道了这些情况后,非常高兴,特意去电,希望十九路军方面再直接派代表,到江西瑞金去会见中央红军领导人。随后,他又亲自来到福州,布置陈公培与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一起去瑞金。到了瑞金后,毛泽东、朱德等人会见了他们两人。他们将陈铭枢的意见告诉了毛泽东与朱德。双方经过具体商谈,在边界划分、物资交换等方面取得一致意见。毛泽东、朱德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赞同和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上进行合作。

同年10月26日,在陈铭枢、蔡廷锴、蒋光

鼐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苏维埃政府及红军签署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协定中说:

双方为挽救中国民族之垂亡,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之阴谋,并实现苏维埃政府及红军屡次宣言,准备进行反日反蒋的军事同盟。

陈铭枢等反蒋抗日 朱毛两次联名致电声援

然而,就当陈铭枢等派代表去瑞金秘密会见毛泽东等,又积极准备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在11月20日上午9时在福州南校场举行“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时,南京国民党当晚召开384次中政会,议请国民政府严厉处置“闽变”。

当毛泽东得知蒋介石将派重兵入闽讨伐陈铭枢等人时,立刻与朱德联名致电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与十九路军,郑重指出:

在这危险面前的任何消极与迟疑不决,对于中国革命是极大的罪恶。我们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准备在任何时候,同你们联合,同你们订立作战的军事协定,以反对与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

但是,此时陈铭枢等对毛泽东、朱德的建议看法不一致,因此没有实行这项建议。

11月21日,陈铭枢与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人联名通电,宣告自11月20日起脱离国民党。

11月22日上午,陈铭枢、李济深等宣告“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陈铭枢任文化委员会主席兼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世称“福建事变”。

“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马上在12月内调兵遣将,讨伐陈铭枢等,并从“围剿”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中抽调了一部分兵力,进军福建。



陈铭枢

毛泽东闻知后，竭力主张利用这一机会，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蒋军重地，并可援助福建“人民革命政府”。

但是，党中央领导层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却拒绝了毛泽东的主张，他们怕丢掉中央苏区，不敢实行打向蒋军后方的战略进攻方针，并以为陈铭枢等人所搞的“福建事变”只不过是“反革命派别骗人的把戏”。

然而，毛泽东却不以为然。1934年1月13日，他又与朱德联名致电陈铭枢等人组成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向他们提出了六项建议，其中包括应该立即实践人民民主权利、武装群众、赞助群众组织反日反蒋团体、采取反日反蒋与红军一致的军事行动等。可惜没过多久，“福建事变”即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下失败，陈铭枢只得逃亡香港，后又流亡欧洲、苏联，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后，他才返回祖国，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参，积极从事抗日民主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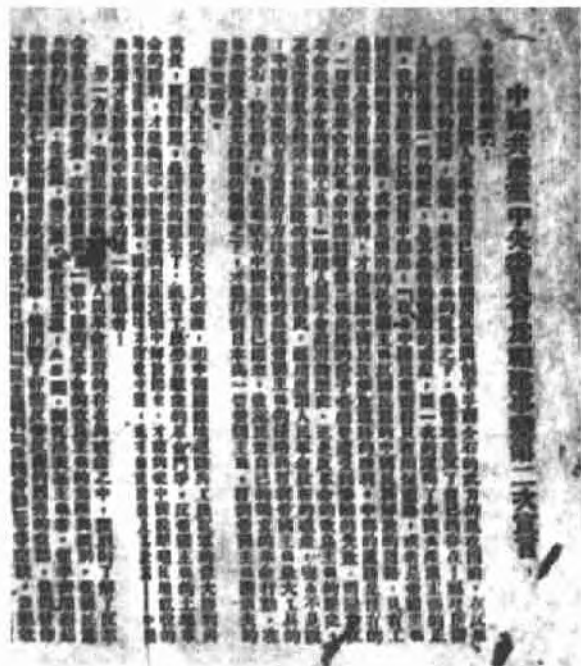
陈铭枢对毛泽东说： 这次和谈是不会成功的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时成为全国瞩目的大事。那时陈铭枢正在重庆。当毛泽东8月28日乘飞机抵达九龙坡机场时，陈铭枢也去机场迎接，并与毛泽东握手寒暄。

8月30日，陈铭枢又来到桂园，与张澜、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柳亚子等一起，同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广泛交谈。当毛泽东问及陈铭枢对这次和谈的看法时，陈铭枢因与蒋介石交往多年，深知其为人，所以十分明确地对毛泽东说：“我认为这次和谈是不会成功的。”

过了几天，毛泽东邀请李宗仁、白崇禧的老朋友刘仲容来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当时毛泽东对他说：“全国人民希望和平，希望谈得成，通过谈判实现和平。也有朋友认为谈不成，因为蒋介石完全靠不住。”

刘仲容说：“蒋介石是个不讲信义的人。我



图为1934年1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在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发布的“为福建事变第二次宣言”

也认为谈不成。即使谈成了，达成了协议，他也不会遵守。”

“你是跟陈铭枢将军、跟爱国侨领陈嘉庚一派，是认为谈不成的。”毛泽东接着说：“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国共两党坐下来谈判这件事，说明蒋介石无法将我们吃掉，而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存在，说明历史进步了。”

1947年底，陈铭枢再度来到香港，与李济深、何香凝等筹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于1948年1月1日宣告成立，陈铭枢任中央常委委员。

毛泽东建议： 陈铭枢可任农林部长

1949年秋，陈铭枢来到北平，又与毛泽东相逢，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9月23日，毛泽东设宴招待程潜、傅作义等原国民党起义将领，陈铭枢也应邀作陪。

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1950年2月3日，毛泽东就有关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陈铭枢等人的任职问题，亲自给刘少奇打了份电报，电文云：

少奇同志：

我们意见，刘斐宜任水利部长，而不宜在章伯钧领导下任交通部长，贺耀组可任交通部长，陈铭枢可任农林部长。唐生智黄琪翔可以分任湘粤两省副主席。

毛泽东

二月三日上午四时

这样，在毛泽东的建议下，4月1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陈铭枢就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长。

毛泽东读陈铭枢论佛法书

由于陈铭枢早年曾入佛门，学佛念经，对佛教甚有研究，在1950年他曾就论佛法问题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并附上了自己在这方面所写的一本书。毛泽东当时因工作繁忙，未及时回复，直到6月12日，才略读了一下他寄来的论佛法书，并回信道：

真如先生：

尊著略读，未能详研，不敢提出意见。惟觉其中若干观点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时再与先生商略。存放甚久，迟复为歉。敬颂

健吉

毛泽东

六月十二日

陈铭枢就批判梁漱溟 向毛泽东提问

过了3年——1953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扩大会议和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与梁漱溟发生了争执，特别是9月18日那天的会上，两个人争得很厉害，相持不下，会场上的人都要叫梁漱溟下台，不让他再讲下去，就连坐在主席台上的李济深、张澜也很尴

尬，难以表态。这时，惟有陈铭枢一个人在会场上突然站起来，大声问毛泽东：“现在看来，梁漱溟的问题是很严重了。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不明确，要请示主席。”

经他这一说，全会场顿时鸦雀无声，都把目光集中到他身上，就连毛泽东也凝神静听。

“那就是——”陈铭枢十分清楚地说：“梁漱溟的错误究竟是政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如果是政治问题，那就是革命与反革命之分，应该用别的办法解决，而不必在此多费唇舌；如果是思想问题，那就可以另当别论，采取耐心的教育、批判的办法，使他逐渐醒悟，而不必操之过急，如何？请主席指示。”

陈铭枢话音刚落，人们便不约而同地把目光又集中于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

毛泽东意识到：他必须要对陈铭枢的这一提问作出反应；他略加沉思了一会，然后从容地回答说：“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公开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但没有发现他暗中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发现他与美帝国主义和台湾有什么联系，因此他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因此我仍提出保留他当政协委员的资格。对于他的反动思想，不充分揭露不行，不严厉批判也不行。”

陈铭枢一听梁漱溟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这等于是给他定了性，心中不禁暗暗松了口气，因为他不希望毛泽东把梁漱溟的问题拉扯到“政治问题”上去解决。

陈铭枢向毛泽东提意见

又过了四年——1957年，中共中央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提意见，进行开门整风。陈铭枢响应号召，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认为文教界的共产党负责人不称职。还说了毛泽东好大喜功，偏听偏信的话。

接着反右派开始，陈铭枢被打成右派，全国各大报纸都对他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判。陈铭枢精神上受到严重的打击。1965年5月15日，陈铭枢在北京去世，终年76岁。

（责任编辑 王 恂）

一曲《洪湖水，浪打浪》唱红了全中国，感染了几代中国人。但又有几人知晓歌剧《洪湖赤卫队》中主角韩英，就是以鄂南女革命家、共和国首任监察部长钱瑛为生活原型创作的呢？

《洪湖赤卫队》 主角原型钱瑛

□ 余 玮 巴 玖

小钱瑛聪颖刚烈

1903年5月14日清早，一个小生命在鄂南咸宁马桥镇肖桥村力稼庄降生了。父母为她取名“有生”，这个小孩儿就是日后的钱瑛。

钱瑛出生时，家境兴旺，在当地算是大户人家。祖父钱兰田坐贾沙市，伯父钱焕庭经营潜江，父亲钱训臣则在汉口转接。他们以汉口为总汇，来往于荆襄——武汉——咸宁之间，商业上呼应灵通。当时武汉至咸宁尚有水运航线，小轮、帆船载运货物，动辄租用二三十艘络绎于武咸航线，在地方名声很大，方圆数百里的商户都与他们有业务来往。

人无百日好，花无千日红。钱瑛一岁时，钱家突遭厄运。一个晚上，一只小小的蜡烛被风吹倒在床沿蚊帐上，熊熊大火很快蔓延，把伯父经营的潜江周矶四店毁之一净，并由此殃及到汉口和咸宁的连锁生意。钱瑛的父亲只好辍商改行，东渡日本东京学习纺织技术，两年后学成回国却没人聘用。怀才不遇的钱训臣，经在东京相识的、时任广东新军第一协统领张炽录用为筹办粮秣的军需官。当时，广州革命烽火连天，钱瑛的祖父便以“年迈”为由电召儿子返乡。回乡后，钱训臣拿起了锄头，在家务农。

聪明颖慧、秀丽端庄的钱瑛，很小的时候就帮着母亲做家务，母亲常常把她绣的围裙、手帕、绣鞋之类拿出去卖，以补贴家用。钱瑛八岁入私塾念书，熟读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她酷爱吟诗作文，很得塾师称赞。父亲迫于生计，在潜江周矶重操旧业，将钱瑛母女接到周矶，她又来到潜江读书。

“男子十八当家去，女子十八婆家去。”这是地方的俗话。渐渐的，钱瑛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慕名到钱家提亲的人踏进钱家的大门。钱瑛的母亲经过挑选，觅了个门当户对的大户人家，收下了人家的聘礼，为女儿订下了亲事。钱瑛知道后，想起同学们常常谈论的由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这种包办婚姻导致的种种悲剧，深为自己求知求学的前途即将被断送痛苦不堪。她数次与母亲争论，但母亲却固执地认为女大当嫁，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更何况退婚势必引起非议。母亲拒不答应女儿的请求，还对她严加训斥，并把她看管起来。性格刚烈的钱瑛，不愿就此屈从。某天深夜，她写下一封绝笔信后，拿一把剪刀猛地刺向自己的咽喉，鲜血顿时汩汩流出。时刻留意着女儿房间动静母亲听到异常声音，急急赶去查看，发现女儿的惨状，立即请来大夫全力抢救。钱瑛的母亲见她性子如此刚烈，只好为她退了婚，不再在她

面前提这事了。

革命征途，几次脱险

1922年，哥哥与两个姐姐读中学了，而父亲的生意一般，经济算不上宽裕。父亲建议钱瑛辍学，她怎么也不同意，闹着要上学念书，终于获准进潜江职工女校学习。因她语文扎实，毕业后留校任教。永不满足的钱瑛报考湖北女师，成绩优异，没想到体检时发现她缠过足而不能录取。

如此不公正的结果，使钱瑛既失望又焦急，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时任武昌中华大学博物教员，后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红色理论家”的钱亦石，是钱瑛的族叔，对这位才华横溢、富有反抗精神的侄女尤为器重。一方面多方开导、鼓励她；一方面向校方交涉，据理力争，使钱瑛如愿以偿跨进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传播革命思想基地之一的湖北女师大门。钱瑛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学习刻苦，各门功课名列前茅。同时，在湖北党的早期领导人李汉俊、钱亦石等的影响下，渐渐倾向革命，终于从一名反抗包办婚姻的叛逆者成为一名自觉的革命者，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中。

1927年初，24岁的钱瑛在湖北女师经吴瑞芝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她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革命的斗争中，几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改。这年夏天，钱瑛结束了在湖北女师的学习，到劳动代表培训班接受培训后，被派往江西省九江市总工会组织部任干事，负责纱厂、火柴厂的妇女和工运工作。

由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九江

的政治空气也很紧张，党组织通知钱瑛离开工作岗位。她对刚刚开辟的工作难舍难分，直到敌人前来搜捕，才跳窗逃走。随后，组织决定让她赴南昌参加“八一”起义，未及启程，得悉起义失败。钱瑛转而赶赴广州，在叶剑英领导下搞兵运工作，参加广州起义。广州起义也失败了，钱瑛只得离开白色恐怖的广州。

急于脱险，她见有一艘民船泊在江边，便跳了上去。上船后发现舱里有许多女人，一个个愁眉苦脸，低头不语。警觉的钱瑛悄悄问旁边的一个女人，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一条人贩子以介绍工作为由，贩卖女人的黑船。才出虎口，又入狼窝。为了免遭厄运，不致落到人贩子手中，钱瑛决计不惜一切，逃离这条贼船。她趁船老板和打手不备，一头扎进了汹涌的珠江。

滔滔江水，几个浪头便将钱瑛冲出数十米外，幸被一位好心的渔民救起，躲过一劫，又上了路。一天晚上，钱瑛到一家小客店投宿，由于语音不同，被隔壁房间的两名住客盯上了。这两个男人见她孤身一人，又长得比南粤女性更显白皙灵秀，先是起了邪念，后又怀疑她是“赤匪”和“共党”，打算抓她去领赏钱。他们鬼鬼祟祟的

样子，逃不过钱瑛的眼睛。她关紧房门，不敢入眠，在手帕上仿照《木兰辞》写了一首诗，诗中诉说自己是一个恪守旧礼教的节孝女子，不料在和父亲外出投亲的路上遇到土匪，父亲被打死，随身带的钱物被抢走，处境艰难。第二天，钱瑛黎明即起，前往火车站混上了火车。孰料这两个家伙不死心，一直盯到了车上。火车还未启动，警察即查票，发现钱瑛无票乘车，怀疑她是“共党分子”，便对她搜查，结果搜出了那块写着诗的手帕。钱瑛被带下火车，站长和印花税局局长对这首仿《木兰辞》诗大为赞赏，觉得这样一个“节孝双全”的女



钱 瑛

子不会是“共党”，便把她放了。

辗转南北，女失夫亡

钱瑛凭借文才与机智，再次躲过了危境。几经辗转，在香港找到了党组织。1928年7月，组织派她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在上海，钱瑛被分配到全国总工会秘书处做秘书和交通工作。由于工作的关系，钱瑛结识了大她七岁、任全国海员工会秘书长的谭寿林。“五四”运动时，谭寿林是广西贵县中小学生爱国联合会会长，领导了当地学生爱国运动；在北大学习期间，创办过进步刊物《桂光》；后回广西担任梧州特委书记，领导农民革命运动。谭寿林曾被反动军阀及国民党当局两次逮捕，由于未查出他的真实身份而获释，到上海继续从事革命工作。谭寿林的英勇斗争经历深深打动和吸引了钱瑛，加上他们都是坚定的革命者，志同道合，感情迅速发展。1928年10月，两人在上海喜结伉俪。

1929年初，新婚未满百日，钱瑛接到中央组织部通知，前往苏联学习。两人决定，钱瑛出国后，谭寿林用约定的格式、方法和时间写信给钱瑛，使她能及时了解国内的形势；而钱瑛，如没重要的事情则不写信给国内，以专心学习。他俩买了两支同样的笔，各带一支在身边，钱瑛还选购了信纸留给丈夫。

在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后，钱瑛发现自己怀孕了。怕有了孩子耽误学习和给革命带来拖累，她千方百计造成人工流产，她站在桌子上往下跳，迫使孩子早产。女儿提前呱呱坠地，先天不足，瘦小得可怜，自己却不能全心全意照料她。钱瑛狠狠心，把女儿送进了一家保育院代养。紧张的学习，使她几乎没有空闲去看望女儿。1931年春，学习期满，钱瑛要回国工作了。这时国内斗争的形势异常严峻和残酷，谭寿林整日为革命奔波，也不可能抽出时间照顾幼小的女儿。想到回国后等待自己的大量工作，钱瑛决定只身回国，把女儿留在苏联。作为母亲，她同样没有理由不怜爱自己的孩子；作为革命者，她又不得不忍痛割爱与孩子别

离。临别前最后一次去看望女儿时，钱瑛搂抱着女儿久久不忍放下，女儿的一举一动、一哭一笑都牵扯着她的心。她泪如雨下，心似刀绞，但仍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归途。直到解放后，才打听到孩子在苏联夭折的消息，钱瑛不由声泪俱下。

由于湖北洪湖地区急需干部，党组织决定派他们夫妇去洪湖工作。正欲启程，上海的工会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谭寿林主动提出留下来做善后和恢复工作，处理好上海的工作后再去洪湖与钱瑛会合，钱瑛再次与丈夫告别，只身赴洪湖。不料，这次分别竟成永别。4月22日清晨，谭寿林又一次被捕，转至南京作为“重犯”严加关押和审讯。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的谭寿林，在狱中受尽酷刑，5月30日在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5岁。谭的牺牲，钱瑛怎么也不相信。她悲痛、等待，期望重逢。但这一切成了永远的梦，她的心里留下了永远的伤痕，只有将全部精力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以完成丈夫未竟的事业。

此后，钱瑛一直珍藏着谭寿林烈士的遗物，随身带着丈夫留给她的一块怀表，房间里悬挂着丈夫的照片。她还写了许多缅怀丈夫的诗词，倾诉自己对丈夫的深切怀念。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谭寿林所著《俘虏的生还》一书再版，钱瑛触书生情，在《再读〈俘虏的生还〉》时倾诉“三十一年生死别，遗篇再读忆初逢”的真挚感情。

从“洪湖赤卫队”到“模范监狱”

钱瑛到达洪湖地区后，参加了洪湖革命根据地 and 潜江县委的领导工作。她忍住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积极组织和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反渔霸、抗洪水，建立游击队伍，消灭地主武装“白极会”，还主持编辑和出版省总工会机关刊物《湘鄂西工人》。

1932年5月，正当红三军向襄河北岸行动时，川军范绍增部一个旅占领了老龙口，企图向新沟嘴、周老口、瞿家湾等洪湖中心地区进犯。当时我军只有一个警卫团留守根据地，敌众我寡，钱瑛闻讯率领一支游击队星夜赶到，机智地绕到敌后，给敌人以突然袭击，打乱了敌人的部

署。敌军不明我军虚实,不敢贸然进犯,畏缩不前,这时红三军主力紧急驰援,击溃了敌人。

1932年5月7日,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发动了所谓反“改组派”斗争,在洪湖苏区搞“肃反”扩大化,两个月制造了许多冤案、错案。对这种“怀疑一切”的做法,钱瑛很是不解。她向夏曦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创造苏维埃的人怎么会是反革命和‘改组派’呢?”夏曦竟回答:“这些创造苏维埃的人正是为了消灭苏维埃。”看到1600多名湘鄂西特区党政军各级干部和群众领袖被捕,大批革命干部在“肃反”扩大化中倒下去,钱瑛的心情无比沉痛。

1932年秋,洪湖苏区在敌人进攻和“肃反”扩大化影响下,革命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大部地区失守。夏曦和中共湘鄂西省委书记杨光华决定派钱瑛去沔阳沙湖区,领导恢复该地的革命工作。钱瑛连夜赶到该区,沙湖区委也正准备撤退。钱瑛来不及多想,只能随同区委一同撤退和转移。途中,穿过了敌人几道封锁线。一路同行的人大都走散了,钱瑛最后孤身一人,终被白军抓住。为了不让敌人看出破绽,钱瑛借上厕所为由,悄悄将丈夫送给她的怀表扔进草丛里。审讯中,钱瑛坚持说自己是由汉口来此地投亲,遇上打仗,与亲戚走散了。敌人死死追问,钱瑛便自称陈秀英(钱瑛的姐夫有一侧室姓陈),姐姐在汉口居住,姐夫是一家药店老板。他们向汉口联系,证实她的所说,只好把她放了。脱险后,钱瑛化装成一个跛足的中年妇女,一路乞讨到汉口,找到二姐钱王宣。此时,钱瑛心目中,只有党才是自己的家,她决心即使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党。稍事休息,又风尘仆仆赶往上海寻找党组织。

钱瑛到上海后,住到钱亦石家,通过钱的关系,很快与上海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933年初,党派她到江苏省委在妇委工作,因叛徒出卖,不幸再次被捕。7月,钱瑛被押解到被国民党称之为“模范监狱”的南京老虎桥监狱。她化名彭友姑,始终未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在这座“模范监狱”里,钱瑛利用各种形式做难友的思想工作,团结政治犯,组织她们学文化,学政治,并与帅孟奇、夏之栩等人一起成功领导了四次

绝食斗争。

1936年春,钱瑛与同监难友被押解到南京“反省院”。这是敌人的新花招,妄图从生活上软化、思想上感化共产党人。把40名女政治犯编成甲、乙、丙三班,钱瑛被编在乙班,两人一间住房,每日三餐,中午还有两荤两素的四菜一汤,每周要作总理纪念周,朗诵总理遗嘱,向国民党党旗、国旗致敬,要唱国民党党歌、国歌。钱瑛对这些不予理睬,班主任认为她是“顽固分子”找她谈话,遭到钱瑛的抵制。有一次,教官宣讲三民主义,攻击马列主义,钱瑛提出质问:“你说三民主义好,马列主义不好,可以把马列主义的书拿出来比较吗?”弄得院方难以下台。在反省院,院方规定每天写日记,钱瑛就和难友商量利用敌人发的纸和笔写狱中斗争日记,批驳敌人的诬蔑。这时传闻绥远抗战发生,钱瑛向难友提议以此为题,提出释放政治犯,开赴前线支援抗日战士。敌人无奈,又把钱瑛和薛信等八人关进有铁门的单人号里。钱瑛从小就会刺绣,在单人号里用头发和拆下的袜子纱线在花布上绣狮子、梅、兰、竹、菊送给难友,互相鼓励;用指甲在墙壁上刻诗句砥砺志气。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到南京,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政治犯”。因钱瑛被捕后化名“彭友姑”,没被列入释放名单。直到帅孟奇出狱后向周恩来汇报,第二批她才获释,结束了四年多的狱中生活。

深入白区,隐身化名肩重任

出狱后,钱瑛1937年10月任湖北省委委员,负责农运和妇运工作,后改任湖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妇女部部长。继而,出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书记、中共鄂中区委员会书记,在正面战场前沿敌我双方对峙的夹缝中奋斗,领导鄂中人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1940年,钱瑛结束在湖北的工作,担任中央南方局驻川康特委代表和川西工委书记,领导这一地区的地下工作。“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加紧了国统区我党的搜捕和迫害。在危急时刻,钱瑛采取果断措施,

转移已“露红”的党员干部,改变“粉红”的工作方式,长期埋伏“暗红”的党员干部,稳住了我党在西南地区的阵地。

1943年,钱瑛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并接受“抢救运动”中的“审查”。她亲身感受过湘鄂西“肃反扩大化”恶果,她反对康生的一套作法,不避风险,为被冤屈的白区工作同志申辩和作证,两次到中央社会部说明情况,保护了不少同志。

1945年冬,钱瑛担任中央重庆局组织部部长,在周恩来、董必武、李克农等的领导下,做了大量工作,受到周恩来、董必武的器重。当时到红岩汇报、联系、接头的同志,大都由她安排。第二年,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至南京梅园新村,重庆局也改为南京局。钱瑛化名“陈平”也来到南京,担任中共中央南京局组织部部长。国民党政府刚刚“还都”南京,情况非常险恶,梅园周围每天都有国民党特务监视,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来梅园新村联系、汇报工作的同志来往、安排、转移都不允许留下只字片纸。钱瑛在没有文字记载、更无档案可查的情况下,就靠她坚强的毅力、对工作的认真和惊人记忆力,不但熟记这些同志的姓名和藉以掩护的职业,而且对他们的履历、特点、家庭情况、社会关系等如数家珍。由于她的工作周密细致,在近半年的时间里,所有来中共代表团接关系、谈工作的同志都没出过问题。

这年7月,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撤退。钱瑛送中共代表团回延安后,只身转道上海,继续坚持白区斗争。1947年,钱瑛担任中共上海局组织部部长,在上海这个反动势力最猖獗的城市,开辟第二条战线,领导组织工作和学生运动。1948年9月,钱瑛到香港,秘密领导干部培训工作,迎接全国解放。在她的具体安排下,南方各省经过挑选的进步学生被分批分期送到香港,接受培训后,又被分派到各地开展工作。他们大都成为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

1949年春,钱瑛担任华中局委员、华中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后华中局改为中南局,她就任中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兼任中南妇委书

记、妇联主任、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人事部部长。

心系民心的“女包公”

1952年11月,钱瑛奉调到北京,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兼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监察部部长、内务部部长。钱瑛身居高位,不忘群众疾苦,每年都有一半时间下基层调查研究,检查工作。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她下基层,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法,直接到公社、大队和小队,到群众家中,同吃同住,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并将观察和了解的情况向党中央报告,请求调拨赈灾粮款,并指导和协助当地领导整顿组织,整顿作风。

1959年仲秋的一天,天高气爽,一辆黑色小轿车驶进了咸宁县委大院,车上下来一位年约五十开外的妇女和一名青年人。县委书记王秀生迎上前去,那位青年人指着刚下车的妇女介绍:“这是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同志。”钱瑛同县委干部一一握手,操着咸宁口音微笑着说:“你们都是我的‘父母官’,你们在基层工作,辛苦了。我这次是从广州回北京路过武汉,顺便回家看看,你们都忙,就不必陪同了。”然后指着身上的衣服说:“明天我回老家马桥看看,想办法给我借件大襟衣服。穿这种呢子回去,脱离群众啊。”

钱瑛坐在轿车里,饱览着家乡秀丽的景色,深情地吮吸着家乡泥土的芳香。久别的亲人回来了,父老兄弟纷纷迎了上来,钱瑛紧紧握住乡亲们的手,一一问候,逐户看望,亲切交谈。交谈中,钱瑛了解到乡亲们对区里的一位副区长有些不满。这位副区长外号“曹大炮”,作风恶劣,态度专横,爱搞形式。钱瑛听了,眉头打结,默默无语,驱车直奔马桥区公所。钱瑛看到一位30来岁、皮肤黝黑、心宽体胖的男同志翘脚坐在那里看报纸,便走上前问:“大哥,请问曹区长在家吗?”那位看报纸的人连头都没抬。“大哥,那位姓曹的副区长在家吗?”钱瑛提高声调又问了一次。看报人不耐烦地露出半边脸,见问话的人穿着土,语音土,是个本地的老太婆,便粗声大气

地喝斥：“找曹区长做什么事？他不在家！”“我有急事，请你这位大哥帮我找找好不好？”钱瑛心平气和地说。“跟你说了，曹区长不在，还罗嗦什么！明天早点来！”钱瑛见看报人态度如此恶劣，心里便明白了几分。一打听，正是赫赫有名的“曹大炮”。钱瑛找曹副区长，本意是想向他反映一下群众意见，同他谈谈心，没想到受到这般冷遇。

回到县城，钱瑛同王秀生等县委领导座谈故乡行的所见所想。当谈到干部的素质、作风问题时，钱瑛的语调显得既激愤又严厉：“我看到马桥区那个曹区长，简直不像人民的公仆，群众对他的反映不好。你们要认真同他谈谈心，指出他的错误，帮助他转变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钱瑛走后，县委对“曹大炮”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给了处分。

1962年，钱瑛根据中央指示，带领工作组到安徽、四川协助省委进行甄别工作，坚持真理，不避风险，甄别平反了被定为“铁案”的原安徽省委书记李世民错划右派案和张凯帆“反党反社会主义”案；对四川张西挺、刘结挺一案则坚持原则，不准翻案。钱瑛坚持真理、实事求是、

铁面无私的精神，受到中央领导的称赞，被誉为党内“女包公”。她在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时，曾到广东省进行调查研究，并向中央报告了在广东发生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这份报告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曾亲笔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转发了钱瑛的报告。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江青一伙把中央监察、纪检部门当作主要攻击目标。钱瑛被隔离审查，受到残酷迫害。1972年4月，钱瑛确诊患了肺癌，住进北京日坛医院，“监护治疗”，不准任何人探视。在她生命垂危时，日坛医院党委书记、钱瑛在重庆、南京中央局工作时的上级李克农的儿子李冰去看望她，转达同志们的问候。她泰然地说：“我朝前看”。由于李冰等人的关照，钱瑛的病情曾一度好转，但“四人帮”一伙不准她继续治疗，11月被“监护”出院，导致病情急剧恶化。

1973年7月26日，鄂南女杰、革命先驱钱瑛含冤去世，享年70岁。

（责任编辑 赵友慈）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访问团应邀赴台

《海峡两岸中华书画联合大展》在台北、高雄举行

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与台北中华伦理教育学会主办的《海峡两岸中华书画联合大展》，于2000年7月11日至16日在台北市中山纪念馆举行。参展作品的书画家，大陆有启功、程十发、沈鹏、刘文西、王颂余、溥佐等，台湾有吕佛庭、陈丹诚、欧豪年、李奇茂、黄磊生、张光宾等。据台湾有关人士称，这是迄今在台湾举行的规模最大一次两岸书画交流活动。在台北展出后，7月18日至22日又在高雄市长青综合服务中心展出。

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西北大学名誉校长、清华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

任张岂之为团长，中华炎黄书画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文西为副团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鲁淳为副团长兼秘书长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访问团一行10人应邀在台湾参观访问了大学、工厂、博物馆等，结交了各界朋友，所到之处受到了亲切友好的接待。

展出和访问，达到了弘扬中华传统书画艺术，扩大两岸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预期目的。

此次参展的作品，还将于2000年11月在北京、珠海展出。

成仿吾的“板斧”精神

□ 谢尚品

在人们心目中,创造社三巨头,郭沫若名气最大。其实,除才华、学识不相上下或各有千秋外,若论道德品质尤其是革命的坚韧性,成仿吾似又超过郭沫若和郁达夫。而且,还正是郭沫若曾明确赞誉过成仿吾是“全社的心脏”。因为,成仿吾“是创造社文艺批评、文艺理论方面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创造社一个强有力的精神支柱;他承担了最重的社务工作和编务工作;他坚守阵地,有始有终,只要他在,创造社就正常运转;无论顺利或挫折,他没有放松过自己的责任,也从未计较过个人的荣辱得失,他一心把青春献给‘创造女神’,献给新文艺事业;他这颗创造社的心脏,总是正常有力地跳动着。”(余飘、李洪程著:《成仿吾传》)

成仿吾驰骋在新文艺批评战线上,高举创造社的批评大旗,是中国现代文艺批评的奠基人之一。

在创造社,成仿吾又是以“四直”——心直、口直、笔直、手直和“四气”——勇气、才气、虎虎生气、凛凛正气著称的人。正如郑伯奇在《忆创造社》中回忆说:“沫若常说仿吾朴实热诚,心直口直,我和他相处的日子,也是如此。他身材不魁梧,容颜显得有点苍老,态度朴实得像个农民,绝少知识分子习气,眉宇间却流露着坚强刚毅的气质。他说话很少,有点近乎木讷,声音比较低,还带着一点新化家乡的口音。他待人很诚恳,很和蔼,不会作无谓的应酬。我觉得文艺界像他那样的人是不多的。由于他信念很强,对问题很认真,做文章很直率,因而得罪了一些人,落了个‘黑旋风’的绰号……”

是谁先叫他“黑旋风”的呢?是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周报》1924年126期梁俊青给成仿吾《通信》中的一句:“要学你那所谓赤足双斧的黑旋风吗?”这显然带有贬义。但,从此成仿吾却以“黑旋风”和“抡板斧”闻名于“五四”以后的文坛。

下面专就他的“板斧”精神作些评介。

首先说说他同“大人物”们论战关于误译的“三板斧”:

1922年底,25岁的成仿吾在《创造季刊》一卷三期的《学者的态度——胡适之先生的〈骂人〉态度》,就是“砍”向鼎鼎大名的胡博士的一把利斧,也是他作为“黑旋风”而“抡”出的第一“板斧”——那是因为郁达夫在《夕阳楼日记》中批评了余家菊的误译,胡适便在《努力周刊》发表《骂人》批评郁达夫。成仿吾反批评的文章指出《骂人》的错误有三:胡采取的不是学者的态度;胡对一个德文的问题应就德文去研究;胡的译文,就英文看起来,也错得太厉害。

成仿吾首先指出学者的态度“应当以真挚的热忱,搞研究的态度,时时刻刻把问题的本体拿稳,放在我们的心头。”“讨论问题的目的必须图谋进步,利于人类全体。”

成仿吾的这一“板斧”之所以尖利,是因为他抓住了要害:从大处着眼——从学者的态度立论;从小处着手——戳穿他既是大学者就不该不负责任地误译。初出茅庐的成仿吾的这一“板斧”,加上郁达夫的《答胡适之先生》和郭沫若的《反响之反响》,连珠炮似的轰向胡适,曾迫使胡适不得已而主动求和。

第二“板斧”是因1922年12期《小说月报》作者佩韦在《今年纪念的几个文学家》中，把英国诗人雪莱因信仰无神论（Atheism）而被牛津大学开除学籍一事，误把“Atheism”译为“雅典主义”，对读者为害不小。成仿吾便在1923年5月的《创造季刊》上以《“雅典主义”》“砍”向佩韦：“雪莱的无神论，对于理解他的思想，是很要紧的，而且也因为有了这种思想，才有后来的那许多的波澜；所以连这个地方都不知道的佩韦君，只好说他关于雪莱什么也不懂吧……不懂倒也罢了，只是不懂便不应孟浪从杂志里译出来，把它发表。佩韦君这种行为，我只好说他是不量力，大胆，不负责任……这个问题很重大，胡适之君竟说为了糊口或介绍译书，译错了也可以原谅，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这样讲。我想不论目的是什么，总要自己先懂了，才能介绍……我们现在所谓新文化书籍之中，所以没有几本好书的原因有二：一是我们的著作家，大多数只有一分学识，偏要吹成十二分；二是我们的翻译家，大多数自己还不懂，倒先出来拼命的翻译。这两种人我觉得非有人出来痛击一番不可！”他最后说：“我只愿我们的翻译界，一天天进步起来，给我们这些才开眼界的同胞，一些好点的粮食。”

同年，成仿吾又在《创造季刊》二卷一期“抡”出第三“板斧”——《喜剧与手势戏》，指出大学者、哲学家张东荪在法国柏格森的《物质与记忆》中的一条误译：“依戏之性质，只看演者之举动便可知道尚有多少：若是手势戏便是开场；若是喜剧便是终了。”成仿吾给纠正为：“依所演的戏之性质，演者的动作多少使我们知道戏的内容：若是手势戏，差不多可以完全了解；若是微妙的喜剧，差不多什么也不得而知。”纠正之余，当然也对张教授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使张东荪的“手势戏”成为一时的笑料，这是在翻译问题上同胡适论战的一场余波。后来，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曾风趣地说：“由达夫的《夕阳楼》惹起了胡适的骂人，由胡适的骂人惹起了仿吾和我的回敬，以后便愈扯愈远了。张东荪来参加过这场官司，接着是惹出了仿吾对《形而上学序论》的指摘，张东荪的‘手势戏’喧传了一时，成

仿吾的‘黑旋风’也因而名满天下。”

对成仿吾这“三板斧”，褒贬不一：有的憎恶他“莽撞”，有的赞赏他“勇猛”。但尚未赴美留学的梁实秋却热情地鼓励他：“《文学旬刊》曾有人暗射的比你为‘黑松林里跳出来的李逵’。我希望你不要以为这是污辱你。虽然写这句话的人倒许是存心要污辱你。仿吾阿！李逵是一条好汉！是愈穷愈硬愈直的好汉！在现在国内这种乌烟瘴气的妖魔鬼怪的文艺界里，只有一个李逵，我还嫌少呢！要没有李逵出来舞一次板斧，‘雅典主义’恐怕永远是‘雅典主义’，‘手势戏’恐怕是永远还在开场呢！我诚确的感觉着，现今国内文艺界实在最需要批评的工作，并且是需要积极的批评的工作。但是，仿吾，我们若要从从事于这种工作，打破一切文艺界里的虚伪的工作，我们的斧法切不宜乱，斧法乱则劳而无功，且将损及自身。”成仿吾的回信也充分表露了他的‘黑旋风’本性：“人家骂我是黑旋风，我自己也在又喜又愧；可怜我怎么也比不上这个赤裸裸的人。然而近来能不顾他人的褒贬，似乎又与他接近了一步……近来因为可愤恨的事情万端丛集，我们已决取一种征服的态度，我个人尤主张对恶人不讲道理，爽爽快快地去了就是。我近来的行动完全秉此宗旨……近来有些人在多方倾陷我，我只笑着看他们到底把我怎样。我想我的斧法可以不至再乱了，只是我希望朋友们多多给我点刺激——那便是砥石——使我把我的斧头磨得更尖利些。”

当然，作为“黑旋风”，成仿吾“抡”的决不只这痛击误译的“三板斧”，他至少还有“四板斧”在继续“抡”，不断“砍”：

1922年，成仿吾这个“初生牛犊”刚到上海主持创造社工作，便在“砍”胡适“教人不可骂人，却倒先自己开口便骂人”、“压迫他人的言论”等等“非学者的态度”的同期——《创造季刊》一卷三期上，“抡”出《歧路》这把也锋利无比的“板斧”，“砍”向鸳鸯蝴蝶派的变种——《礼拜六》、《晶晶》之流宣扬庸俗腐朽货色的洋场才子们：“《礼拜六》自去年复炽以来，几个月的工夫，就把他的干儿干女、干爹干妈之类的东西，差不多布满了中国的全天地，到了现在，我们的出版

物中，一天天增加的，几乎尽是这些卑鄙寄生虫拿来骗钱的龌龊的杂志。我亲爱的青年同胞们，这是何等的时代错误！”“我们知道这些卑鄙的文妖，不仅有一般老妖恶少为他们的中坚，他们还用种种下贱龌龊的文字，专门迎合一般人盲目浅薄劣等的心理，把多少无知的纯洁的青年蛊惑了。然而我们对于他们是不惜最后一弹的。”文章最后义愤地列举其三大罪状：赞美污浊，阻碍社会的进步与改造；鼓吹骄奢淫逸，破坏我们的教育；专以丑恶的文字，把人类诱向地狱，是思想界、文学界的奇耻。他急切呼唤青年们在歧路面前要善自抉择，要高唱时代所需求的歌。因此，成仿吾的《歧路》被茅盾誉为：“对礼拜六派狠狠地开了一炮！”

1923年春，成仿吾、郭沫若因《创造季刊》在时间上已赶不上读者的渴求，来不及同回富阳老家的郁达夫商量，果断决定加办《创造周报》。其创刊号上的《诗之防御战》这“第五板斧”，便是成仿吾“砍”向胡适、周作人、康白情等“大人物”的又一利斧；批评他们的有些诗，是“猜谜歌”、“演说词”、“点名簿”之类浅薄、拙劣无聊的文字游戏。后来，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评赞道：“仿吾异常勇猛……《诗之防御战》那个爆击弹，把当时筑在闸北的所谓诗坛，爆炸得比今年的闸北还要厉害。那篇文章除了仿吾之外谁也不会做的，因为凡是要顾虑一下饭碗问题的人，谁个敢做那样的文章？至少我就不敢。在我们目前这个先生长先生短的黄金世界里，少称了一个‘先生’都会得罪人，哪个敢有那样天大的胆量再来言‘战’？”

同年的《创造周报》28期，成仿吾向“整理国故”运动的胡适派，又“抡”出一“板斧”——《国学运动之我见》：揭露胡适等搞国学运动，“只不过是死在死灰中寻出火烬来满足他们那‘美好的昔日’的情绪，他们是想利用盲目的爱国的心理实行他们倒行逆施的狂妄。”他把胡适等分为三种人：学者名人而所学有限，乃不得不据国学为孤城者；老儒宿学除国学外别无能事乃乘机倡和者；盲从派，这是一切运动所必须之物。“这三种人性虽稍不同，然而他们纯袭古人的非科学的旧法，想用以显赫一时，却是一样

的。”结论是：国学不能说没有研究价值，但必须持批评的态度。拿今天的话说，就叫“留精去粕，去粗取精”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真诚提醒青年学子千万别再让人牵着鼻子去“狂舔这数千年的枯骨”。可以说，他这一“板斧”，又“砍”得准而且深。

早年曾资助毛泽东搞勤工俭学运动，晚年又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鞠躬尽瘁的国学大师章士钊老人，在北洋段祺瑞政府任司法兼教育总长时，曾在他主持的《甲寅周刊》1925年7期上发表反对新文学和白话文的文章。由于刊物封面印有黄斑老虎，人们便称章“老虎总长”。这时，28岁的成仿吾倒真成了“沂岭杀虎”的“黑旋风”，挺起朴刀“搠”向“老虎总长”——在创造社新办的《洪水》一卷6号上发表了《读章氏〈评新文学运动〉》，从事实和理论两方面逐条批驳章的谬论是“信口雌黄，论理错乱”，是“极端误解事实的话……新文学运动之所以传播甚速的



1926年3月，创造社同仁合影，右起：成仿吾、郁达夫、郭沫若、王独清

原因,是因为一般青年的心里,对于旧文学早有不满的念头。一部分早已使用白话……旧文学为(国家)衰弱的象征,不足表现生机勃勃的青年人的朝气,所以有人振臂一呼,遂不觉全国的青年都响应了。”“章氏所谓避难就易,应当改为去繁务实。”文章最后说:“开倒车的人们,尽可以非难现在的新文学,我们只是对着我们的目标走!”

成仿吾的每一“板斧”,堪称轻捷、尖利、勇猛。但他当时毕竟还年轻,不够成熟,有时难免偏激或片面。正如郑伯奇所说:“特别是他几次批评鲁迅先生,都惹起严重的回击,给他带上了一副‘极左’的面孔,这是非常遗憾的。”又如胡

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白话文,努力“尝试”写白话诗,不说他的政治倾向,单从新文化运动讲,他仍是功不可没的主将之一。《平心论胡适》、《胡适——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面旗帜》……都是近年《炎黄春秋》等报刊“平心论胡适”的名篇。而成仿吾却把他批得一无是处,就是他的偏激片面了。成、胡二公分别是我在北大和华北联大时的校长,一是我永远敬爱的师长,一是我在“五·二〇”前后反对过的“过河卒子”,当然更是我50多年前更偏激、片面、幼稚的结果。今天,成、胡二公都已辞世,谨借用亚里斯多德的名言悼念二位师长:“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责任编辑 赵友慈)

代 购 代 邮

一个时期以来,函询季羨林、李锐、韦君宜等同志作品的读者日益增多。为方便读者,现就以下订购较多的书籍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季羨林人生漫笔	季羨林	21.00	3.00
牛棚杂忆	季羨林	19.50	3.00
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徐 葵 张达南 译	28.00	4.00
百年聚焦	史义军	59.80	6.00
世纪三伟人	龚育之等六人	28.00	4.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克 李锐 龚育之等	28.00	4.00
直面人生	戴 煌	19.80	3.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3.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 锐	22.80	4.00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杨奎松	29.80	4.00
冤假错案是这样平反的	何 戟	15.00	3.00
大转折的日日夜夜	张湛彬	80.00	8.00
毛泽东最后十年	陈长江 赵桂来	17.00	3.00
中华传统美德格言与故事	许启贤	23.00	4.00
石破天惊	张湛彬	29.00	4.00
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的自述	温济泽	22.80	4.00
思忆文丛——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原上草	牛汉 邓九平	24.00	4.00
六月雪	牛汉 邓九平	25.00	4.00
荆棘路	牛汉 邓九平	23.00	4.00
(购买全套《思忆文丛》邮费7.00)			
海 丝	杜明明	28.00	4.00
龙文化与民族精神	鲁 淳 王才 冯广裕	20.00	3.00
红墙回忆	纪 学	48.00	5.00

《李锐其人》最早走出“左”的禁锢,坚持改革开放的共产党人。通过李锐的一生可以看到半个多世纪中国历史风云的翻卷,而从中国以至世界历史的背景来看既是共产党员又是知识分子的李锐,才能更看清他“这一个”。

《石破天惊》记叙了以下内容:胡耀邦为什么要给“右派”平反;陈云为什么提出康生有问题;为什么只有290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华国锋是怎样离开最高权力顶峰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怎样一步一步被突破的。

《红墙回忆》红墙内是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红墙内是共和国领袖的住地。这里,有波澜起伏的政治风云,有领袖人物的真实人生,有领袖们的感情生活……

欲购者可直接将书款汇至炎黄春秋杂志社。社址:北京东城区戏楼胡同1号,邮编:100007,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

最早的村委会诞生追记

——探访村民自治的发源地——广西宜州合寨村

□ 徐 勇

中国的许多历史性创造往往产生于不经意之中。谁也没有意料到,20年前产生的村民委员会这一村民自治的组织载体,竟在中国得到普遍推行,并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江泽民总书记在视察安徽农村的讲话中对村民自治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和村民自治,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亿万农民的伟大创造。

那么,村民自治这一伟大创造是怎样发生的呢?人们对包产到户的发源地——安徽小岗村已十分熟悉,而对村民自治的发源地尚很陌生。值村委会产生20周年之际,我们对中国第一个村委会的发源地——广西宜州市合寨村进行了实地探访。

伟大的创造源于包产到户之急需

或许是人们当初没有意识到村民自治的历史意义,正式文献中有关村委会发源地的记载很少,一般只是提到在广西宜山(现宜州市)、罗城一带。我们在宜州、罗城一带的考察中了解到,我国最早产生的村委会不是只有一个或数个,而是有多个分布在这一带。但有比较完整的历史记录,并经过多方考察后确认的中国第一个村委会是宜州市的合寨村。

宜州市位于广西西部山区,自然条件恶劣。新中国建立后,农业生产有了一定发展,但受人民公社体制的限制,长期历史沿续下来的贫困面貌未能得到根本性改变。1979年农民人均收入仅63元,位于宜州市边远地区的合寨村的生产更为落后,饱尝饥饿之苦的农民迫切需要改变现状。1979年,当风闻外地兴起“分田到户”时,合寨的农民自发地将田分到农户,生产积极性迅速高涨。

然而,获得了自由的农民很快又面临着新的问题。最为突出的是社会治安恶化,社会矛盾增多。合寨有11个自然村,41个生产队,规模较大,难于管理,特别是位于三县交界之处,历史上社会治安状况就不好。在人民公社时期,虽然经过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和发动政治运动,使社会秩序较为稳定,但由于贫困,小偷小摸等现象从未断绝。特别是在70年代后期,人民公社体制的约束力越来越弱,偷盗现象趋于严重,加上分田到户的结果,人民公社组织的凝聚力迅速弱化,原有的社会秩序更加受到强烈冲击。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管理,社会治安急剧恶化,偷盗成风,赌博成风,每天少则三五十人,多则两三百人参与赌博,赌输了就偷,偷了又去赌,形成恶性循环。处于“几不管”地带的合寨村深受其害,特别是耕牛大量被盗,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为了防盗,村

民只好将牛拉到自己的房子里与人同住。分田到户后，因争水争地，社会纠纷也大大增多，农民将当时的生活描述为“吃得饱，睡不好”。

包产到户打破了原有的农村利益格局，社会秩序激烈动荡，新的秩序又难以依靠支撑原有秩序的组织和干部建立起来。当时的农村干部面对新的形势，要么放任不管，要么束手无策，要么无能为力。分田到户是农民自发地，在偷偷摸摸状态下兴起来的。由于中央的精神仍然是不许包产到户，当时的个别省委主要领导表示不能搞责任制，否则要抓人。宜山县委领导只得采取强制措施加以阻止，并限制分田到户之风的蔓延。县委书记在全县干部会上针对农民的分田要求，对干部说：我是管总闸的，你们是管分闸的，我这个闸没有开，你们也不要开。但是，由于农民的强烈要求，分田到户已成不可阻挡之势。面对这一情况，刚刚经历过“四清”和“文革”的基层干部只得放任不管，特别是许多生产队干部干脆躺倒不干，以免再遭批判。合寨村也因此一度陷入“无人管事”的境地。事实上，就是干部想管，也没有很好的办法管。因为，以往干部工作主要是听从上级安排，所熟悉的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指挥生产，分田到户，对农民由于新的要求带来的新任务，他们不熟悉，也难以用新的办法处理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分田到户后，获得了自由的农民迫切需要一个安定的社会秩序，当原有的体制难以满足这一紧迫需要时，农民只得自己来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村民委员会：农民的自我创造

合寨村原为合寨生产大队，是由10多个自然村（当地称之为屯）组成的。自然村的村民居住集中，百多户村民形成为相对独立的村落。面对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又无人管事的困境，果地和果作两个自然村的村民率先自己组织起来，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

果地村虽然由8个生产队组成，但村民居住十分集中，农户住房一家连一家。村民中以蒙姓为主。该村1978年以来连续发生多起耕牛被盗的事件，乱砍滥伐严重，多年封山育林的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村民们忧心忡忡。1979年底的一个晚上，村里的老支书蒙宝亮、老党员蒙正昌、蒙正奉到曾任民办教师的蒙光新家里，表示要吸取旧社会和“文化大革命”无政府状态的教训，在责任田到户后，要搞好社会治安，要有人牵头，将村民组织起来。为此，他们提出方案，通过党员、群众推选出治安带头人。这一提议得到党员和群众的拥护。过了几天，召开全村户主会议，160多户每户派一人参加。主持会议的老党

第一个村委会的
发源地——广西自治
区宜州市合寨村



员介绍会议目的，说要通过会议选举产生社会治安带头人。他代表部分老党员提出蒙光新和蒙成顺为候选人。因为蒙光新年轻，有文化，蒙成顺敢于制止乱砍滥伐的行为。随后宣布实行无记名投票。每人发一张白纸，同意的就写，不同意的就不写。选举结果几乎没有写其他人的。

蒙光新和蒙成顺当选为治安带头人后，为了不负众望，想办法搞好社会治安，召开了数次老党员会议，决定订立村规民约，组织治安联防，村内自我约束，村外搞好防范。1980年元月20日召开全村会议，16岁以上的人都参加，共510多人。在会上宣读事先起草的村规民约，并进行讨论。其主要内容为：有外来人来本村需要过夜的，户主必须找治安带头人报告（如果有外来人住宿，治安不好，要找户主）；山林水田纠纷一家一户解决不了的，汇报给治安带头人。对乱砍滥伐者要教育处罚。本村人也不能到村外乱砍滥伐，否则会败坏本村的名声；组织村民架桥补路，整修挑水码头；集资购买低压线路设备，解决照明问题等。讨论后，每户出一个代表在村规民约上按手印，以便人人负责，自我约束。可惜的是，几年后政府部门要去了这份村规民约的原始材料，并未能保存下来。

订立村规民约后，治安带头人又联络邻村搞治安联防，一村有事，共同协力。1980年2月的一个深夜，邻村有一个外来人偷走一头黄牛，凌晨6时得到消息，2小时后联防小组便分工把守路口，其中一个治安小组一直跟踪到邻近的柳江县，第二天便将牛追了回来。

村民从这件事认识到有治安带头人带头管事，有村规民约进行相互约束的好处，便要求将这一组织固定下来。但是这一组织是群众自发地建立的，对组织的名称和治安带头人的称呼也各有不同。有的将治安带头人称为主任，有的称为片长。

与果地村相比，邻近的果作村在建立自己的组织时就规范一些。果作自然村原有6个生产队。该村的村民是在人心惶惶中度过1980年新年的。按以往的习惯，春节前后本是总结过去、安排新年生产计划的时间。但原来的生产队

长们此时都愁眉难展，一下子失去了主见，认为现在搞生产责任制，没有什么队长了。当时任生产队长的韦焕能（果作村以韦姓为主）主动站了出来，这样下去不行，要把大家组织起来。于是他把他其他几个生产队的干部都叫到一起，商量以自然村为基础建立新的组织，大家都表示同意。韦焕能提出新的组织不是生产队，不需要太多干部，由五个人组成，一正两副，一个会计，一个出纳。后来考虑到原有6个生产队，就增加了1个人。而新领导人怎样产生呢？过去的生产队长由上级任命，新的组织没有人任命，也不能自己宣布自己为领导，村民也不会承认，经讨论，决定由群众自己选举村领导。

1980年2月5日，根据事先的商定，召开全村大会选举村领导。在五人合抱的大樟树下，坐满了村民。全村85户，一家一个代表，当时的生产大队长蒙光捷来主持会议。他说，根据各队队长的意见叫我来，我也愿意来，选村里的领导要选好。我同意群众意见，不用搞候选人，搞无记名投票。大队长讲话后，由群众议论。当时担心没有人当干部，就说选上谁谁就得当，谁的票多谁就当领导。因为当时社会治安很乱，没有人愿当；同时，“四清”和“文革”把干部整苦了，原来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在“文革”中被打死，干部心有余悸。但是群众又怕乱，强烈要求组织起来，于是提出，选了谁，谁就必须当，不能推辞。随后，每个人发了一张用信纸裁开的纸条，一张纸条上可写6个人，多的作废。经过投票计票，大队长当场宣布选举结果，韦焕能得了满票，6人中最少的也有62票。

新的村干部选出来后，却没有一个正式的组织名称。选举之前，只是讲选举村领导，选举后，村领导要分工，需要有一个组织名称，大家纷纷议论，结果多数人主张叫“村委会”，村委会也因此成为正式的组织名称。但是，当地的村民还是更习惯于叫村民委，认为村民委是村民选举出来的，不同于原来的管委会和队委会，直到现在，人们一般还是把这个组织叫村民委。

果作村领导当选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领导村民制定村规民约和管理章程。1980年7月14日，召开全村大会，讨论并通过事先起草

好的村规民约和封山公约。这两份文件以村委会名义公布，并有 85 户村民的手印或签名盖章。这一份村民自我管理的章程至今还完好地保存在韦焕能的手中，成为历史的有力见证。

村委会和村规民约很快收到了实效，一度盛行的赌博风被刹住了，偷盗事件大为减少。成立村委会后的二年间，只发生过两起外地人到当地偷窃的案件，而且在村委会的组织下得到及时的处理，村民又过上了安宁的生活。

此外，村委会还为群众办了不少实事。1980 年，别的村乱砍滥伐日益严重，果作村却开展了造林大会战。接下来修建码头、机耕路。在解决村民照明用电问题时，村里没有足够的资金，于是与群众商量，根据群众意见，按人口集资，人均 12 元钱，解决了资金紧张问题，村民终于用上了盼望已久的电。由于资金款来自于村民，村干部用钱时十分谨慎，会计出纳帐目清楚，定期向村民张榜公布，从而取得了村民的充分信任。村干部办事更加注意与群众协商，干群关系十分融洽。

果作村委会是迄今发现的全国第一个有正式记录为依据的村委会。这一组织从开始就体现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自治组织的性质，体现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

管理、民主监督”的原则精神。一种适应家庭经营新的生产形式的新组织，一种新的组织管理运行机制就这样在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山村诞生了。

党对农民创造的积极支持和引导

尊重实践，尊重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创造，这是我们党成为人民利益代表的源泉所在；善于总结实践经验，积极支持和引导人民的创造，这是我们党作为领导力量的根基所在。中国第一个村委会的产生并得以扩展到全国，便生动具体地证明了这一点。

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基层干部正为社会治安恶化等问题困扰时，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村委会等新的组织，不仅在解决社会治安问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通过村委会组织群众举办公益事业，办成了许多过去干部群众想办而没有办成的事情。当了解到果地和果作等村因建立起群众组织使治安好转、公共事务有人管的情况后，大队和公社干部都很高兴。随之，合寨所有的自然村都建立了村委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其他地方的农民也自发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因为是群众自发建立的组织，最初各种叫法

都有，有的叫治安联防队，有的叫村主，有的叫村管委会，有的叫村委会。1980 年上半年，合寨大队所在的三岔公社党委书记向文忠就新的群众组织发表意见说，既然是村民选的，就叫村民委员会。以后，村民委员会便作为规范的名词确定下来，上报的材料均使用了“村民委员会”。所以，村民委员会的发明权属于农民，冠名权则是当时的党组织。

中央肯定了生产责



第一个村委会的发起人滕成顺，现任合寨村村委会副主任

任制以后，宜州市广泛推行以分田到户为主的责任制。为了解决实行责任制后公共事务无人管的问题，合寨村成立村委会的经验很快引起了宜州市所在的河池地委的高度重视，并得到地委书记金宝生的直接关注，派人专程调查。中共河池地委 1981 年发出 [26] 号文件，即《转发宜山县合寨大队村委会、罗城县牛毕大队新回村委会情况调查的通知》，指出：“村委会建立后，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希各地“组织干部社员学习讨论，并根据各地情况从实际出发，参照执行。”宜山县委领导由于对责任制态度的转变，也开始重视实行责任制后的村委会建设。到 1982 年，宜山县 12 个公社的 2288 个自然村中，有 598 个建立了村委会。1982 年，合寨村还在全县的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上介绍了建立村委会的经验。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县委领导还只是将村委会作为过渡性组织，在领导村委会建设中出现了徘徊。

广西壮族自治区领导敏锐地注意到宜州市农村改革中出现的新的组织形式。当时的区委书记肖寒带人到最先兴起责任制的河池地区调查，了解到宜州实行责任制过程中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修水坝，保证了正常生产，他很感兴趣，认为这是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出现的新事物。后又组织区委政策研究室、区办公厅、区农委、区公安厅、区民政厅等八家单位再次进行专门的实地调查。1982 年 4 月 15 日完成《关于宜山、罗城两县村委会的调查报告》。这篇近万字的调查报告对村委会的由来与发展、作用与问题，反映与意见作了详细的阐述。调查报告充分肯定了村委会的作用，但也反映了由于对村委会的认识不同，一部分人认为村委会只是权宜之计，不宜倡导的意见。《广西日报》专门编发了《村委会办了十件好事——宜山县的调查》一文，但为慎重起见，此文只是刊载在由该报群工部主办的内部参考上。

地方领导人的矛盾心态与当时中央没有明确意见有关。但事实上，80 年代初，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中央就在思考农村的管理体制和基层组织建设问题，对农村改革中出现的新组织形式给予了相当的关注。1981 年 6 月

20 日，广西区委研究室主办的《调研通讯》第 4 期上刊载了随肖寒调查的区农委干部宋毅的调研报告《宜山县冷水村建立村管理委员会管理全村事务》。这份报告很快引起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由彭真任书记的中央政法委员会专门派人到宜山调查。全国人大和民政部也专门组成调查组到宜山调查。中央数次来人调查后，又引起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重视，并再次到宜州实地调查。在大量调查基础上，彭真在 1982 年 7 月 22 日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专门谈到：“村民委员会过去是有过的，中间一个时期没有，近几年有些地方又建立起来了，是群众自治性组织，大家订立公约，大家共同遵守，经验是成功的，应普遍建立。”“有些地方村民或乡民委员会搞乡规民约，规定不准偷、不准赌、不许会道门活动、不许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等，很解决问题，群众很高兴。”并提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如何搞，包括和基层政权的关系问题，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形式试验，待经验比较成熟后，再作比较研究，并修改居民委员会条例，制定村民委员会条例。”（《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430—431 页）同年 8 月，中共中央 36 号文件指出，近年有些地方建立的村民委员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大家订立公约，大家共同遵守，“经验是成功的。”并要求各地“有计划地进行建立村民（或乡民）委员会试点。”1982 年底，村民委员会正式载入宪法第 111 条，并强调村民委员会的群众自治组织性质。至此，村民委员会及其村民自治得以合法化，并开始在全国广泛推行，村委会建设走向法制化的轨道。

从全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的产生及发展看，村民委员会的建立，村民自治的实行，是党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它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必然产物，深深扎根于坚实的土地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作者调查中得到广西区有关部门和人士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 吴 思）

1948 年震惊上海的 “一·二九”事件

□ 蒋正禄

1948 年 1 月，上海同济大学学生自治会领导机构任期届满，按章程需改选。不料校方压制民主，违背广大学生意志，公然命令旧理事留任，不准改选。当全校学生按正常程序选出新的自治会领导机构后，校方竟无理开除学生干部。此事几经冲折，最后导致了学生与军警的大规模冲突，造成了震惊（南）京沪乃至全国的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的“一·二九”事件。

当年我是同济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从头至尾经历了这一事件。我曾以蒋修苗的笔名写了一篇《同济——准备赴京请愿之前》的通讯，刊登在当时的上海《时与文》周刊上，详细介绍了事件的前段原委。感谢当年的同班好友张熙闲同志，他在时隔 52 年后，在上海市图书馆为我找到了那篇通讯并复印寄来，引起我诸多回忆，使我得以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将“一·二九”事件的前后情况追记于后。

无理干涉：学生民主权益受损

同济大学学生自治会组织是这样的：“代表大会”由各班选出的代表组成，是决策的机构；“理事会”由普选选出，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常设委员会”即“代表大会”的主席团，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监督“理事会”。

1948 年元旦后三天，各班代表陆续选出，旧“理事会”遂定于 11 日召开“代表大会”。不料

校方突然命令旧理事留任，不准自治会改选，同时公布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学生自治会组织修正规则》叫学生切实遵守。旧理事一再向校方请求准许改选，都没有结果。于是，各院的民主墙上出现了学生的标语和文告，他们一致强调该《规则》抵触宪法，应该无效，校方无权干涉自治会的改选，并说上海交通大学与武汉大学都已完成改选，同济不能例外。

8 日，校方宣布三项措施：一，“教育部”所订的《规则》中无代表大会的规定，因此不许召开代表大会；二，各院单独成立自治会，不许成立全校的自治会；三，自治会的人选应由训导处指定的候选人中选出。布告一出，全校学生一致反对。他们认为校方要把“自治会”变成“统治会”；“三项措施比钦定规则还要违背宪法”；“希特勒在同济复活了！”“丁文渊（同济大学校长）把英国分治印度的把戏搬来了！”

学生“反钦定、反统制”运动热烈开展起来，校长、院长等分别召集学生及旧理事训话，当然都无济于事。

11 日，“代表大会”在数百名学生保护下召开了，并决定 13 日完成改选，13 日晚，在学生为闸北、杨树浦一带难民募捐寒衣而组织的“寒衣劝募委员会”所召开的庆功大会上，公布了新理事名单，全场欢呼：“胜利属于民主！”

三天过去了，许多人以为此事已告一段落。谁知校方竟于 14 日贴出布告，开除旧理事

会的代理理事长杜受百（理事长杨前坤已于1947年5月的学生运动中被开除）和法学院选举事务所负责人何长城学籍。前者的“罪名”是：“歪曲事实，挑拨离间，破坏秩序”；后者的“罪名”是：“藐视师长，毁坏公物”。学生对此极为不满，认为：开除杜、何两同学是校方打击民主的卑鄙手段，要求校方收回成命，否则要与杜何二生共去留。

15日上午10时许，千余学生在北风凛冽中聚集在文法学院广场，要到学校总办事处所在地“红楼”去请愿。自治会理事及常设委员会代表先去请愿，要求收回开除二生的成命和承认新自治会，校方不准。代表继请校长向学生训话，也遭拒绝。学生等得不耐烦了，一齐拥到“红楼”大门前。正在紧张的时候，学生在人群中抓住了一个特殊人物，从他身上搜出装有实弹的白朗林手枪一支，同济、交大校章各一枚，同济大学总务长名片一张及警局证件二张。他在学生追问下，承认是丁校长打电话叫他来的。学生们把他看守起来，并守住门墙，以免再有歹人混

入。这时，虽有三卡车警察包围了学校，但学生并不慌张。

学生代表与校长丁文渊派的训导长江鸿和总务长施志千交涉，质问校方开除杜何二生的原因，并要求收回成命。校方理屈词穷，又不肯让步。僵持到下午四点，谈判没有结果。

自治会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决定16日继续请愿，如仍无结果，则自17日起罢课三天。校长傍晚回到“红楼”，答应次日午后召开训导会议，考虑学生的要求。

16日午后，千余学生又来“红楼”请愿，可是直到夜晚9点钟，校长、训导长都不露面，受骗了的学生宣布从17日起罢课三天。

18日，校方又出布告：开除学生5人，勒令停学一年1人，“留校察看”2人，罚写“悔过书”1人。布告称：“今后如再有聚众要挟情事发生，学校定请治安当局派军警来校镇压。”

19日，学生会再度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决定绝食一餐，“抗议校方的疯狂措施”，并宣布自即日起“无限期罢课”，直至“校方收回无理处分学生的成命，并承认新选学生自治会为止”。

学生宣布“无限期罢课”后，校方又宣布开除学生4人，“留校察看”13人，记大过17人。校方还宣布了五项措施：一，解散学生自治会；二，理事、常务委员、代表等应立即自动辞职；三，今后谒见校长须先经训导处核准，每院代表最多二人，已受处分的学生不得为代表；四，学生立即复课；五，所有被开除学生限三日内离校。

至此，学生对校方已无幻想了，他们一面再三把事情真相向新闻界、本校教授及上海各校学生“控诉”，争取同情；一面积极筹备赴南京请愿。校方则请治安当局发表谈话阻止学生赴京请愿，并四次发表《告同学书》，要求学生复课。

国内学生对同济学生的罢课行动甚为支持。华北学联来函慰问；由交大、复旦、华东联大三校发起的“上海市学生争民主反迫害支援同济联合会”已有大中院校五十余校参加，正为同济筹集赴京费用。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戏剧专科学校已决定在下关迎接同济请愿团。这些院校学生认为“同济民主遭摧残是全国学校民主遭摧毁的先声”，他们誓以精神、物质和行动



上海学联举办画展，图为展品之一：《快到了》

来保卫民主。

同济学生决定1月29日赴京请愿。

大打出手：学生血染其美路

1948年1月29日清晨，当同济大学各院部及附属学校的学生大多还在梦中时，大批军警已将同济各院校包围了。反动当局认为，同济大学的校舍十分分散，院校间最大距离达20公里，近的也超过两公里，分割包围后，全校性的请愿自当告吹。同时被封锁的还有声援同济学生的50多所院校。闸北火车站更是严密封锁，甚至南京火车站也部署了大批军警。然而这些严密措施并未完全奏效，同济和外校学生仍有两千多人摆脱封锁，聚集到预定的出发点——其美路工学院。

我们文法学院的同学是出小门经小路走的。离工学院还约一里远，我们就隐约听见那里的嘈杂声。大家加快速度赶到了目的地，只见工学院的两扇大铁门紧闭，警察挤满了大门口的小空地。院内的同学愤怒地唱着《团结就是力量》想从开着的小门冲出来，却被警察组成的人墙死死堵住。警察的口哨不停地吹着，双方都有些人在喊叫，听不清喊些什么。就在我们赶到大门外公路上的瞬间，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的队伍也赶到了。不知谁大喊一声“冲啊！”三支队伍一齐呐喊着冲向警察群。院内的歌声戛然而止，变成一片欢呼：“支持的同学来了，冲啊！”警察阵脚大乱，院内的同学趁势冲出门来。

四支队伍汇合后，很快组成三路纵队向公路挺进。四名体格健壮的同学擎着“国立同济大学晋京请愿团”的横幅布标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布标后三人一排手挽手地昂首阔步地走着，不把警察放在眼里。那边警官们的口笛尖厉地狂叫着，数百名警察很快筑起了新的人墙，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在公路上展开了。

同学们紧挽着手，反复唱着《团结就是力量》夹着“冲啊！”的呐喊，向警察组成的人墙发起一次又一次的挤压，我们不对警察动拳动脚，不给敌人野蛮镇压提供口实，只用歌声、呐喊、肩膀挤压敌人，逼他们后退。

警察一再变换战术：先是拼命抵住人流，不容队伍前进；后来在拦阻的同时拼抢布标。布标虽被撕破抢走了，学生队伍的冲挤却阻挡不住。他们开始抓人了，尽管在冲挤中同学们互相保护，还是被抓走了五个人。

到中午时分，我们已迫使敌人后退了一公里多，可是敌人却越集越多，而离火车站还有七、八公里远。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表明：敌人从其美路到火车站的各条公路和街道上已分五道防线布下了两万多军警特务。上海市长吴国桢赶来，声嘶力竭地要同学退回学校，说不要受“匪谍分子”煽动等等，显然，反动当局宁愿撕下最后一块伪民主的遮羞布，也不容许学生的请愿游行得以实现了。

中共地下党组织分析了当时的情况，估计敌人要开始血腥镇压了。为了保护群众的积极性，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决定党员分别出动，说服同学暂时撤回学校，保存实力，他日再起。可是愤怒的同学们已冲红了眼，怎么说也不愿撤退。当时，人称“肖大哥”的肖荣铮就在我旁边作说服工作。那时我虽已是党的外围组织——前坤学社的成员，却不知道肖是中共同济大学文法支部的书记。只是知道他与校方坚持开除的何长城经常往来，而头天（28日）何长城同我个别谈话时还谈到过我入党的事。所以我认定肖荣铮也是共产党员，是来执行党的决定的。我对他说：“这个时候怕难得说服大家退回去啊！”

下午两点左右，肖荣铮走来小声对我说：“你赶快跑回工学院，叫厨房把稀饭抬到公路上来。”我离开队伍还不足一里，忽听身后传来潮吼般的声音，转身一看，公路上一片混乱。我喊了一声“出事了！”折头向公路跑去。跑回不远，就见四个男同学扛着一个人奔来。我急切地问：“怎么了！”一个操四川口音的说：“狗×的（国民党）马队向我们的队伍乱冲乱砍。”我见仰靠在四人肩上的那个脸色苍白的女同学，像是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我来不及细问，继续向公路跑去。公路上马队还在肆虐，同学们散在路旁用石块向马队投掷。

尽管只有两三分钟时间，行凶的骑兵便迅速离去，我们的同学被砍伤、踏伤的便有三十

位。能这样善罢甘休吗？不知谁带头唱起了《反动政府要垮台》，顷刻间大家跟着唱起来：“反动政府，反动政府，要垮台，要垮台！反动政府要垮台！反动政府要垮台！要垮台！要垮台！”这支口号式的歌，用的是北伐时期革命歌曲《打倒列强》的曲调，平时只是进步同学私下小声唱唱，今天却汇成了两千多人的大合唱。不，确切地说，这是怀着极大愤慨的呐喊，是咬牙切齿的诅咒。

恐怖之夜：学生斗智斗勇

同学们刚撤回工学院，大批军警就将大院层层包围了。学生纠察队守住大小门与敌人隔门对峙，暂时互不侵犯。

晚饭后，本校和外校学生两千多人齐集大礼堂举行声讨敌人罪行的晚会。这个兼作食堂的礼堂，向来是全校民主集会的主会场，茅盾、马寅初、马叙伦、邓初民、李平心、田汉、洪深、安娥等著名人士先后在这里发表过激动人心的演说，但在敌人重重包围下集会尚属首次。

舞台布置十分简单，没有幕布，只在正中墙壁上贴了条白底红字大标语：“血债要用血来还！”它鲜明地表达了与会者愤慨的心情。

声讨敌人当天罪行的自编自演的节目正在进行，忽然，后台闯出一批军警，簇拥着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来到前台中心，他身着军装外罩大氅，摆出一付“威严”的架势，恶狠狠地命令学生立即离开会场。少数同学报以嘘声，大多数同学冷眼观察，只见他用手向大门外一挥，顿时几百名头顶白盔，手持白色警棍的警察从三道大门外，同时冲了进来。这便是敌人吹嘘已久的受过专门训练，乘坐装甲车20分钟内能赶到上海市区任何地方实施镇压的所谓“飞行堡垒”。

凶恶的警察见人就抓，稍有反抗举棍就打，顿时会场大乱，怒斥声、尖叫声、地板的剧烈震动声混成一片。手无寸铁的学生，只有手挽手地紧紧地挤在一起，不让敌人抓走。然而那毕竟是力量悬殊的抵抗。许多同学在受伤或力不能胜的情况下被拖走了。大厅里的学生越来越少……

我们坐在礼堂最后面阶梯式台子上100多人最后一批离开会场。刚出大门我就被两个人抓住双臂问：“哪个学校的？”我答“是同济的”。他们便把我推进了一堆人中间。

天空黑沉沉的，我又是刚从灯光处出来，只见人影晃动，却看不清一张面孔。我只知道到了大操场。场上人声嘈杂，却没有人高声喊叫。一会儿队列移动了，停在一道大门内。门口安了一张桌子，我们一个个被推到桌前，让暗处的家伙亮着电筒辨认。有些同学出去了，有的被带走了。轮到我了，特务用电筒在我脸上、上身照了一分钟光景，小声说了句什么。桌旁一个家伙向门外一挥，便让我出了门外。

我走出一二十步，环顾四周不见有人跟踪，看来是放我过去了。但是怎么办？回法学院不行，出去太危险，深夜又没有车，只有在工学院找歇处了。我向男生宿舍走去，一个相识的同学找了张空铺位让我睡，并用眼神暗示室外有特务监视，要我说话注意。

我也睡不着，当天的情景不断在我脑海里再现。最让我惦念的是谁被抓走了，我们前坤社小组的邱刚泽、苏光宇是否脱险了。

次晨九点左右，听说军警已经撤走，我胡乱地洗了脸，就向工学院主楼走去。楼上一片劫后景象：学生会办公室里桌凳打得稀烂，碎纸撒了一地；阅览室里，进步报刊全没了，只存放着当天的《中央日报》、《和平日报》、《新闻日报》。这些反动报纸，对军警的暴行一字不提，反诬蔑学生打了吴市长，军警被迫前往“弹压”等等，真把人气炸了。

事件后三天，我写的通讯《同济——准备赴京请愿之前》，在《时与文》周刊上发表，同学们争相传阅。免不了有人探问“蒋修苗”是谁，但知道的都为我保密。可是有一次，一个同学带了个陌生人进宿舍来，指着我对他说：“那篇通讯就是他写的。”突如其来的介绍，倒吓我一跳，我忙看那人长着张国字脸，戴一副近视眼镜。他听了同学的话，望了我一眼，点头说声“好”，并不和我交谈，过一会儿就走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人便是乔石同志，当年是中共同济大学总支副书记。

喜讯渐渐传来：何长城、肖荣铮等学运骨干脱险了。

“一·二九”晚会还在进行时，党组织已察觉敌人要抓人，区委委员王光华把何长城和杜受百从台上叫下来，反锁在放电影机的小屋里。深夜特务两次来打门，他俩屏息不动。特务以为是间空屋，就不再打门了。30日下午，敌人全部撤走了，他们才在救护下离开工学院。

肖荣铮那晚是被抓出会场的。特务问他是哪个学校的？他急中生智，回答是光华大学的，没有推到同济学生的行列。他想从工学院的围墙跳出去，又被抓住推进了另一堆学生中，他小声问旁边的学生：“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回答是：“政法大学的。”他想了一下，就悄悄地说：“不瞒你们说，我是同济的，上了黑名单，危险得很，能不能帮帮忙？”周围两三个人立即说：“不要紧！你就说是政法大学的，我们掩护你。”一个人还把自己的校章取下来戴给他。把门的特务不认识他，他随政法大学队伍顺利出了工学院。

工学院一个女同学的脱险还有点传奇色彩。这位河南籍的同学父亲是国民党的一个高级军官，但她平日衣着朴素，一点不像个小姐。1947年她曾因积极参加学运被捕过，经父亲营救获释后照常积极参加学运，又上了黑名单。“一·二九”晚上，她混过了特务的眼睛，次日清晨又被特务盯上了，她匆忙跑进三楼女生大宿舍，把门关上。特务紧盯在门口。女同学见她处境危险，急中生智找来时装、化妆品和烫发工具，几个人都打扮成阔小姐模样。

几个堵在门口的特务，眼瞅几个香气四溢盛装的女学生，说说笑笑打开门，旁若无人地走出去。待时间已久，进门搜查，找遍所有的上铺下铺，也没有他们搜捕的那个女生时，才恍然大悟，想起那几个“摩登小姐”，可是为时已经太晚了。

保存实力：迎接更大的斗争

上级指示来了：立即开展营救被捕同学的斗争，各院分别成立营救委员会。我们小组的分

工是：我撰写张贴民主墙的大字报，号召同学们积极行动起来反对迫害、要求当局无条件地释放全部被捕同学；邱刚泽和苏光宇则是争取一向对学运持中立态度的同学出面作营救工作。

文法学院又活跃起来了，民主墙上的大字报引人注目，他们的观点被人看作一个象征：号称上海市两大民主堡垒的同济和交通大学是打不垮的。宿舍里不时传出这样的歌声：“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生要站住生，站住生，死要站住死，站住死！天快亮，路难行，跌倒是常事情，常事情。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

邱、苏两同志的工作取得成效，几个平日不大参加学运的同学组成了以李天源为首的营救委员会，该会在民主墙上贴出公告，正式开展工作。我们组织了一批同学分头拜访教授、讲师和助教，说明学生的立场，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2月18日，我们小组三人同时分别宣誓入党，仍编在一个党小组，由文学院外语系学生万孝信同志领导（后来知道：他曾参加过太别山区李先念部，中原会战后，转到同济来从事地下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在班上又发展了五位进步同学为前坤学社成员，并组织他们争取更多的同学参加学运。

2月下旬，反动当局悍然将部分被捕同学移送法院审判。党组织发动一千多同学到法院门前示威。法院早将大门紧闭，戒备森严无法进入。示威学生整队走向南京西路等闹市，作了一次和平游行。

这次行动以后，上级指示：为了积蓄力量，准备全市总起义，暂不发动大规模的斗争。按照这个方针，同济大学各院系及两个附属学校同时复课，历时一个多月的罢课遂告结束。通过这次斗争，广大学生的觉悟大大提高。暴露了的学运骨干转移解放区或内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校内的党组织及其外围组织比事件前有更大的发展，他们继续团结学生与敌人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

（责任编辑 吴 思）

一个黄埔生的 校园生活回忆

□ 张慕飞 口述 / 汤礼春 整理

新来乍到

1941年，我在河南淅川上集的国立第一中学毕业后，为了抗日，就决心投考黄埔军校。第一次投考，我因身体检查不合格而未被录取。我不气馁，又第二次报考，这次以第一名录取，进了设在西安的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在正式进军校之前，还要先到入伍生团进行初期军事训练。

我到位于终南山汤山谷附近的引驾回镇入伍生第二团报到。这个团的团长是莫我若少将，是从蒋介石侍从室下来的。这个团的其它干部也大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除了讲求黄埔精神，也讲究拳打脚踢，这好像是要“劳其筋骨”，才能成材。我一报了到，理发师傅上来就按住我的头剃，我觉得实在疼得太厉害，便央求道：“能不能手下留情慢点剃。”理发师傅歪着脸对我嚷道：“我剃过的将军一大堆，不能慢！”我只有咬着牙听任他在头上纵横捭阖了。这是入伍生的第一步，也真是下马威，难怪新入伍的学生们见了理发员、炊事兵都喊班长哩！

一个星期六的早上，营里用牛车拉来了两大车棉军服。这些棉军服都是旧的，好像是先期入伍生用过的。我领的一套上装非常短小，短到不着腰际，小到中间对襟差了十公分。于是我拎着棉袄去找值星官换，值星官正在处理另一个新生的问题，便不耐烦地挥挥手道：“你自己想

办法改一改！”

我到哪里去想办法改呢？营房周围又没有一家人家，我再一次请求换一套大的，请求中，手一松，棉衣掉到了地上。值星官虽只是个小小的排长，但认为这是犯上，立刻厉声说要办人，我一听要办人，两腿一靠挺着胸脯准备接受处罚，排长指着和炊事兵闹口角的同学说：“你也一样，你们两个都禁足，要把这个球场打扫干净。”

那个同学两手一摊道：“没有扫把怎么扫？”这一下又惹了排长，他吼道：“扫把，哪来的扫把？你给我用嘴吹！吹不干净明天也甭想出去！”

我只有脱了上衣，换了草鞋，和那个同学一起趴在地上吹起来，我俩整整吹了一个上午。

入伍生团的生活很艰苦，为了增加副食费，我们得爬终南山打柴，还得上山打石头修营房。我们最怕的还是跑步。一次全装备跑步，从营房到终南山脚，大约三十华里。有一次，跑到一半时，队形乱了，步调不一，好容易拉拉杂杂跑到营操场，营长觉得这种乱军队形有玷军誉，便喝令处罚，再在操场跑十圈，结果这十圈下来，更是丢盔弃甲，溃不成军。

在艰苦的训练中，我总算挺过来，正式升到军校十八期二十二总队步科学习。1941年春，二十二总队迁到西安近郊曲江池开学。学校生活同样是紧张艰苦的，但也有趣事。1942年冬，因为连队上的一桩事务，我和相交莫逆的朝鲜青年李云鹤（当时中国政府为了协助朝鲜独立

运动,特收留了几十位朝鲜青年在军校就读)一起乘坐木轮大骡车到引驾回镇。回来时,已是下午,我同车夫都在骡车的晃动中昏昏入睡。调皮的李云鹤首先用钢笔在车夫的脸上画了黑须,又在我脸上画了胡子,他自己却在前额上描了个“王”字,恶作剧完成后他把大家叫醒,大家醒后彼此对视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不料满车的笑声惊了骡子,它狂奔起来,一路上碰撞了好几辆骡车,最后撞进了一家豆浆店。结果人仰骡翻,碗碎锅砸,豆浆洒了满地。在围观的人群中出现了三个服装整齐的风纪兵,嚷着要抓人,我赶紧说这是车祸,并愿意赔款,这才息事宁人。

结识李范奭和卜乃夫

1942年,在西安读军校期间,我和李范奭、卜乃夫成了好朋友。李范奭是个传奇性的人物。

李范奭是韩国李氏皇族的后裔,1901年出生于汉城龙洞宫,韩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后,李范奭流亡到了中国。为了复国,他进了云南讲武堂学习军事,和叶剑英是同班同学。毕业后,李范奭来到东北从事复国的革命活动。韩国抗日历史上的第一个大战争,也是亚洲抗日战史的第一页——青山里之战,李范奭就是前线指挥官。

李范奭还在苏联红军任过远东某步骑混合大队队长,并率众攻入重镇双城子,为苏联红军抗击日寇立下卓越的战功。

九·一八事变后,李范奭又来到东北抗日义勇军马占山部下,任上校高级参谋,继续抗日。有一次,他和部队被日军包围,他在突围中杀死几个日本鬼子,身上多处负伤。

七·七事变后,李范奭来到重庆,任中央训练团中队长(少将),后应韩国临时政府的邀请,在重庆筹备成立韩国光复军,并任光复军参谋长。1942年秋,李范奭来到西安组建光复军西安第二支队,并兼任队长。

我初期来到西安时,先借住在三姐夫东北籍的军官盛健家里,在这里认识了李范奭,并且一见如故,李范奭还教我在马背上射击和卷烟,

并且常常给我讲在东北抗日和在漠北草原跟老毛子(俄国人)周旋的故事。这也培养了我抗日的勇敢精神。

抗日战争后,李范奭回到韩国任大韩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兼国防部长。

在李范奭的司令部里,我认识了卜乃夫,也就是当时正在文坛上以长篇小说《北极风情画》一炮打响的无名氏(作者的笔名)。卜乃夫当时正在苦苦追求我军校的俄语教师刘雅歌。刘雅歌是个中俄混血儿,长得美丽而丰满,无名氏为她神魂颠倒,常拜托我给她送书送情书。

在无名氏后来的自传体小说《绿色的回声》中,常因此提到我。他在其中一章中写到这样一段故事:有一次,在王曲的街上,我和刘雅歌及其弟正在一饭店里吃饭,刘雅歌注意到我在不断看表,大约11点55分,我突然站起来,走到饭店对面那片广场,高举着手臂,不断挥舞一条白色大手帕,舞过一会,我又用吊袜带把白手帕缚在藤手杖上,高举起来,继续舞,一边舞,一边向终南山方向望去。

“你在干什么?”刘雅歌好奇地问。

“我和一位朋友约定,正午12点,他在终南山顶挥舞着一块白色手帕,我在这里挥舞一块白色大手帕,看我们彼此能不能发现。”我如实地答道,又说:“这里离山顶八、九里,即使挥舞最大的手帕也不容易发现,除非用望远镜。”

刘雅歌好奇地问:“这个人真怪,他为什么要这样?”

我说:“他是一个作家,他就这样怪。他是在作一种测验:一个人站在高峰巅,能不能发现辽远处平原上一只友谊的手,在挥舞白手帕。”

刘雅歌似乎想起来,问:“他是不是那位卜先生,常在报上写文章的。”

我点点头。

当时的无名氏和我都是浪漫的青年,自然才会有这种浪漫的事。

(张慕飞,1922年出生于湖北,1941年考入黄埔军校,1952年就读于西班牙陆军大学。曾任台装甲骑兵团团长、台新闻局驻拉美国家代表,1995年回大陆,定居上海)

(责任编辑 吴思)

我在较场口救助李公朴

□ 李祥风

1944年1月，大哥托人介绍我到重庆市警察局总务科书记室当雇员。书记室的工作是抄写公文及油印报表、文件。在警局，雇员属于最下层人员，不但薪水低，而且工作环境、伙食极差。使我更难忍受的还是精神上的苦闷，我是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早在家乡时就听说八路军、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的队伍。我对国民党军队在日寇进攻下节节败退感到不满。如今看到国民党及其专政机关大捆没收《新华日报》，为了控制人民的思想、迫害进步青年，还对阅读《新华日报》的订户进行严密监视。我在视察室曾截获警局下属分局送给警局督察处的密报，反映《新华日报》的订户情况。为了不使这些密报落入督察处，我将其扣下丢进乱纸堆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实现国内和平与民主，毛泽东亲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国民党同意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协商国是。政协的成功对争取和平民主运动起了促进作用。就在这种形势下，陶行知和李公朴为了给要求进步的青年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于1946年初，先后创办了社会大学与星期学校。警局书记室同事曹子健首先获得这个消息，并约我一起去报名。星期学校设在民生路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二楼。负责招生的名叫翁维章，他首先问我们在哪个单位工作。我们明白地告诉他在警局做事。他听了有点惊讶，接着又问我们是谁介绍来的？我不知道报名需要有介绍人，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曹子健却壮起胆子说：“我们是李公朴介绍来的！”翁维章听曹子健说话的口气不小，尽管有些疑惑，也不好继续追问，便从抽屉中拿出两张报名表给我们填

写。我们见他同意报名，脸上露出了喜色。为了防止警局发现，我俩在报名表上没有填写真实姓名，曹子健改名王朝宣，我改名李梅。

星期学校定于2月10日上午8时举行开学典礼。前来报到的同学约有30多人，其中有职员、教师、记者、工人等。这一天恰好是陪都各界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陶行知和李公朴两位正副校长都去参加大会，故未能亲临指导。在开学典礼上，先由翁维章简要介绍学校筹办经过，接着由张友渔教授（当时他是中共代表团顾问及《新华日报》负责人之一）讲话，他说：“学习革命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陶行知为什么将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就是认为行比知更重要，我们要学习他的做人和治学精神，多在用和行字上下功夫。如今政协虽然取得初步成功，但依然停留在纸上，要想实现各项协议，还要做许多努力，希望大家保持清醒头脑，为实现国内和平民主贡献一份力量！”他的讲话语重心长，使我深受启发。

开学典礼不到9时半即结束，同学们忙列队前往较场口参加大会。当我们队伍接近会场时，只见场内一片混乱，有不少人向外逃窜。我感到出了事，快步走入场内。在距主席台不远，突然发现一伙暴徒正在围殴李公朴。李先生头上鲜血直流，跌跌撞撞，已支持不住。我急忙跑过去将李先生抱住，并用自己的胸口护住他的头。就在这时，曹子健也上前阻拦暴徒，我乘机将李先生救出场外，将他交给两位进步青年，然后又折回场内寻找曹子健，却不见踪影。在一家小商店门前又发现一伙暴徒在追打施复亮。施先生被迫躲入商店，并从后门逃脱，暴徒随即将

商店捣毁，作为报复。我见施先生脱险，便返回警局。

正当我吃午饭时，突然听同事说曹子健在较场口遭打伤，被送上十八梯他的姑妈家。我听了大吃一惊，放下碗筷就跑去看他。见他头部伤势较重，怕伤口感染，我连忙送他去市民医院诊治。医生见我扶着曹子健进外科室，顿时拉长了脸问道：“是不是在较场口被打伤的？”我见医生态度异常，便支吾说：“他是路过较场口被误打伤的！”医生这才给他诊



李公朴(1902—1946)

治。就在医生给他治疗时，我听说李公朴和不少被打伤的群众，都曾到这里就医；还听说国民党统治当局命令医院不准医治在较场口遭打伤的群众。难怪有的医生态度不好，原来是奉命行事。我见曹子健不需要住院，就仍送他回他的姑妈家。问他是怎样被伤的？他回答说：“就在你跑过去抱住李公朴时，我也上前阻拦暴徒。不料暴徒一齐向我扑过来，一阵拳打脚踢，其中有一个暴徒用铁尺猛击我的头部，我昏倒在地上，有一个好心的中年男子将我扶起并送我到这儿！”我听后才明白是因为暴徒的视线转移到他的身上，我才能乘机救出李公朴先生，否则，我们仍脱离不了虎口。

较场口血案发生后，国民党顽固派又大肆进行反苏反共宣传。有些同学包括我在内，对一些问题，如外蒙古独立，苏军从东北运走机器等，不甚明了，张友渔到校一一做了解答，使我们提高了认识。2月22日，国民党顽固派欺骗煽动重庆万余青年学生举行反苏反共游行。在游行时，特务暴徒捣毁了《新华日报》民生路营业部及《民主报》营业部。星期学校处境异常危险，但同学们并未退缩，仍坚持在原址上课。

4月10日，陶行知校长离开重庆去上海办理育才学校搬迁事宜，翁维章也跟着走了，学校

处于无人负责状态；同时有不少同学也去了南京、上海等地，留在重庆的不足10人。但同学们坚持自办，由杨竞负责联系教师。学校将校址改在管家巷育才学校驻渝办事处，同时又陆续吸收了一些新同学。在教学上，张友渔对学校支持最大，他不顾个人安危，由“周公馆”按时到校授课。此外，学校还聘请许涤新、沙汀、何其芳等来校做过专题报告。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7月11日，李公

朴在昆明惨遭杀害。7月25日，陶行知因劳累过度，忧愤过深，不幸逝世。噩耗传来，同学们万分悲痛，为了悼念两位师长，同学们商议筹办纪念专刊，杨竞和我曾找过史良、曹靖华等，他们都表示支持，后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成功。

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不只是针对著名的民主人士，也包括进步青年，事实上，国统区已陷入白色恐怖之中。有一天下午，我在要抄写的文件中，发现一份密件，是下达给江北警察局的，内容大致是：“根据密报，劳动协会会员×××、×××系共产党嫌疑分子，近来在江北纱厂一带活动频繁，希注意稽查、严密防范。”我看后将文件扣押。晚饭后，我约曹子健一起去劳协告知此事，并嘱咐立即将这个信息通知列在黑名单上的两位同志，以便及时隐蔽。第二天上午，我才将文件抄好送交上去。没过多久，我和曹子健因参加星期学校及救护李公朴一事，也遭到一个姓胡的同事告密，警局正在派人进行调查。此后，我们经常发现有人跟踪，知道迟早会暴露，因此我和曹子健商定，分头想办法争取早点离开警局。

以后经大哥介绍，我在南京找到了工作。不久，曹子健也离开警局另谋职业。

(责任编辑 吴 思)

讨回公道 耗尽42年时光

□ 闫桂勋

1999年1月，我收到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1999年1月8日给我做的《关于对闫桂勋同志错按右派分子对待问题的纠正意见》，终于使我长达42年的冤案得到平反。

《纠正意见》原文如下：

闫桂勋同志，男，六十六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学生，原为数力系五三级学生，共青团员。

该同志于1957年毕业前，在未经党委正式审批的情况下，按右派分子上报北京大学团委和北京市团市委被开除了团籍，分配到黑龙江工学院工作。多年来将其按右派分子对待，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受了不少委屈和伤害。

根据1957年10月15日（中发[57]酉17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中“凡是各单位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经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的规定进行复查，原材料中没有经过党委审查批准的字样，是无效的，现予以纠正。

面对这一张《纠正意见》，我热泪盈眶，感慨万千。为了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情，竟迫使我抗争了42年。这是漫长的42年，坎坷的42年，忍辱的42年，悲愤的42年。它断送了我的青春，耗尽了我的心血。把我一个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拖成了年逾花甲的退休老人。

未名湖畔的春天

1957年的春天是美好的。我们一群即将毕

业的北大学子，晚饭后常到未名湖畔散步，谈论着美好前程，谈论着未来工作，对未来生活充满憧憬，对祖国河山无限热爱。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毛泽东讲国内形势时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党内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关门主义还很严重，中共中央决定开始整风，希望党外人士、朋友帮助整风，但决不强迫别的民主党派参加”。校长马寅初听了很兴奋，开学不久就在大饭厅向全校师生作了传达。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文章，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指示中欢迎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提出应该放手鼓励批评、提意见，使党克服“三害”（“三害”当时指的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并提出坚决执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大家帮助党整风。

很快在全国形成的“大鸣大放”的高潮，立刻感染了思想活跃，素有民主传统的大学子。5月19日（星期日）中午，大饭厅东侧灰墙上出现了一张红色的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是：“质问北大团委：出席共青团‘三大’的代表是怎样产生的？”。这张批评团内生活不民主的大字报引起大家的共鸣，接着便有人贴出《一个大胆的倡

议》的大字报，建议开辟“民主墙”，要求党团领导支持以帮助党整风。

“五一九”之后三四天，大饭厅周围及宿舍区贴满了大字报，到处都是演讲会、辩论会，人声鼎沸，熙熙攘攘。

我们是数力系的毕业班，整天是X、Y、微分、积分，根本没有时间写大字报，看大字报也只是走马观花。整个数学专业四年级没有一个人写大字报，这显然也是不符合当时鼓励鸣放要求的。按照上边的布置，数四团总支宣传委员吴××召开座谈会，动员大家发言，写大字报。我作为学代会代表、班委会委员、团员，出席会议，并在发言中表示主张自由发表意见，不许压制，要以理服人。会后回班上组织大家写大字报，每班至少写一张，以响应帮助党整风的号召。为了完成任务，我们写了一张大字报，提了几个问题，如：“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是真是假？北大肃反成绩是否是主要的？”，还有一条是“数四党支部发展（工作）上走上层路线，有的人踩（着）别人往上爬”。内容都不是我提的，大字报



闫桂勋摄于1957年春

也只是贴在23斋走廊上。

风云突变祸从天降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风云突变，报纸上全是反“右派”的消息，北大党委也开始组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了。首当其冲受批判的是物理系的谭天荣，数力系是张景中、杨路、陈奉孝……这时我们班还没有动静，实事求是地讲，就那么一张在组织动员下写的大字报也没什么好批的。7月底开始毕业鉴定，照例是在小组会上“自我鉴定”后大家提意见。没想到，我的毕业鉴定顺利通过之后，小组长卢××按照数四党支部书记的指示又给我开了一次会。会一开始就给我定了案，说我是“右派分子”，让大家揭发批判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尽管会上也有事前布置好的发言，揭发出来的也多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没有够得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在会后给我写的“小组意见”中，甚至出现了“估计”、“可能”，“大概”等字眼。

系秘书找我谈话，她说材料不够定“右派”的，结论是“反社会主义分子”，行政上要给予“工作考察一年”的处理。我不同意这个结论，我说我没反社会主义，我要求复查核实“小组意见”。过了几天，系秘书又找我谈话，她说我不算“右派”，“小组意见”也要给我核实。并马上给我分配工作，让我离校。说着已时至9月下旬，除了不分配工作的“右派”外，大多数同学都离校了。我无奈也准备离校。离校的当天早晨，我还到未名湖畔转了一圈儿，也不知是眷恋还是伤心。

不明不白负罪北大荒

我离开北大，到了黑龙江，报到的单位是一所中专（后改为黑龙江工学院）。报到时学校已经开学，我顶替休产假的李宗秀老师教高等数学。桌子上一直放着我自己写的“服务人民 报

效祖国”的座右铭。我发誓要好好干，干出点儿名堂来，以证明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勤勤恳恳、认真负责，除搞好课堂教学外，还组织课外活动小组，颇受同学的好评与爱戴。然而，上课还不到一个学期，校人事处找我谈话，说我的档案寄过来了，其中有一份材料说我是“右派”，因此得按“右派分子”对待我。

从此，我不能再做教师工作，生活待遇也从9月份起改为每月发生活费29元，前几个月多发的钱要扣回。我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只能听命。

开始劳动是负责打扫学校厕所。尽管熟悉我的同学都投以同情的目光，但我心灵里的创伤却无法抹去。

1958年大炼钢铁时，我们被送到阿城一个山沟里开采矿石。我被分配去打眼放炮。白天会战，晚上夜战，劳动强度很大，但我年轻力壮，总是超额完成任务，名列第一，还被评为“劳动先进分子”（不称“积极分子”，以示区别）。我只管拼命劳动，有一次从半山腰“登板”上滑下来，差一点丢了性命。

1959年又送我们去通河农场劳动，起早贪黑抢收黄豆。我出身农民家庭，小时干过一些农活，干起来比城里人要快得多。所以总是我打头，自己完成了任务就去帮助别人。为此，我屡屡受到表扬。

国庆十周年，中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同时发布了《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负责管理的干部都反映我干活好，大炼钢铁时还有一个“劳动先进分子”的书面材料，再加上我的家庭成份和个人出身都比较好，所以党委决定第一个给我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他们让我写材料，我就如实地把我前前后后的事写了一遍。我写的虽是事实，但中心意思否定自己是右派。这样的材料，组织上怎能认可，并据此为我摘掉右派帽子呢？结果我只能继续作我的右派。

后来有人告诉我，当时党委根据我写的材料曾认真审查了我的档案，并认为，一是我的材料有“水分”；二是确实是没有党委关于定我为“右派分子”的批件。党委曾派人向北大党委提

出那两个问题，北大党委说不了解情况，推到数力系党总支。数力系一位当年负责反右派的同志则说：闫不是党员，不用党委审查批准，所以没有党委批件，没有党委批件闫也是“右派”。关于材料有“水分”的问题，这位同志说时间长了也就不去（即挤去水分）了。对于这样的答复，我所在单位党委的外调人也无可奈何，只能无功而返，还不敢说三道四。在那“‘左’比右好”年代，谁又有什么办法呢？

1960年3月，我们又被送到松花江北边的农场劳动。这里是北大荒的边缘地带，人烟稀疏。我在这里干过各种农活，放牛、放羊，还在松花江边打过鱼。

我的老家是河北农村，地处燕南赵北，可以说是燕赵男儿。放羊时我面对大草原，思绪万千。整天放羊，连饭都吃不饱，我经常想：难道人民培养我大学毕业就是为了来北大荒放羊吗？我不承认强加的罪名，就让我长期劳改吗？越想越气愤，我便唱起了河北民歌《苏武牧羊》：

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贫愁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旌落犹未还，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夜在塞上时听笳声入耳心痛酸。

转眼北风吹，燕群汉关飞。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帷。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终教匈奴惊心丧胆拱服汉德威。

我一遍又一遍地唱，高亢悲愤，泪流满面，难以忘怀。

1961年的春节我是在松花江边度过的。在哈尔滨有家的回家去了，“盲流”也回场部找老乡去了，除夕夜就剩下我一个人在江边的鱼房子里。外面北风呼叫，大雪纷飞；屋里孤灯一盏，死气沉沉。一个人在屋子里，开始很寂寞，以后是想家。三年多没回家，请假也不让回去（我父亲就是在腊月二十一去世的，当时我还不知道）。而后是想在北大四年的学习生活，想到大鸣大放，想到塞进我档案袋的被歪曲了的材料，想到“有错必纠”之难，激起我的愤怒，我忍不住又唱起了《苏武牧羊》，一遍，一遍……唱得我悲愤至极，眼泪潸潸，我也不去擦它，让它任意流

滴。

坚持申辩再吃苦头

1961年11月，我们被下放劳动的人调回学校学习，并让大家写几年来的思想改造总结，不久开始了给“右派分子”摘帽子的工作。几十个“右派”，除我一人之外全都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当时我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尽管渴望“摘帽”如同向往再生，但我认为我是错案，不是摘帽子的问题，而是纠正的问题。

党委统战部胡××找我谈话，他说我几年来表现很好，就因为不承认是“右派分子”所以没摘帽子。他好心地劝我：只要你承认是“右派分子”，写个材料，就给你摘帽子。我说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所以不能接受小组给我作的歪曲了的鉴定，更不能承认是“右派分子”。

过了一段时间，胡××又找我谈话，他说我的鉴定材料有问题，处理上也有问题，他解释说我是毕业班，处理太仓促，所以出了问题，并明确告诉我北大同意给我甄别，我的档案已经退

回北大了，让我等着甄别。这是第一次当面说对我的处理有问题，同时还告诉我党委决定让我去数学教研室报到，开始教书。

我教书仍然是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六二级的学生还给我写过表扬信，因我当时还算“右派”，表扬信也不能公开，这是数学课代表告诉我的，后来陈晓农老师也说过此事。

关于甄别问题老是让我等着，等来等去，等来的是“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反“翻案风”的调子越唱越高，我还亲自去北大申诉，均无济于事。到这年10月，统战部胡××找我谈话，正式告我：北大不同意甄别，只能以“右派分子”对待。于是，又离开课堂，离开我的学生，到郊区农村劳动改造了。

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这是使我绝望的打击。我几天几夜不能入睡，引起了别人的怀疑，以为我要自杀，还暗里监视着我。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生给我写了一张大字报，说我是“北大来的大右派”，说我老是想“翻案”，给我挂上“翻案右派”的牌子。弯腰，挨打，批斗，我遍体鳞伤仍然不承认是“右派”。我又开始给中央写申诉信，不答复，再写。

尽管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70年，因为我已明确得知我的档案材料中有“水分”，定我右派没有党委批件，我感到更为理直气壮，我在给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写的申诉信中，大胆直呼：“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我们学校合并到工大之后，曾为我去过北大的工大保卫科王桂海同志，了解了我的问题真相后，他对我说，北大定我“右派”是不对的，不符合党的规定。他是第一个向我明确说出这一看法的人。在当时极左路线正强硬的时候，有这样的胆量和远见，多么难能可贵啊！

1978年6月，国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那时我在校办厂劳动，工厂的崔某主动找我，说党委决定为我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我明白党委的好意，但这样的决定我不能接受。因为只是这样的结果，根本用不着我一直等到现在。

我虽拒绝接受“摘帽”的决定，党委还是把我调回到数学教研室，重登讲台。我的劳改生涯也从此结束了。



北大百周年纪念(1998年)左为闫桂勤

终于云消雾散

1978年55号文件下发后,我们学校被错划的“右派分子”全部得到了改正,而我的问题,却被搁置了起来。直到1979年二三月间,我亲自去北大找数力系“落实办”。我向杨老师谈了我的情况后,他先安排我到招待所住下,第二天便通知我按“错划右派、给予改正”处理。这次处理我的问题效率之高,并不令我奇怪,因为那时党已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极左路线受到全面批判。但是,我总觉得用“错划右派、给予改正”的具体处理方法处理我的问题,并不太合适,因为我一直认为北大没有正式把我划为右派呀!然而细想,无论如何,北大承认是错了,我也只好接受了这个《改正决定》。

我的遭遇,一直得到北大同学的同情和关注。后来一位姓李的同学来信告我。反右派斗争结束后,北大党委批准定“右派”的名单上没有我,当时是按照那份名单发改正书,因此也就没有给我发改正书,1979年为错划右派“改正”时,自然也就没有我。说我若是不去北大,怕还得不到改正书。信中还说,当时“落实办”的杨老师等不敢直接说明这种情况,怕我经受不了那样大的刺激,也不让他告诉我。

这使我想起了1986年北京机械部落实政策复查组、黑龙江省委落实政策复查组在同我的谈话中,都说过“按错划右派分子给予改正”处理欠妥的话,我向北大反映了这种意见,同年10月,我校还派张培新同我一起去北大。但后来只来过一个书面答复,其中说“根据同班同学回忆,闫桂勋确曾被定过右派”,对于有没有党委批件这个关键问题却只字未提。

我抓住问题的关键,为使对我问题的处理符合实际情况,在组织协助下,用了三天时间,终于从黑龙江省档案馆查到1957年的一份中央文件,即本文开头《纠正意见》中提到的《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文件中明确规定“凡是各单位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而定我为“右派分子”的材料恰好就

是没有经过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因此,给我定为“右派分子”的材料是非法的,是无效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北大对我的处理是错误的。

我认为用中央文件很容易判断北大党委的处理是错误的,这样明显的错误中央也不管,我感到很失望,我觉得上访、信访制度有问题,应该改革。

1997年,我们毕业40年,同学们重又相聚在北大校园里。我在会上以《同是极左受害人》的题目发言。我讲了我的问题,我要求按中央文件办事,同学们听了我的发言都感到很震惊,对我的遭遇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对我的正义要求表示支持。

在姜伯驹、盛森芝、吴兰成等同学的帮助下,一位副书记代表校党委表示可以再给我做一个结论。后来的百年校庆,又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终于在1999年元旦过后,北京大学党委给我发出了《关于对闫桂勋同志错按右派分子对待问题的纠正意见》的文件,时间是1月8日。我收到此文的正式时间,已经是1999年5月19日了。距1957年5月19日北大学生谭天荣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整整42年过去了。

但愿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我的冤案看来并不复杂,且有中央文件做根据,本该是如汤沃雪很容易解决的,却让我苦苦等了42年,这究竟是为为什么呢?我想,除了“左”的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之外,我们的党务工作干部、信访工作干部中,是否也存在着不负责任、怕负责任,甚至严重的官僚主义的问题呢?我之所以吃尽苦头,冒着风险抗争42年,只是为了求得“公正”二字,或者按通俗的表述:“讨一个说法”。也可能有人说我“痴”,我却不以为然。42年我争得的绝不仅仅是本文开头引用的那240多个字的“纠正意见书”,我争得的是真理,是我人格的尊严。42年的经历使我深深地体会到:真理是有的,但有时需要斗争才能得到。但愿历史不再重演,我们的国家不再走弯路,我们的人民不再受罪。

(责任编辑 吴 思)

著名历史学家和爱国诗人连横

□ 元 晴

今天，我们的人，包括历史学界中人，大概很少有人熟悉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爱国诗人连横先生了。

连横先生（1878—1936），祖籍福建省龙溪县马峙村（今属龙海市）。1878年出生于台湾，原名连雅堂，为台湾望族之一。其子连震东，其孙连战（即现台湾中国国民党主席）。

1895年台湾被日本从中国掠夺去，沦为日本殖民地。日本在台湾施行“皇民化”政策，即将台湾同胞都改为日本国籍，取消了中国国籍，成了亡国奴。连雅堂自不例外。连雅堂先生视此为中国人的奇耻大辱，乃秉持“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之信念，撰《台湾通史》、《台湾语典》及《台湾诗乘》等著作，铸造台湾同胞的爱国心，企望全体台湾同胞不忘自己是中国人。有两件事特别值得我们永志不忘：

其一。大概是90年代中期吧，福建厦门市地方史专家发现了连横先生归国复籍并改名的档案资料。据此资料，连横先生1919年归国寓居北京，亲自向设在北京的国民政府内务部递送请求恢复中国国籍的呈文，在领到中国国籍证书的第二天，又向内务部递交申请改名为连横。现在这些档案保存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其二。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后，连横先生一直心怀祖国，誓不做日本顺民。1931年连横先生命自己的独生子连震东（连战先生的父亲）回国报效，因而给他的老友国民党元老张继先生写了一封类似托孤的信，其信曰：

薄泉先生执事：申江一晤，怅惘而归，隔海迢遥，久缺笺候。今者南北统一，偃武修文，党国前途，发扬蹈厉。属在下风，能不欣慰。儿子震东

毕业东京庆应大学学经济科，现在台湾从事报务。弟以宗邦建设，新政施行，命赴首都，奔投门下，如蒙大义，矜此孑遗，俾得冯依，以供使令，悻载之德，感且不朽。且弟仅此子，雅不欲其永居异域，长为化外之人，是以托诸左右。昔子胥在吴，寄子齐国；鲁连蹈海，义不帝秦。况以轩黄之华胄，而为他族之贱奴，泣血椎心，其何能恕！所幸国光远被，惠及海隅，弃地遗民，亦沾雨露。则此有生之年，犹有复旦之日也。鍾山在望，淮水长流，敢布寸衷，伏维亮鉴。顺颂

任祺不备。

愚弟 连横顿首 四月十日

同时他对儿子震东说：“欲求台湾之解放，须先建设祖国。余为保存台湾文献，故不得不忍居山地也。汝今已毕业，且谙国文，应回祖国效命。余与你母将继汝而往。”（见连震东《先父生平事迹略述》）

以上据民主促进会刊物《民主》杂志记载。

不久，连横先生果然携夫人回到祖国。1936年，连横先生因患肝癌，逝世于上海，骨灰带回台湾。时值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连夫人随其子震东逃难到西安，后亦因病去世，遗骨安葬在西安清凉寺。连战于1936年8月27日出生于西安。

连横先生殷切期望的台湾“复旦之日”，即台湾光复回归祖国，已在连横先生谢世十年之后了。连横先生托孤，以“子胥在吴，寄子齐国；鲁连蹈海，义不帝秦”作比，可谓义薄云天。连横先生无论居台或归国，均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台湾“复旦之日”，“家祭毋忘告乃翁”——我想，当年连横先生离世时对其子孙恐怕也是怀着这种内心情结的吧？

从晚清举人到共产党员

□ 王 勇

吴承仕(1884-1939),字检斋,安徽歙县人,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经学家、古文字学家和教育家。他从一名清末的举人,最后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

吴承仕生长在一个富有家学传统的士大夫家庭,很早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养和熏陶,为后来专门从事国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01年,17岁的吴承仕考中秀才。1907年,清廷举贡会考,他以一等第一名被录取,时年23岁。吴承仕虽然参加了清朝的科举考试,但他的青少年时期正是旧中国逐渐衰败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动乱年代,目睹祖国山河破碎、民生凋蔽,他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民国初年,他曾出任司法部金事。

1927年4月28日,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杀害了李大钊等革命者。吴承仕闻此噩耗,极其悲愤,他迅即辞去司法部金事之职,以表明其不与反动政府同流合污的鲜明立场。从此,他离开仕途,潜心治学执教,历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民国大学、东北大学等校的教授和北京师大国文系主任、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

吴承仕对我国古代学术的研究十分广博。在经学、小学、史学、诸子、佛学、诗文、各种笔记以及戏曲小说等方面,都有很大建树。对于经学及小学的研究,更是成就斐然。当时,他与另一位经学大师黄侃(黄季刚)齐名海内,黄在南京执教,吴与北平讲学,时人誉为“南北两经师”。

二人都师从于章太炎,章太炎评价吴承仕“文不如季刚,而为学笃实过之”;甚至说“及吾门得辨声音训诂者,其惟检斋乎!”

作为一位爱国学者,吴承仕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偶然的。1930年秋,吴承仕的朋友、著名教授范文澜因共产党嫌疑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后经共产党的多方营救才得以获释。吴承仕感到,象范文澜这样勤于治学的老实人都参加共产党,那共产党一定有道理。于是在去看望范文澜时,他坦率地要求范把共产党的书籍拿给他看。范文澜先借给他一本《共产党宣言》。看过后,吴承仕对范文澜说:“这本书讲得很有道理,难怪你要去参加共产党。”从那以后,吴承仕不断地从范文澜处借阅一些革命书籍,两位学者的思想更加接近,友谊也更加深厚了。

“九一八”事变以后,在进步学生齐燕铭、张志祥(均是吴的得意弟子)等人的帮助下,吴承仕更加广泛系统地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努力寻求真理,接受新的思想。这位钻研古籍数十年的经学大师,终于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从那以后,他努力以马列主义观点来治学。当时他任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在他的倡导下,该系新增设了社会科学概论、新俄文学选读、西洋文学史,近代文艺思潮和中国通史等新课程。他开始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观点讲授经学和中国古代历史,成为我国第一位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从事经学研究的学者。

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吴承仕以抗日救亡为己任,他说:“现当民族危机迫于眉睫的时候,只有集中一切力量作抗日救亡的决战,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1931年,他担任北师大教授联席会议主席,积极领导北师大文史两系的教授对日本侵略者进行口诛笔伐,还同数十位教授联名通电全国,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奋起抗日。从1934年至1937年,吴承仕在北平先后创办了《文史》、《盍旦》、《时代文化》等杂志。这些杂志发表的文章,大力宣传爱国抗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本质,同时以犀利的笔锋,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所以都出版不长时间,即先后被反动当局查封。

1935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年近花甲的吴承仕,怀着抗日救亡的满腔热情,积极参加了这场运动。12月9日当天,他站在中国大学学生们的行列里,去新华门前集会,又和青年们冒着军警大刀、水龙的威胁,参加游行示威。他还联系大学的教授,组成教育界抗日救国会,以支持学生运动。

“何梅协定”签订后,平津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章太炎几次邀请吴承仕离开危城到南京中央大学和苏州章太炎主持的国学讲习所任教,但吴承仕已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于支持爱国青年抗日救亡的进步活动,因而谢绝了业师的邀请。

1937年“五四”运动18周年纪念之际,吴承仕和张友渔、张申府等进步教授发起组织“新启蒙学会”,由吴承仕具体领导。他亲自起草了学会《宣言》,提出“唤起比较多数知识分子,成为时代革新的中心力量”;号召“把握住民主自由的原则,在反独裁、反盲从、反迷信的一贯信念之下尽力完成我们应该做的工作,争取当前民族解放的胜利”。该学会积极开展民主运动,得到知识界热烈响应,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

吴承仕还利用自己在教育文化界的声望和影响,千方百计地营救了不少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的进步学生和革命志士。经过多年的锻炼和考验,吴承仕于1936年秋,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

吴承仕由一位清末举人、经学大师而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不久北平沦陷。日寇、汉奸到处搜捕爱国抗日人士,吴承仕的名字也被列在黑名单上。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他匆匆离开北平,避居在天津英租界。他刚刚离开北平,日本侵略者就出动军警到吴宅去逮捕他,结果扑了空。

在天津,吴承仕的生活很不安定,先后搬过几次家,很少与北平家中联系,经济也日益拮据,到后来只能靠出售藏书来维持生活。为躲避日寇和汉奸特务的搜查,他深居简出。尽管处境危险,但他仍然在天津坚持抗日救亡活动。

1939年夏秋之交,天津闹水灾,大水涨进吴承仕的卧室,他终日断炊,生活陷入绝境。加上英租界当局与日寇加紧勾结,在天津的许多抗日志士被捕,情况十分危急。吴承仕在天津已经无法工作,于是秘密回到北平。由于在天津动身时就身染疾病,再加上旅途劳累,吴承仕到了北平就病倒了,经诊断为伤寒症。9月11日,家人将他送入协和医院治疗。9月21日,吴承仕不幸病逝。

党中央一直在关怀着这位革命的老学者。在他困居津门时,毛泽东同志曾派人去天津,打算接他赴延安,后因遇到大水而未接上头。吴承仕逝世的噩耗传到延安后,1940年4月16日,延安各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周恩来、吴玉章等同志都送了挽词、挽联。毛泽东的挽词是“老成凋谢”;周恩来的挽联是“孤悬敌区,舍身成仁,不愧青年训导。重整国学,努力启蒙,足资后学楷模”;吴玉章的挽联是“爱祖国山河,爱民族文化,尤爱马列主义真理,学贯中西,善识优于苍水;受军阀压迫,受同事排挤,终受敌寇毒刃摧残,气吞倭虏,壮烈比诸文山”。这些联句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吴承仕的深切怀念,也是对他一生的崇高评价。

(责任编辑 吴 思)

“防民之口 甚于防川”

□ 李 凌

韩愈(768-824)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复杂的历史人物。历史上对他毁誉交加。有人批评他把人性分成上、中、下三品,把封建等级性的人格,说成是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有人赞扬他在《师说》一文中主张“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而“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闻道者都可以为师。当然,韩愈最显赫的成就是他提倡古文运动,他的文章“凌云健笔意纵横”,所谓“文起八代之衰”,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特别应指出的是:他不怕触犯唐宪宗,上书反对迎佛骨,结果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其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但我这里要谈的,只是韩愈写的四言古诗《子产不毁乡校颂》。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郑国执政的是子产,当然有一些议论是比较尖锐的,甚至有些可能是怨恨、攻击子产的话。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吾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对子产的作法十分赞赏。《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仲尼闻是言也(按指上述子产的话),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仁”是孔子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他是不轻易以“仁”许人的。为什么

孔子对子产给予这样崇高的评价呢?因为这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举其中。”(《左传·襄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都能及时表现出来,使人们对两端都能及时了解分析比较,然后采取措施,“善者吾从,恶者吾改”,否则就会酿成大祸。子产所说“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正确的措施,导致了良好的结果:子产执政的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其可谓“众口嚣嚣”,仇恨到了极点。但是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压迫(毁乡校)的措施,而是如韩愈所说的“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舆(众)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左传·襄公三十年》)郑人对子产的态度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事例,这就是《国语·周语》中的周厉王信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在路上熟人相遇,不敢交谈,只能以目示意)。厉王自以为得意,“告召公曰:‘吾能弭谤耳,乃不敢言!’”召公是大臣,他劝告厉王说:这是阻塞言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召公建议厉王采取多种方法,听取多种人的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今山西霍县境内)。”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几百年前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上述子产关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是很相似的)。

“肠梗阻”

□ 杜导正

医学上说肠梗阻，指很长很长的肠子，中间一段患了什么病症，使肠子上下不通了，堵塞了。一日我坐北京出租汽车回家，司机四十岁，文文静静的，在车上说了一大通某些地方行政似也患肠梗阻弊病的话，很发人深省。他说：“我去年从一个工厂下岗，到这家出租汽车公司当起司机来。车是公司的，我包车，一月上缴公司

四千五百元，小修与汽油由我包。我每日工作十二个小时，赚的钱几乎全上缴了。我所剩无几。养一儿，两岁，入托，月开支四百元；妻子在齿轮厂，不景气，月收入五百元。”我说：“你若买下一辆车自己开呢？”他说：“问题正出在这儿。我们这里出租车现在基本不准私人买车私人开。如准，我日子好过了。”他还说：“这种出租车公司，国营，养了大批管理人员，不管事，只管收费，吃我们。国家其实也拿不到多少。”我说：“你们为什么不给市里有关领导人写申诉信呢？”他答：“没有用，老百姓的申诉信很难送到领导人的手里。”这当然是一个人的说法，这说法也不一定准确。但我想，老百姓现在不如意的事许多。如果下情不能充分上达，上边又不大了解下情，坐在办公室听汇报，汇报都是好好好，这么下去，我很耽心呢！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见”。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导致了两种结果，一成一败，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当然，他是从巩固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的。但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却有着普遍的意义。管理一个国家也好，管理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也好，必须采取种种方法，使各方面的意见都能及时充分反映出来，然后大家讨论，斟酌损益，及时采取措施，解决问题。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像周厉王那样，被国人赶下台。即如韩愈诗中所说“下塞上聋，邦其倾矣！”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人就有这样高的政治智慧，应属炎黄文化精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和今后都应大力发扬。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止一国”，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他认为天下之所以不得治理，就是由于不得其人。他不知道，在古代的封建社会，像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长期重用的。纵使一时能上台掌权，也往往会被保守势力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也必将后继无人，其改革、善政也会遭到破坏，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今日之中国已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人们期盼的不再是圣君贤相，也不是作风民主的开明领

导人，而是民主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可以以社会主人的身份监督、议论“执政”。良好的民主的制度还能使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各级重要的领导职务；使那些不称职的和胆敢为非作歹的人，到他们应到的地方去。

现将韩愈的《子产不毁乡校颂》抄录如下，括弧内的话是我加的注。

“我思古人，伊郑之侨（侨，子产的名）。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遊于乡之校，众口嚣嚣。或谓子产：‘毁乡校则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岂多言？亦各（言）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通过这些言论，我了解民意）。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周朝兴盛的时候，曾奉养一些年老而有知识的人，请他们提意见，帮助把国家治理好。《诗经·大雅·竹芻》的序中有说明）；及其已衰，谤者使监（指周厉王派卫巫监视并镇压批评国政的人）。成败之迹，昭哉可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是道，相天下君，交通旁达，施及无垠。於虖（同呜呼）！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

“速成写作法”创造者的人生际遇

□ 孙君仙

黑龙江省农垦师范专科学校校园内西北角,有座榆树篱笆院,碧绿的枝茎纵横交错地缠绕在一大圈木栅上,形成一堵疏密相间的绿墙。这里便是“速成写作法”和“分格作文法”创造者常青教授的家。

不测风云

1927年10月,常青(原名常庆)出生在河南栾川县的一个小山村,父母务农。

1948年,家境贫寒、求知欲很强的常庆,穿着布衣布鞋,腰里系着装有几个窝窝头的小包袱,初次走出深山,扒上火车,去开封报考管吃管穿的师范学校。他历尽艰辛到了开封,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外省的一所师范学校。但因战乱,铁路不通,被录取者必须乘飞机前往学校报到。那年月,坐飞机对于一个农家的穷学生来说,难于上青天。

正当常庆在大车店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初中时期的语文老师张大伦出现在面前。张老师劝慰他:“你年轻的,有啥愁的?走,上我家去,人生在世,不就是一天一斤面吗?等路通了再送你回家。”

常庆打量着张先生的一身国民党少校军服,心里纳闷:几年前国民党军警来学校抓张老师时,是常庆和另一位同学蹲在厕所的墙根下,让张老师踩着他们的肩膀跳墙逃跑的,怎转眼几年变成了国民党呢?张老师看着他的满脸疑惑说:“你还年轻,不懂。”

常庆和同学在张大伦老师家住了几天,便冒着生命危险奔赴解放了的洛阳,考取了共产党办的北方大学,校长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此后,他因怕自己参加革命连累家庭,便改名为常青。年底,常青参了军,参加平津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他被选送到军政大学学习。

1952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建设一支现代化军队的号召,全军开始向文化进军。时任华北军区第二高级步校文化教员的常青,继祁建华总结成年人扫盲经验推广“速成识字法”后,他苦心钻研,发明了以“我写我”为核心的“速成写作法”。在这一新的写作教学法推动下,出现了工农兵的写作高潮,高玉宝的《半夜鸡叫》、崔八娃的《狗咬起来了》,一时脍炙人口。

1953年,常青连晋两级,被授予特等功臣。他的事迹,《人民日报》、《解放军画报》都曾予以报道,八一电影制片厂还摄制了有关他的事迹的新闻纪录片。

然而,风云突变,一夜之间,常青的命运莫名其妙地跌入谷底。

1955年,常青被怀疑与“胡风集团”有关,被隔离审查两个月。此事刚刚查清,中学老师张大伦以国民党特务的罪名被河南法院判刑,推论常青参加革命也系张大伦派遣,常青又成为“特嫌”,不被重用,于1958年转业到北大荒,在黑龙江垦区的金沙农场中学教书。尽管常青被迫转业时,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肖华上将曾有“对其生活和工作要妥为安置”的批示,但是“文革”一到,还是把常青第一个揪了出来,到处

游斗。

常青转业到黑龙江后,多年来苦心经营,并在其“速成写作法”基础上,总结、发展、推广的“分格作文法”,也成为批判重点。在批斗会上,造反派把他捆起来逼问:“你在‘分格作文法’中,只讲七情,为什么不讲阶级情?你这是公开否定阶级斗争!”

常青毫不示弱,他辩护说:“七情是人之常情,它包括了阶级情。喜怒哀乐爱恶欲,每一种情感中都包括有阶级因素。”

造反派一个恶棍,穷凶极恶地用电工刀向常青嘴上戳去。他的嘴唇破了,一颗牙齿掉了,面部落下了麻痹后遗症。

在北大荒农场,什么苦活、累活他都干,甚至是开山炸石,点炮,冒着生命危险去排除哑炮……

志在千里

“文革”后期,常青受到老战友敖伯林的关照,特意派他去偏远的地方看水库和果园。在那八面透风低矮的草棚里,常青把一根木桩钉在地上,再把一块木板钉在桩上当桌子,后又如法炮制三个凳子。他争分夺秒追回以往流逝的黄金时间,终于完成了他的“分格作文法”研究;写出了30多万字的著作《叩开想象之门》,并运用“分格作文法”创作了一部37万字的长篇小说《三色水》……

1977年,一辆吉普车“嘎吱”一声停在常青的小窝棚外,不知所措的常青,却得到一个惊喜:来者宣布了调他去牡丹江农垦师范学校任教的决定。原来,刚刚成立的学校急需教师,他捧着三本著作的初稿走出窝棚。

常青到师范学校后,如鱼得水,他既教写作,教作品分析,又教文学概论,一周讲授18个课时。第二年,他被调到黑龙江农垦师范专科学校任副校长,并晋升为副教授。他的“分格作文法”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开始在全国四大垦区和十二个省区的一些中学推广。《光明日报》等27家报刊介绍了他的科研成果,他在小窝棚里完成的著作相继出版。



居中者为常青夫妇,右一为作者

曲折婚姻

1955年,已成为特等功臣的常青,在北京结识了一位在部队工作的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的女记者,后来成为他的妻子。

1956年,常青因受老师张大伦事情的株连,被隔离审查后,即将临产的妻子拖着笨重的身体去探望他,并含着泪劝他:“常青,你有什么就向党交待吧!你为党和人民做过一些贡献,组织上会宽大处理的……下个星期,我们的孩子就要出生了,我希望孩子出生时,有你守护着我,希望孩子能见到他的爸爸……”

面对爱妻,常青恸哭失声。

常青的问题终于结案处理了。特务嫌疑不能排除,团籍被开除,保留干部待遇作转业处理。

常青拒绝在结论上签字,但这并不影响处理决定的执行。面对这一严峻现实,常青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决定用最冷酷的态度,结束温暖的家庭关系;与妻子离婚,使妻子与未见过面的孩子不受牵连。

在当年谈恋爱的地方——中山公园一张椅子上,常青说:“从感情上讲,我实在不愿也不忍心离开你,我们结婚毕竟还不到两年,生活才刚刚开始。但是,我们不能不分手,我们必须理性地来处理我们的关系。”

“不!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让我离开你?”妻子痛苦而坚定地喊着。

常青压抑着心里的悲伤,耐心地劝慰着:“你家庭出身不好,本来就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如果再有一个‘特嫌丈夫’,还怎么在部队、在新闻战线干下去?”

那天晚上,他们坐在公园里流着泪谈了很久很久。妻子犹豫了,征求过曾在中央党校任教的姐姐和姐夫的意见后,送给常青一本苏联小说《希望》,就这样,两人流着泪分开了手。

1957年,常青的戎马生涯将要结束,前面等待他的,是严峻而冷酷的考验。这时,某部医院的护士长郑玉萍走进他的生活。常青当时十分为难,唯恐别人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罪名伤害这位善良的女性。可郑玉萍坚定地说:“我不怕!我出身贫农,中共党员……”这位出身贫苦的白衣战士挺身而出,坚定不移地要陪同自己心爱而敬佩的人转业到那寒草衰烟、满目苍凉的北大荒。1958年4月,常青和新婚妻子郑玉萍终于一起转业到北大荒完达山脉的八五五农场二队。在以后漫长而苦难的岁月里,夫妻俩相濡以沫。使他们感到欣慰的是,他们的几个儿女相继来到了人间。

1989年,伴随常青度过了30多个寒暑的妻子郑玉萍,带着刚刚获悉丈夫彻底平反的慰藉,带着对生活对丈夫对儿女们不尽的留恋,离开了人间。

现在,常青教授卧室的墙上,还挂着郑玉萍青年时代在部队的肖像。神气的领章帽徽,清秀漂亮的脸庞,薄薄的双唇含着甜蜜的微笑。

1992年,常青和赵淑芹结合了。在日常生活中,淑芹给丈夫端茶倒水、洗衣做饭、操持家务,是常青饮食起居的得力助手。平时,他在写作时,感到自己晚年有这样一位妻子陪伴在身旁而宽慰。

几十年过去了,常青教授虽两次获得新的

家庭生活的宽慰,然而无法挥去他那埋在心底的家史上的创伤。

1985年,常青去深圳出席一个教学研讨会归来,在广州白云机场候机室,几位专家忧国忧民地谈起了独生子女教育将给中国带来的影响,认为应该对独生子女进行艰苦朴素和准备经受挫折的教育。来自北京的一位教授列举了邻居的事例:他邻居家有个女孩,父亲被“发配”到北大荒,她年纪轻轻参加工作,每天上班路上,腋下夹着饭盒,手里拿着一本外语书,边走边看。恢复高考后,她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外语系……今年将要去加拿大。

常青一听,猛地一震,迫不及待地问:“她,她母亲叫什么名字?她家住在什么地方?”当他听到前妻的名字时,差一点晕过去。

岁月蹉跎,人海茫茫,女儿呀,你和你妈妈现在何方?多少年来,常青一直在心里挂牵着她们母女,因为怕连累她们,他一直不敢给前妻去信。直到“文革”结束,他才开始打听女儿的下落,可前妻已去向不明。常青在失望中,心里常想:女儿呀女儿,今生今世,难道我们父女就无缘见上一面吗?

常青当即动身,终于出现在那幢楼前。但上班的人纷纷往外走,他站在门口,心情紧张又激动,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每一个人,竭力想认出前妻。27年的凄风苦雨、刀剑寒霜,她会变成什么样?他想先征得她的同意,然后再见女儿。上班的人走光了。常青失望地走进电梯。他忍不住问开电梯的人:“请问××同志在家吗?”

“刚才最后一个出去的,穿白底黑点裙子的,不就是她吗?”

啊?见过这个女人,怎么没认出来呢?27年了,她老了,我也老了,女儿都27岁了……

“她女儿在家吗?”

“在。马上就要出国了。”

常青激动不已。当他叩开前妻家门时,一位亭亭玉立的姑娘站在门口,疑惑地打量着眼前这位陌生人。常青端详着女儿,极力在她脸上寻觅着自己和前妻的印迹。

“你找谁?”

“我从黑龙江来。”

“啊……您进来吧……”姑娘的声音颤抖了。两眼闪烁着泪花,“你是我爸?”

多么想拥抱一下女儿,他没有拥抱;多么想抚摸一下女儿,他没有抚摸。27年来,从未见过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

女儿颤抖着给父亲倒杯水,水顺着杯壁流在茶几上。

27年的漫长岁月,多少企盼,多少辛酸,多少磨难,多少思念,女儿颤抖着从抽屉里取出一幅自己的照片,送给了父亲。父亲看看照片上的女儿,又看看眼前的女儿,两眼闪着泪花。

女儿用手帕包些钱,系在手腕上,对父亲说:“爸,我们出去走走吧……”

父女到了中山公园,女儿指着一张椅子说:“爸,坐一会儿吧,我妈常领我来这儿,就坐在这里的椅子上……”

常青默默地抚摸着椅子,一阵酸楚,历历往事涌上心头。他和前妻恋爱告别时,就坐在这把椅子上。她给他读普希金的诗,给他唱苏联歌曲;分手时,也坐在这里,泪洒衣襟,握手道别。现在,椅子仍在,一切皆非……

1989年,张大伦的问题终于得以查清:

“张大伦同志是我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情报人员,他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

同年,常青的历史问题也得以彻底平反。为常青落实政策的北京军区的几位军官,望着历尽磨难、饱经沧桑的常青,敬佩地说:“您在那么大的政治压力下仍做出那么大的成就,太了不起了!如今,您不仅是教授,是作家,还是全国优秀教师,您太了不起了。”

常青望着这群年轻的军官,无限感慨:他就是这样年龄离开北京军区的,他坚信,他眼前的这些年轻军官,不会重踏他走过的路。

怀揣北京军区平反决定的常青和仍然健在的第一个妻子在一位朋友家相见了。他把平反决定递了过去,前妻早已泪涕满面。它来得太迟了,30多年的岁月过去了,一切都无法挽回。

“这难道是误会吗?”前妻仰天自语。

“不,不是误会,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时代,这是必然。”常青说。

“你,走过了多么漫长的铺满荆棘的路哇!”
临别,前妻又为常青背诵了一段普希金的诗句:
牢狱会崩塌——
而在门口,
自由将欢心地将你拥抱……”
一切该过去的,不该过去的,都过去了。

金秋硕果

自常青回到教育战线后,南方的许多大学想把他调去工作,并答应一系列优惠待遇,但常青没走,他坚持留在北大荒垦区的阿城郊外的农垦师范专科学校。

1996年,常青已经退休。他退休后,最大的心愿是:渴望在有生之年再见见定居加拿大的女儿;也渴望抓紧时间完成一套九年义务教育中的作文系列专著。1999年4—5月,常青在草拟这套专著的间隙,应邀到各地讲学,他不顾年迈,只身万里,一个月内讲学八次。他讲学的题目是《作文要走出朦胧》。

1999年9月,为迎接建国50周年大庆,常青的一套四册书稿,终于出版发行。这套适应小学、中学提高作文水平的《分格作文法》,开创了作文教学科学化的先河。它将结束千百年来作文教学中的混沌和朦胧。

常青事业有成,儿女们也很有出息。

在加拿大获温沙大学硕士学位的女儿,从事文学创作,有很好的悟性,她创作的长篇小说《红浮萍》,获得了加拿大华人优秀文学奖。

长子常新港也是作家,大儿媳李萍在哈尔滨某杂志社任编辑。次子常新航任黑龙江农垦师范专科学校艺术系主任,二儿媳罗彩云在该校中文系任教。女儿常小波在阿城电大当会计师。

常青教授的晚年是幸福的,常去他家的人,每每看到他和妻子提着筐子或提兜的身影,出没在果树林或自家的豆角架中,都不免发出这样的感叹:夕阳无限好,何愁近黄昏!

(近悉常青同志于今年2月23日因病不幸逝世,特于本期发表此文,以寄哀思——编者)

(责任编辑 洛松)

教师节忆名师

□ 毅 生

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逐渐深入人心，科教兴国成为社会共识的今日，想到又一个教师节的迫近，不禁心潮难平，朝华夕拾，寄出下面这些篇什，记下我对恩师们的怀念。文拙意诚。读者可以从这些往事的记述中，领略前辈专家学者的懿范和高风亮节。

孟森教授与吴晗的忘年交

20 世纪的 30 年代初，北京北海西邻，文津街东端的一座蓝色琉璃瓦饰顶、雍容大雅的建筑群落成了，这便是著名的北京图书馆。国家的许多珍本秘笈，诸如元代《经世大典》、《明实录》、清故宫档案和仅存的名人笔记、日记等都有了安居之所。

此后不久，北京图书馆又不惜重金，购进了朝鲜《李朝实录》。这是关于朝鲜近古史的珍贵资料，为政治和学术界所重视。从此，几乎每天八点前后，总有一位七旬老翁，夹着笔记簿，从北京大学沙滩宿舍出门西行，走过团城，直进图书馆。这便是到善本部阅览《李朝实录》的中国著名明清史专家孟森教授。与此同时，从府右街西面常常有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迎着初升的朝阳，也转进了这崭新的图书馆，他也是来借阅和抄录《李朝实录》的。这青年是清华园的研究生，浙江省义乌人氏——吴晗。

这一老一少，每天或是在馆门前台阶上相遇，或是在借书台前碰面，渐渐由路人变成了朋友，特别是他们同阅一套书，真正成了“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两人关系越来越亲密。孟老

惊讶地发现：眼前这青年，不仅文史功底好，英语水平不低，而且热情豪爽，肝胆照人。吴晗对老人执弟子礼，孟老先生更是白发童心，最终说道：“我们是忘年交！”

我读北大晚，没赶上师从孟森先生，但我拜读他的《明、元清系通纪》，高山仰之，令人钦佩之至。他博学而识之，往往能发前人之所未发。我至今也不能忘记他在该书中一句明睿的学术论断：“凤州即开元，（后）金于虚出（阿哈出）所居也。”百年来，许多研究清朝开国史的学者都念过这段，也许是出于对历史地理学的陌生，竟误指开元为开原，把凤州当作奉州。这个错误，竟把满族始祖发祥地的绥芬河改变为辉发河，结果谬之千里。

吴晗治学勤苦，又承胡适与孟森先生诸前辈的指授，故在学术上的开拓，既广且深。

马寅初、吴玉章两校长重视体育

马寅初校长是浙江嵊县人，诞生于 1882 年，逝世于 1982 年，松龄鹤寿。他少时即好学敏求，后入北洋大学，明辨而多思。他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故有人称他“双料博士”。他的名著《新人口论》，超脱于马尔萨斯的时代局限，为新中国人口素质的提高和计划生育，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他虽然被误解，遭批判，但他本着对科学的良知和热爱祖国的赤诚，坚持自己的学说，他终于被证明是正确的。

马老于五四时期任北京大学教务长，抗战



图为北大沙滩红楼外景

时期因抨击国民党的贪污腐败，曾被关押于集中营。出狱后执教于重庆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于1951年出任新北大的第一届校长。

马寅初执长北大时，已晋七旬之年，可是他精力充沛，有一种爽朗乐观的气度感染人。他很爱护和关心学生，记得他一次给我们讲话，从治学为人到身体健康，谆谆告诫。他说：你们不愿作东亚病夫吧！要作东方的雄鹰和雄狮：要天天锻炼。我赞成你们每天下午都锻炼一小时。陪同马老的秘书从旁插话道：“马老每天早起，洗漱后就去爬景山，从不间断”。我们听了颇受启发，也感到惭愧。因为当年北大的学生，“夜猫子”居多，晚上“开夜车”，养成早起锻炼的习惯是很不容易的。

吴玉章校长（1879—1966）是四川荣县人，他是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的重要成员，辛亥革命后又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将近花甲之年，他毅然参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若非有坚贞的革命意志和坚强的体魄，是难以战胜困难的。新中国建立后，他任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任校长。

吴校长爱护教师和学生的佳话很多。有一

次他到西郊人民大学的年轻教师宿舍看望，那时条件简陋，吴老说：保护老师们的眼睛重要啊！他立即责成后勤部门为每位老师配一座台灯，换一个写字台，买一把软座垫的椅子。这在50年代初，是近乎豪华和阔绰的了。人民大学落实了吴老的指示，给首都其他高校作出了表率。

当时，我在人大作研究生，一个深秋的傍晚，七旬开外的吴老到铁狮子胡同一号来给我们讲话，搬给他的藤椅不坐，站着讲了近两个小时。他还对坐在“马札”上听讲的同学说：今晚天气凉了，你们行吗？我是行的。你们要锻炼身体，因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时我们才注意到，他穿的比我们年轻人还单薄。

白寿彝重史德 翁独健贵友谊

在那乾坤颠倒、是非混淆的“文革”十年间，“四人帮”到处煽风点火，蛊惑人心，所谓的“评法批儒”，便是其罪恶之一例。

在“评法批儒”的高潮中，中国历史博物馆奉命举办一个关于“评法批儒”的展览。预展时，请了些历史学家审看，白寿彝先生被邀，我也忝列其中。那时言路阻塞，动辄得咎，好些人看过展览，明哲保身，讷讷不敢言。白寿彝先生却不然，他既有睿智，更有铮铮硬骨。审看时，白先生便很认真，对解说词一一过目（我是草率应付），特别是在孔子和秦始皇的画像和解说词下，他驻足细看，并当场向陪同的馆领导提出不同看法。座谈时，白先生诚恳地认真地说：历史博物馆要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人民。孔子是儒家老祖宗，他有不好，然而他在教育上、文化上和思想上给中国留下了丰富的遗产；秦始皇的解说词，只说了他的伟大功绩，对他的过错却不置一词，这样不恰当。他焚书坑儒，尽人皆知，还有别的问题，也该指出来。白先生这一席话，真是金玉良言。不仅馆领导感谢之至，我在旁也受到教育。

中国的史学传统，有秉笔直书的董狐，也有

曲笔阿时的魏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中,立“史德”篇,主张“善善而恶恶,褒正而嫉邪”。如白寿彝先生者,刚正不阿,给后人留下了史德的范例。

翁独健先生在燕京大学时与地理学家侯任之是好朋友。文革中,“四人帮”组织名为“梁效”的写作班子,想把侯先生拉进去。翁先生有所风闻,便约侯先生到南池子家中相叙。他说道:四川新发现的大足石刻很有价值,你抓紧去看看;云南气候好,又有元谋人的遗址可考查,你何不一路走走,去看看。侯先生是个聪明人,回去品味翁先生的话,便心领神会,不日就西行入蜀,躲过了牵连,躲过了一场劫难。

听王明讲婚姻法、杨献珍讲哲学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倡导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传为佳话。其实,新中国成立之初,北大也常设讲台,邀各界学者或中外政要来讲演。我们自愿参加,并非组织安排。

记得婚姻法公布不久,北大学生会请鼎鼎大名的王明来讲婚姻法有关问题,地点在红楼北边的民主广场。那天下午,我在楼内资料室查书,只听得窗外不时爆发阵阵掌声和欢笑声,便被吸引而坐到窗口去听。越听越有味,便弃卷洗耳恭听下去。我扫视诺大的万人广场上,不仅本校许多人听,还有邻近单位来的。对面是灰楼,也有许多人打开窗户听。民主广场东边是一道矮墙,墙外便是北河沿街道。我看见街上骑自行车的、拉黄包车的,不少人停了下来,在街边静立凝神地听。王明口若悬河,讲了足有半个小时,我们听得很投入。可惜那时没有录音,若录下这篇生动的讲演来,便也很有意思了。

杨献珍在50年代曾任中央党校的校长,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请他给研究生讲辩证唯物主义,我怀着敬仰的心情,跑去一睹丰采。献珍同志讲课深入浅出,能把抽象的哲学概念,以具体生动的形象表达出来。我记得他讲“无的放矢”时,便比喻说:“用机关枪扫射垂杨柳,噼哩啪啦扫一通,柳树叶掉落满地,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全场听罢顿形活跃,

对其含义也心领神会了。只因听了献珍一次讲话,在他为“合二而一”被批判时,我远隔门墙,不知他境遇何如,空怀怅惘。

朱光潜、朱庆永 与贺麟三教授的谦逊

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在我们中学时代,是与冰心的《寄小读者》同样受到推崇的。抗战八年时,光潜先生与武汉大学一块儿迁到四川乐山县,与乌尤寺旁的临江大佛隔岸而居。我那时在乐山念武大附属高中,对朱教授十分敬仰。也许自己是农村孩子的缘故,却未曾想到去闽府拜谒。稍后,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朱先生任北大西语系教授。我于1948年考入北大,虽专业是历史学,但有兴趣于外语,便选修了朱光潜先生的“英诗赏析”这门课,每周可以聆听教言,增进了阅读和欣赏的能力。

光潜先生个子不高,身体显得有些单薄,但精神却很好。他上课从不晚到,讲授内容丰富,态度很认真,特别是对本系学生要求很严格。对外系学生则不常提问,使我只感到亲切而不感到压力。一次,课间休息时,我特地向朱先生问好,他听出我川西的口音,便亲切地说:“四川是好地方,乐山更好。乐山兼有山、水、平原之胜,我很怀念在那里的岁月。”北大迁到燕园以后,我曾回母校见到过光潜先生。但经过历次思想改造和对他美学的批判后,老教授显得颜色憔悴,意绪萧然。后来他逝世了,我也未能去悼唁。而今思之,不禁怆然憾然!

朱庆永先生原是辅仁大学的教授。1951年院系调整,合并来北大。他仪容伟岸,广额方颐,但面带微笑,令人亲敬。那时,教授罕有访问学生宿舍,但庆永先生在下午无课时,深入到东华门东北侧的三院宿舍来看我们,他娓娓而谈,没有一点教授的架子。我曾去过不少教授之家,但教授到学生宿舍探视,这却是我第一次亲历。

贺麟先生是北大哲学系的教授,是中国通晓黑格尔辩证法的老专家。他虽然在当时学问和地位都很显赫,为人却十分谦逊。记得一次见

他接电话：他从座位站起来，很礼貌地敬问道：“您是哪一位？”对方通报姓名后，说要找他。他于是谦抑地回答道：“我姓贺，有什么事需要我去办么？”当听完对方的叙述，结束谈话时，他仍然站着，等对方挂断电话后，他这才放下听筒。孔子说：“临事必敬”，我知之而未详，是贺先生所为，使我懂得了这句话的真谛。

“学问如海 士林所宗” 的雷海宗先生

雷海宗先生并不是我的业师和指导老师。他执教于清华，北大历史系聘请他作兼任教授，主讲中世纪世界史。我是慕名趋前听课者之一。他的课深深地吸引了我，打动了，使至今已届七十之年的我不能忘怀。雷海宗先生讲课不仅内容丰富，且妙趣横生，循循善诱。

记得当年夏令时节，听课学生往往疲倦发困。有的先生或大声警示，或掷小粉笔头告戒，雷先生则不然，他往往忽出妙语，使大家精神为之一振，活跃起来。记得一次他忽地问道：“你们谁是江南人氏？给我对个对联何如？”随即说上联曰：“无锡锡山山无锡”。全堂哑然，雷先生随即说出下联：“平湖湖水水平湖”。待大家提起精气神儿，连称妙对时，雷先生转入正题了。我后来在大学当老师，时常想着如何使课堂气氛严肃与轻松兼而有之，让学生有张有弛，悠游涵泳，应该说，是雷先生的启示。

西欧的中世纪，被称为 Dark Age，意即“黑暗时代”。当长安的唐代文明光华璀璨之际，欧洲却沉睡着。雷先生在讲西欧这近千年的寂寞时，把罗马教廷与诸侯王国的矛盾斗争，讲得生动而引人入胜。罗先生讲德意志国王亨利四世与教皇格列高里七世尖锐斗争故事时的神态，至今还历历在目。

雷先生讲意大利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勃起，让我们认识到：人不是皇权和教权的奴隶，人是独立的，属于自己的。文艺复兴就是思想解放。欧洲的近代文明，便奠基于此，开始于兹。

金毓黻与罗尔纲先生佳惠学林

金毓黻先生是我在北大时的老师。他曾执教于东北大学，在日寇侵袭之际，他撰著《东北通史》，以笔作刀枪，抒发爱国抗日的胸怀，继而，他又编纂卷帙浩繁的《辽海丛书》，哺育了广大的东北学人。该丛书收录了许多珍本秘笈，其中便有金代官员王寂撰写的《辽东行部志》。金先生知道，王寂还撰有另一书，便是《鸭绿江行部志》，但抄本无多，仅知有一部在北京某先生之手。于是他多次恳请为之付梓并致酬，但终未得实现。

金先生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因研究东北边疆问题，曾多次考察白山黑水，并访书于长春、大连和辽宁的图书馆。在寂寞辛劳的查阅访求中，偶然获得了《鸭绿江行部志》的手抄本，我不禁欣喜若狂。为完成先师遗愿，便将新获得的抄本，给辽宁图书馆另抄一份，并告有关人士。使新版的《辽海丛书》，少却了一个遗憾。

罗尔纲先生与金先生南北辉映，堪称学界双璧。两人除了潜心著作，还编纂大宗资料，以泽后学。罗先生在50年代，长期埋头在南京图书馆，蒐求太平天国史料。他将十年“坐冷板凳”所获的珍贵史料，编辑整理出来，陆续出版。他又考虑到出版周期太长，便从1200万字资料中精选100万字，尽先出版，这便是60年代初问世的《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这六册“简辑”像春雨一样，浇沃了中青年太平天国史研究者，使他们茂然茁长，卓然出群。罗尔纲功莫大焉！

我至今还记得：在《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中有一份《皖樵纪实》的珍本。罗先生曾告诉我，这是他当年访得的孤本，由罗师母帮助他，用夜间儿女安睡时间，在青灯如豆的暗淡光线下，一字一句抄出来的。罗老很感激夫人襄助深情，也深爱这份珍贵的抄本。但为使此书垂诸久远，泽被后学，他无私地捐献出来了。

（作者为中国民族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洛松）

才识绵山真面目

□ 惠金义

山西介休的绵山，不仅有着优美的山水风光，而且有许多名人名事，最著名的首推介子推守志被焚事件。据史载，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重耳蒙难，逃到卫国，饥饿难忍，随臣采来野菜充饥，重耳难以下咽。从臣介子推割下自己身上的一块肉，熬成肉汤，叫重耳吃，重耳感激涕零。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割股奉君”的故事。介子推“割股奉君”，不是为了日后的封赏，而是为了晋国的振兴。重耳流亡国外 19 年后，59 岁返回晋国，掌握了政权，这就是晋文公。当年跟随他流亡的从臣们邀功请赏，他都论功封爵。唯独介子推“功不言禄”，看不惯这种上下之间相互利用的风气，怀着“耻将股肉易封侯”的心情，携老母归隐绵山。后来晋文公想起了介子推，亲自到绵山寻找，因山大路险，难以找到。有人给出主意说：“介公是个孝子，放火烧山，他一定会背着老母出逃。”没想到介子推隐居士志坚，绝不下山受封，母子抱树被活活烧死。

到了后世，每逢介子推死难日，当地便“冷食”三日，以表纪念，这就是关于寒食节由来的传说。人们崇拜介子推的节操，把他与屈原并提，遂有“南有屈子，北有介子”的美称。有人做过统计，《全唐诗》中有 130 余篇描写介子推与寒食节。据说晋文公见烧死了介子推悔恨莫及，他命随从拣拾烧后的残木，做成木履，走起路来呱嗒作响，提醒自己不忘介子推，时而喊“悲乎！足下！”，后人就把“足下”作为“朋友”的尊号。现在绵山上有介子推祠，祠前两株相抱而生的柏

树称母子柏。

绵山上另一位高人是北魏佛教净土宗的先驱昙鸾。昙鸾是山西代县人，早年在五台山皈依佛教，潜心研究教义，正当他注释《大乘方等大集经》时，得了一场大病，身体受损，就离开五台云游四方，寻找健身之术。在南方得了道家十卷仙方，学会了炼丹，以求长生不老，后来他又到洛阳，遇到了印度名僧菩提流支，菩提流支赠他《观无量寿经》一卷，并说“这才是大仙方，人生哪有什么长生不老，您纵然求得长寿，也只是暂时不死，终究还要轮回于三界之中的。照《观无量寿经》修行，才能解脱生死。”昙鸾顿悟，从此成了专修佛教净土宗的和尚。

昙鸾做了大量弘布净土的具体功业，名声很大，连当时北魏皇帝也敬重他，赐他“神鸾”的称号。昙鸾晚年住在玄中寺，经常到绵山弘传净土思想，并在云峰寺立了道场，信徒们把他布教的地方称为鸾公岩。

到了唐代，绵山的佛主是田志超，又称空王佛，民间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田志超最早是一儒生，生于陕西大荔县，后移居榆次源涡村，因疾恶如仇，乐善好施，爱民救民，遭人陷害，来到介休一家寺院做了和尚，后来移居绵山抱腹寺，兴建寺院，汇聚僧侣，讲经说法，修成正果。传说李世民慕名来朝山，田志超鄙薄名利，不愿领受皇恩，便安排宁空、摩斯两个弟子接驾，吩咐说：“我今晚到山林深入隐匿，皇上驾到后就说我寂灭西归。”第二天李世民冒雨上山，问到活佛，两

位弟子跪奏道：“师父已经圆寂，”李世民怅然若失，只好望空拜道：“寡人真乃福浅，此行空望佛矣！”唐僖宗李僩根据李世民的这句话，封田志超为“空望佛”。再后，人们赞颂他与介子推一样鄙薄名利，拒受皇恩，改称“空王”、“空王佛”。

绵山还有许多动人的故事：唐代李世民以绵山为根据地，曾大败宋金刚，收降尉迟恭；明代末年太原武总兵曾依托绵山重击清兵，以图再起；抗日战争初期，冯玉祥所属方振武部，在绵山举行过著名的抗日誓师……所有这些，都为绵山添了一笔神圣的色彩。

绵山，最早叫绵上，至今共留下殿宇 88 处，2000 余间，数量之多，全国罕见。由于绵山山势陡峭，庙宇多是依山就势，紧贴石壁建造。因而“云崖挂禅方，庙宇贴峭壁”，就成为绵山建筑的一大特色。

据统计，绵山悬空建筑有 30 多处，规模较大的建筑群有 3 处，一是龙头寺，二是大罗宫，三是抱腹寺。龙头寺，位于绵山北端，是沿着公路进山的第一站。刚修复的龙头寺焕然一新，座落在山畔上的关帝庙内，塑有刘、关、张三兄弟及其五虎上将的塑像，栩栩如生。关帝庙左侧石壁上是一幅巨大的百龙图，登 60 级台阶，便是巍峨壮观的真武庙，庙后有介子推母子坐立塑像。

离开龙头寺，蜿蜒曲折，过蜂房泉便到大罗宫。大罗宫建造在巨大石凹里。“大罗”为道家最高境界，传说介子推隐居时，在此看到过“大罗仙境”。这次顺山势由低到高扩建，为明三暗四七层仿古建筑，建筑面积达 3000 多平方米，歇山屋顶，依次排列，层层叠叠，绚丽壮观，神像壁画，技艺超群，成为全国最大的道教建筑群。

过大罗宫，经兔桥、鹿桥、天桥、舍利塔林向左 90 度一折，便是抱腹寺。抱腹寺位于绵山半山腰，是绵山的主寺。最早建于三国曹魏时期，由高僧迪公考察筹划，魏明帝曹睿颁诏建造。寺庙建筑于一凌空突出的巨岩下溶洞中，因岩石边缘呈穹形，像人两臂抱肚，因而得名。岩石下是一个敞口大岩洞，洞高约 60 米，宽 150 米，深 50 米。十多座殿宇建造在这个巨大的“腹”中，成为佛教的一大禅林。寺庙依地势建造，分上下

两层，下层以空王殿为中心，南有药师殿、弥勒殿、观音殿，殿下一四合院为僧舍；殿北为弥陀殿、介公祠。殿后有石阶路，可攀登到上层。上层有石佛殿三间，殿内塑像为空王佛，包骨真身，眉清目秀，活似真人。殿前有楹联：“真山真水真人修成正果，古岩古洞古佛炼归金身。”顺着石佛殿向右，有诸天殿、罗汉堂、菩萨殿等；向左过龙池为五龙殿，殿内五龙为五个武士坐像，依次排列，侧目怒视其母，占据了殿的主位，龙母却偏居一隅，面南而坐。母子坐位倒置，游人必觉奇怪。原来，传说绵山一度为五龙霸占，横行乡里，民怨沸腾，空王佛上山后与龙母对弈，龙母输掉了绵山，五龙得知，怒斥其母，并与空王佛争夺，结果被空王佛击败，只好退居山后，山后有五龙墓。

抱腹寺寺庙之间都有木栈道相连，由下仰视，殿宇参差，错落有致，勾栏蜿蜒，险峻雄奇，明代傅山游后，心情十分激动，题长联云：“阅名山多矣，无如此石凌空，生成一片袈裟，十方圆盖；瞻佛像巍然，自有真神出现，修炼来三花聚顶，五气朝元。”横批是：“活山活佛”。

抱腹寺是绵山的主要景区，北面有铁索链，攀援而上，可达摩斯塔、铁瓦寺，能观云海、日出、佛光。顺鸟道下行，有一个 30 平方米的小土丘，丘上竖一 3 米高的石碑，篆书“大唐汾州抱腹寺碑”，这就是著名的开元古碑，碑文 1200 字，记述了抱腹寺的来历，成为难得的珍贵文物，碑旁有贺知章的题记。这块几吨重的石碑是由寺僧从岩沟拽到棋盘洞附近的。再攀云梯到抱腹寺前，而后又沿 120 级石阶和 60 级石阶到铁索岭下，手抓铁索，登上岭顶，这 500 米的路程，几乎都是 75 度的绝壁。

绵山虽高，可山高水高，山光水色十分诱人，自然景观处处可见。在龙头寺与大罗宫之间有长百余米、宽 30 余米的凹崖，崖壁裸露，中腰以下，突起十多个石疙瘩，大者如盆，小者如碗，表面长满厚厚的苔藓，山泉从石壁中渗出，沿苔藓“包”滴下。

黄山、华山以松称奇，绵山以柏叫绝。绵山脚下的柏与众不同，生长茂盛，有一株秦柏高 16 米，主杆胸围 11.8 米，根部腰围 16.7 米，树

荫覆盖 300 平方米,比陕西黄陵“黄帝手植柏”还粗 1.8 米,堪称全国柏树之冠。

从抱腹寺沿着公路南行东拐,就到了水涛沟,这条沟里的水一直流向介休平川,水质很好。河两岸高山耸峙,外形似台、似炉、又似佛,山坡上长满苍松、翠柏、绿柳、白桦等树和奇花异草,春夏苍翠欲滴,秋天红叶一片,高山上时有瀑布泻下,约有 20 多处,最长的有 300 多米,形成状态各异的瀑布群。瀑布最为壮观的是沟掌上的水帘洞,条条水帘垂下,水花四溅,阳光中还时有彩虹熠现,真是如入仙境。沟中有茶楼、酒肆、凉亭、木屋、藤桥、雕塑,如诗如画,使

游人始终陶醉在一种神秘色彩之中。

每年农历三月十七日至四月二十日,是绵山庙会节,每日有成千上万人朝山,大小宾馆住得满满的,有文艺演出,有经贸洽谈,热闹非凡。最为热闹的要数“挂铃”那天,所谓“挂铃”,就是将铸好的铁铃挂在抱腹岩石的内壁上,以期吉祥如意。挂铃的人是一些身怀绝技的勇士,将绳子系在腰间,从山顶吊在半空,利用绳子的晃动,将人悠进洞内,用铁钩钩住顶壁,打楔系铃。挂铃的全过程,惊心动魄,犹如杂技表演,许多人上山就是为了观看这激动人心的一幕。

张家口大境门 “大好河山”书撰者

□ 杨继光 张恒宝

在张家口市市区北端,有一座闻名遐迩的长城关隘——大境门,大境门以雄伟、险峻闻名于世。城门上方题有“大好河山”四个颜体大字,苍劲有力,为世人称道。

“大好河山”四字的书撰者为高维岳。高维岳字子钦,辽宁省锦县(现为凌海市)人,1875年(清光绪元年)生,1900年从戎,在朱庆澜将军的巡防营任司书。1907年入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二班步兵科学习。毕业后回东北,适逢奉天巡防营整编,遂到孙烈臣前路巡防队任哨长、哨官。1912年入东北陆军讲武堂步兵科学习,毕业后任军官军士团教育长,后任奉军二十七师参谋长。1921年7月,任奉军二十七师第五十四旅一零七团团团长,后任第五十三旅旅长。1923年任东北第十九混成旅旅长,1925年任东北陆军第七师师长,1926年任安国军第三、四方面军团第九军军长,同年8月任察哈尔特别区都统。都统署便设在张家口。

1927年,高维岳为大境门写下了留传至今的“大好河山”这四个字。

高维岳上任之初,察哈尔民众对奉军毫无好感,认为奉军不少头目出身草莽,军纪军风定然不好。然而,人们很快发现,高维岳治军很严,他常常微服私查,发现妄生事端者,统统予以严处。因高维岳责打有过失之士卒,故有了“高二打爷”的绰号。出于敬畏,当时军中还流传着如此之说:“谁要倒霉或做了亏心事,就会在街上碰见‘高二打爷’。”

那时,在张家口一些公共场所(戏园子、茶肆、书场等),常常有地痞流氓寻衅闹事。高维岳建立了军警巡查制度。每家戏园子开戏前,即来一支由五六名军人组成的“督察队”负责压场。他们荷枪实弹,坐于特设的“弹压席”内。带队军官入场时还手持一支约三尺长的木箭,上书“察哈尔高”四字。这支令箭标志着高都统赋予“督察队”的临场处置之权。当时,百姓们叫此箭为

“大令”，可见其威力之大。

在市政建设上，高维岳缺少前任都统张之江、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那样的革新和进取精神，因此没有什么突出建树，但他对前任留下的市政设施的保护还是不遗余力的。对前任建的上堡公园和水母宫继续加强管理，派员负责日常养护，不断增加花圃林木面积；对新筑的全城第一条马路，仍按旧规分道行车，并坚持了每日由清洁队负责清水泼街的办法，从而保持了街道的整洁。

在奉军中有儒将之称的高维岳，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因此，他对保护文化古迹格外精心。张家口古建筑甚多，其中明清时建的庙宇最具代表性。他令手下四处张贴由他签署的布告，布告中列明保护措施和处罚条款，使人人皆知，个个遵守。高维岳在1927年暮春时节题写的“大好河山”四个大字，即是他挚爱祖国大好河山心迹的坦露，也是他作为一名儒将的深厚文化底蕴的展示。

高维岳在张家口期间，其功不可没，其过亦不应掩。过之大者，是奉命杀害了共产党人多松年。多松年系中共早期党员，蒙古族，曾任中共察哈尔特别区工委书记，1927年曾代表绥察二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返抵北平，正值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绥察党组织惨遭破坏之时，但他不避艰险，仍然来到张家口，力图恢复党的组织。结果，由于叛徒告密，多松年不幸被特务逮捕，严刑拷打后杀害于张家口清河桥畔（原大铁桥畔），其尸体被工友们掩埋在西山坡的荒冢中。

高维岳在察哈尔任都统二年后，调回奉天，在“九一八”事变前张作霖自任陆、海、空军大元帅时，张敕令加封高为“岳威上将军”，并在其家乡石山镇西岭及东河洼子分别立九眼透龙石碑各一座，以彰其德。

“九一八”事变前，高维岳正在南京军事参议院任参议。奉军出身的他，自然对东三省的局势格外关心。事变后，他频频致信友人，了解东三省沦陷情况。此后不久，高维岳调到北平军事委员会任职。1933年2月，日寇侵占热河，长城抗战枪声打响，在日本人进关前，北平军分会转

移到西安，高维岳因年老体弱未能随行。他家住北平地安门附近的前圆恩寺胡同，从早到晚，足不出户，为国家忧，因病体苦，生活窘困，苦不堪言。

日军进占北平后，日本人曾让北平宪兵司令部的邵文凯几次到高家，邀请高维岳出山任职，皆遭高拒绝。他说：“我不能当汉奸给日本人干事，当亡国奴。我愿当汉奸在东北就当了，那还能保住我的家产（日本人在1932年侵占锦州时，把高家房产没收了）。

国破家衰，高维岳从此无一日心安。1938年10月，终至一病不起，与世长辞。他在临终时对家人说：“我为官多年，虽无功于国，无益于民，但未尝不以国家民族为念。日寇入侵，我也未失掉中国人的气节，未给他们当傀儡官。我多年的薪俸所积，亦不足以养你们到老，你们自谋生计去吧！”言讫而终。

高维岳死后，灵寄北平万寿山。

（责任编辑 文 贤）



张家口大境门（摄于1945年）

“畏我论”及其演化

□ 官伟勋

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必须是一支面对任何强敌都无所畏惧的军队。

如何才能不畏敌？众兵家说：要使之畏我——畏我者不畏敌，畏敌者不畏我。

从冒顿的故事说起

《史记·匈奴传》有如下一段记载：

匈奴老单于（即君主）头曼立儿子冒顿为太子。老单于后来爱上另一个阏氏（即皇后），生了个小儿子。头曼想废掉太子，另立小儿子为太子。作为过渡，他就把冒顿送去强大的邻国月氏做人质。冒顿到了月氏，头曼就发兵进攻月氏。月氏要杀冒顿，冒顿偷了一匹骏马骑上逃回匈奴。老单于觉得冒顿能干，就把一万骑兵交给冒顿统率。

冒顿当了万骑统帅，就为自己做了一些响箭，对部下说：“我的响箭射到哪里，你们就要紧跟射到那里。不射的，杀！”在一次打猎时，他的响箭射向鸟兽，有人没跟着射。冒顿立即把这些入杀了。住了几天，他一转身，把响箭射向自己的爱马，有的部下一犹豫，没射，又被他杀了。又一天，他突然把响箭射向他的爱妾，又有几个部下惶惑之间没敢射。他把这几个人又砍了！

经过几次血腥杀戮后，冒顿的响箭射到哪里，部下的箭就齐刷刷地跟到那里了。

时机到了。有一天，老单于带人出去打猎，冒顿的响箭“嗖”地一声，向头曼射去，紧跟着，万箭齐发，眨眼间老单于就变成刺猬了！冒顿当

了单于，立即将后母、弟弟和不听从他的大臣，统统杀了。

此后，匈奴在冒顿的强悍统治下，迅速崛起。东灭东胡，西击月氏，南击楼烦、白羊河南王。然后，他收复当年秦国大将蒙恬占领的全部土地，并南侵燕、代。刘邦北上亲征，冒顿诱敌深入，将刘邦包围在平城，汉军几乎全军覆没。从此，汉王朝直到文景两帝时，不得不对匈奴采取屈辱的所谓“和亲政策”。

冒顿为什么能如此厉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靠杀，建立起一支绝对“畏我”的、“控弦三十万”的非常有战斗力的部队。

司马穰苴与 孙武的治军要诀

像冒顿那样用杀妻弑父的野蛮手段，树立个人绝对权威的做法，由于历史发展阶段与文化背景的不同，在汉民族中是难以行得通并得到部众拥戴的。但是，靠杀人以使军队令行禁止，即使是在汉民族中，也是很平常的事。

春秋时期，齐景公连遭晋和燕入侵，十分忧虑。晏婴向他推荐田穰苴说：“穰苴虽说是小老婆生的，但这个人，文能附众，武能畏敌。愿君能不在乎他的出身，予以试用。”齐景公召穰苴来谈了谈，很满意，决定任穰苴为将军对付晋、燕。

穰苴说：“臣出身贫贱，君提拔我于一般民众之中，任大夫之上的高职，怕人微权轻，人家

不服。望能派位深受尊重的君的宠臣做监军。”

景公觉得有理，就命庄贾做监军。穰苴与庄贾约好，第二天中午准时在军门见面。

穰苴骑马驰往军门。“立表（测日影的木杆）”，“下漏（记时的漏壶）”，以便准确计算到达中午的时刻。庄贾一向骄贵，如今当上监军，更自以为了不起了，根本没拿按时到军门当回事。亲友祝贺他任要职，请吃饭，他就吃、喝。

日中了，穰苴见庄贾没来，就放倒木表，砸了漏壶，进入军营，独自宣布纪律，颁布命令，部署任务。天黑了，庄贾才来。穰苴问：为什么现在才来？庄贾说，亲戚朋友为我饯行。穰苴说：做将军的，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桴鼓之急（擂鼓前进时）则忘其身。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于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在你的手中，你怎么还能吃吃喝喝搞私人应酬呢？穰苴问军正：按军法，不遵时的，该如何处置？军正答：当斩！庄贾怕了，赶紧找人去报告齐景公救命。没等求救的人回来。穰苴已下令把庄贾杀了。杀后，景公的使者才持节飞马而来，传达赦免庄贾的命令。穰苴说：“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又问军正：在军营里跑马，该如何处置？军正说，当斩！穰苴说，君主派的使者，不可杀。但军队纪律不能不执行。下令将使者的仆从杀了，又砍了使者车子的左骖，并杀了左边的一匹马。然后，下令全军出发。敌军听到穰苴统帅军队和治军的消息，闻风而退，所失国土，全部收复。从此穰苴被尊为大司马。

流传更为广泛的，则是见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有关孙子的故事。

齐国人孙武，因精通兵法，受到吴王阖庐的接见。吴王说，先生的十三篇，我都读过了。可以小试一下练兵的方法给我看看吗？孙子说：可以。吴王又问：用女人可以吗？孙子说：可以。吴王就从宫中叫出一百八十个美女，交给孙子操练。孙子把这些妇女分为两队，让吴王的两个宠姬各为队长。孙子讲解了如何前进后退以及左右转法，就摆好执法的斧钺，并三令五申告诫众美女：违令者军法从事！孙子擂鼓命令向右，美女们哈哈大笑，乱成一团。孙子说：“约束不明，

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把混乱的原因归咎自己。然后，再次三令五申军事纪律。于是，擂鼓命令向左，妇女们又大笑，把队伍搞得乱糟糟的。孙子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说明而不服从法令者，吏士之罪也。”下令杀两个队长。吴王在看台上看到要杀他的爱姬，吓坏了，立即派人对孙子说：“寡人已经知道将军能用兵了。寡人离开这两个女人，吃饭都不香。望不要杀她们。”孙子说：“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孙子硬是把两个队长杀了，并从队伍中重新任命了两个队长。孙子再次擂鼓，宫女们“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了，整个队伍中没人敢出一点声音。孙子向吴王报告说，请大王视察，现在这支队伍可用了，就是让她们赴汤蹈火也没有问题了。吴王十分懊恼难过，没下去看。但他还是以国家大局为重，任命孙子当了军队统帅。之后不久，吴国就“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偏居东南一隅的吴国，竟然成了名垂青史的春秋五霸之一。

以杀立威 几乎是古代兵家的共识

如果以为司马穰苴和孙武靠血淋淋的杀人以树立绝对权威，只是个别人的个别现象，那就错了。在我国历代兵书中，包括私人著述与官方编纂的，这几乎是所有著名兵家的共识。

太公《六韬·龙韬·将威》中有这样的话：“故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悦者，赏之”；在《尉缭子·政权篇》中则讲了所以要杀的道理：“夫民无两畏也，畏我侮敌，畏敌侮我。”老百姓怕我，才能勇于杀敌；老百姓怕敌人就会伤害我们自己。

唐朝的《卫公兵法》可以说为以上各家做了个概括，说：“古之善为将者，必能十卒而杀其三，次者十杀其一。三者威振于敌国，一者令行于三军。是知畏我者不畏敌，畏敌者不畏我”。

为什么要杀？就是为了让士卒怕我。惟有士卒怕我，才能绝对地服从我，让他冲就冲，让他守就守，让他死就死，整个军队才能勇往直前打胜仗。

有没有相反的见解呢?有,唐太宗就对这种带兵方法表示过怀疑。只不过这种人太少太少了。

以杀立威论 产生的阶级背景

为了提高战斗力就轻易杀人,如今看来很残酷,但在当时却是很平常的事。穰苴也好,孙武也好,都生长在奴隶社会刚刚向封建社会开始转变的时期。奴隶的地位与牲口差不多。对奴隶削鼻、割耳、刖足、去手、砍头等等,在那个时代,都是司空见惯的事。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春秋无义战”。那时的许多战争,都是奴隶主或封建主为争地盘而发动的“不义之战”。奴隶主封建主贪得无厌,却要士兵去送命,没有酷刑的逼迫,这仗是没法打的。因此,“刑赏”就成了最重要的手段。

《诗经》有句话叫做:“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左传》对这句话的解释是:“有威可畏谓之威,有仪(反映阶级统治的礼仪制度)可象(可以遵照执行)谓之仪。”认为只有做君主的“有威”,臣民怕他并遵守礼仪,天下才能长治久安。历代统治者之所以千方百计让老百姓畏惧自己,原因在此。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阶级关系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一些新的带兵观念逐步产生。像“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则士无不勇矣。”(《诸葛孔明异传卷二》)“将不仁,则三军不亲;将不勇,则三军不锐”(《六韬》。此书传说是姜太公所作,经专家考证,实为后人所作)等,反映了一种把士兵开始当人看的新观念。将帅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以及爱兵爱民等主张,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军事家所重视。实际上,即使在春秋时代的一些聪明的军事家,已经颇为懂得统帅与士卒同甘共苦,对于激励士气的重要作用了。《司马穰苴传》中就载有穰苴杀了庄贾后,如何关心士卒伙食,如何深入下层亲自安抚伤病人员等情节。汉将军李广在这方面的表现也很突出。《史记》说他:“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

绝对是一个“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模范指挥员。

《史记》中还如下一段令人回味再三的故事:吴起做将军的时候,“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自己带足自己的口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这个生疽战士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哭了。有人问,将军亲自用嘴给你儿子吮疮疽的脓血,你怎么还哭呢?老妇说,当年孩子他爹生疽,也是将军给吮的,他爹打起仗来就不要命地拼,死了。如今吴公又给我儿子吮疽,我不知我儿子将死在什么地方了!

这个故事,既生动地表现了吴起爱兵的高难度“范例”,也通过老妇的哭诉,不无讽刺与批判地揭示了吴起爱兵的用意与战争的残酷。

后封建时代,官兵间的阶级关系,有了新的定位。在我国,尤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经过坚持不懈地反对封建主义、军阀主义以及种种旧军队旧意识的斗争,形成一种完全新型的带兵方式与新型的官兵关系。崇高的革命理想,鲜明的阶级觉悟,干部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是这一新型军队的特征。它不仅保证了人民军队拥有最严格的纪律,而且使遵守军纪成了广大官兵的自觉行动。我军之所以能历尽千难万劫而不败,成为一支拖不垮打不烂、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根本原因在此。

然而,“福兮祸所依”。太成功太伟大了之后,往往难以保持尚未成功尚未伟大时的谦虚谨慎与兢兢业业的品质。因此,要摆脱祸福相依的规律也就不那么容易了。

常胜之家难与虑敌

中国革命的最大特点,就是武装夺取政权,枪杆子解决问题。连续二十多年的军事斗争,使我党我军积累了丰富的领导军队和组织武装斗争的经验。长期的军事斗争环境,锤炼了我党我军钢铁般的意志,培养了我军高尚的革命情操,和难以企及的艰苦奋斗作风,这都是值得我们

永远珍惜并发扬的。但也不能不看到,战争与战争,军队与军队,总有某些共同性的东西。何况,几千年旧制度旧军队的影响,也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内就可以完全彻底地予以根除。“畏我”才能不“畏敌”的心态,对许多“带兵”的人,都有或多或少,或自觉或不自觉的影响。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胜负存亡往往决于一瞬之间,命令如山倒,需要高度集中,需要绝对服从,这确是克敌制胜的必要条件。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中,是服从战争需要还是服从个人?两者常常搅在一起,是很难区分的。因此,久而久之,一些同志,就很容易养成喜欢下级事事“听我的”这样一种习惯。

在客观形势已经发生完全不同的变化之后,如何对待以往的经验,看来似乎是个一般问题,其实是个极其重要极其严肃的问题。

古人有句话叫做:“常胜之家难与论敌”。的确不错,对于一个经常打胜仗的将军,要跟他平等地讨论军事问题,往往是很困难的。所谓“不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就是一例。这句话实际上含有会打仗就会搞工业农业;能指挥战争也就能指挥经济建设的意思。

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中曾说:“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既“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也跟长期的战争环境有关。

动不动就杀人,已经不允许了,但谁不听话就整谁,就“修理修理”谁,在相当一些强势领导人中,还是存在的。

违犯党纪军纪,整一整是应该的。问题是,“谁要不听我的,我就整谁!”而且非要整到“都听我的”不可。有时竟发展到冠以重大名义进行大规模的整,后果就更为严重了!

整人虽说不是杀人,但也是够可怕的了。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穿小鞋、坐冷板凳、靠边站、有官无职、有职无权,至于停职审查或给予更严厉的处分,就更不用说了。尤其可怕的是,整了之后“挂起来”,一挂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申诉没人理,喊冤没人听,弄得人不人,鬼不鬼,像得了麻风病一样,没人敢接近。有的还弄

得老婆离婚子女受牵连。杀倒没杀,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实在比杀头还叫人难以忍受!

我在给张友渔老写他的回忆录《十年京兆》(张老曾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十年)时,曾问张老:“为什么老有整人的呢?”张老不加思索地脱口答道:“只要有政治就有整人。”张老在法学和政治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我很尊敬他。他的这种看法,既有他的理论根据,恐怕也与几十年来重人治轻法治的客观现实有关。

从历史与现实的实际看,“只要有政治就有整人”,也应看是什么政治。有人治政治,也有法治政治。一般说来,在法治社会里,虽说也有所谓整人,但由于有法的约束,其所谓的整人,大都表现为公开的透明的、用诉诸法律的手段进行的,尽管这当中难免也会有非理性的行为,即通常所说的“猫腻”,但总的说来,还是依法而整的多;不像在人治社会里常常看到的那样,由个别别人的主观意志决定整这个或整那个,不管合不合法,对或不对,别人都不好说话,或不能说话。

总喜欢人家“听话”,不听就整,还认为这是政治的需要,阶级斗争的需要,这对党和国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已有目共睹。争取人民民主,使人民依法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一直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这是我们不能须臾忘却的目标。这个目标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不但是社会主义文明与昌盛的标志,而且是社会主义文明与昌盛的保证,更是我们党和国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一基本方略,正是彻底根除用种种“畏我”手段树立个人绝对权威的对症良药。我们只有认真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治,整人立威这一可怕的梦魇,才会像杀人立威一样,成为永远的过去。从而我们也才可以说,我们在领导行为上,真正摆脱了封建主义的影响。

我们正在正确的道路上迈进。然而,要达到理想境界,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责任编辑 致 中)

元朝的反贪诗、反贪谣

□ 邱树森

元人笔下的反贪诗

掌握政权的蒙古统治者推行四等人制，汉人受到种族歧视，有的甘愿隐居不仕，虽有少数士人跻身官僚阶层，大多数士人处于中下层，比较了解现实社会，不满贪官污吏，同情民间疾苦，因此多有反对贪赃的诗作。

元朝进入中后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揭露社会丑恶现象的作品大量涌现。尹廷高、朱德润、胡祇通、萨都刺、迺贤等人的诗尤其切中时病。

尹廷高的《车中作古乐府》，揭露“世上利名心未足”的贪官污吏，当了一阵官以后是怎样“人生富贵归故乡”的。诗中写道：

铃丁当，铃丁当，大车小车摆作行。
问渠捆载有何物？云是官满非经商。
蟠螭金函五色毯，钿螺椅小象牙床。
美人娇娇如海棠，面帘半染尘土黄。
迎门软脚闹亲旧，提擎酪瓮割肥羊。
人生富贵归故乡，铃丁当，铃丁当，
老夫北行书满箱。

明明是为官一任，捞足了，捞够了，“富贵归故乡”了，却还要“婊子立牌坊”，让当地官民立一块“德政碑”，“留芳百世”。君不见当年桑哥当政，尽管贪赃所得可与国库相比，不也是立一块“王公辅政碑”？对此，诗人朱德润在《德政碑》一诗中作了淋漓尽致的讽刺：

德政碑，路傍立石高巍巍，
传是郡中贤太守，三年秩满人颂之。
刻石道旁纪德政，傍人见者或颔歔。

借问颔歔者谁子，云是西家凿石儿。
去年官差凿此石，官司督工限十日。
上户敛钱支半工，每年准备遭驱责。
城中书生无学俸，但得钱多作好颂。
岂知太守贤不贤，但喜豪民来馈送。
德政碑，磨不去，劝君改作桥梁柱。
乞与行人济不通，免使后来观者疑其故。

朱德润还在《官买田》这首诗中揭露仁宗延祐年间，官吏乘经理田粮之机，掠夺民间腴田。诗人在最后写道：

官买田，台不谏，省不言，
不知尧汤水旱日，曾课民粮几千石？

“台不谏，省不言”就是官官相护。尤其是作为地方监察机构的行御史台，如果失去了监察功能，就等于是摆设。

许多元代诗人的笔下揭露了酷吏的罪恶，胡祇通写道：

人生莫作小民身，千种饥寒万苦辛。
逃屋银粮幸蠲免，不堪酷吏笔如神。
破屋逃亡人未还，征粮县帖下柴关。
恩威究竟谁为主？劝课农桑亦厚颜！
诗人顾瑛也写道：

官余粮，官余粮。
东吴之民日遑遑，去年今年来侍郎。
凛凛六月生秋霜，官钱未给先取将。
今朝十万上官仓，明朝十万就船装。
小斛较斛斗斛量，吏弊百出那可当。
输钱索物要酒浆，磨牙吮血如虎狼。
满身鞭箠成痍疮，郡侯视之泗滂滂。
忍使吾民罹厥殃，实欲止之无计张。
元朝官贪吏污，豪强不法，农民生活在水深

火热之中。哈刺鲁诗人迺贤、浙江诗人王冕、湖南茶陵诗人陈泰均有描述农民悲惨生活、官府地主剥削沉重的诗篇。如迺贤的《新堤谣》、《颖州老翁歌》、王冕的《江南民》、《江南妇》、《伤亭户》，陈泰的《集民谣二首》，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伤亭户》描写的是盐民在酷吏欺压下家破人亡的情景：

课额日以增，官吏日以酷。
不以公所干，惟务私所欲。
田园供给尽，嗟数屡不足。
前夜总催焉，昨日场胥督。
今朝分运米，鞭笞更残毒。
灶下无尺草，瓮中无粒粟。
旦夕不可度，去世亦可福。
夜永声语冷，幽咽向古木。
天明风启门，僵尸挂荒屋。

民歌中的反贪谣

元代民歌十分丰富多彩，流传至今的民歌多达一百多首。这些民歌如实地反映了元代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和社会的黑暗。

反贪歌谣是元代民歌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歌谣直接讽刺了贪官污吏。设立肃政廉访司本是世祖忽必烈加强监察和廉政的重要措施之一，但久而久之，廉访司的官员与地方上的贪官、豪强互相勾结，赃污狼藉。元末时台宪官也可论价购得，乘分巡的机会，大肆掠夺，各带库子检钞秤银，如同做生意一般，“上下贿赂，公行如市，荡然无复纪纲矣”。按照元朝的惯例，廉访司官员巡视州县时用金鼓迎送，其音节是二声鼓一声锣；起解杀人盗，也用金鼓，其音节是一声鼓一声锣，都有锣鼓开道。但在老百姓看来，号称清廉的廉访司官员与盗贼都是一路货，所以民谣唱道：

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
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

伯颜是一个贪得无厌的权臣，不仅拥有一万多顷田地，而且有数不清的浮财。伯颜贬死后，朝廷籍没其家，数月清算不尽，米糠数房，烧饼至一房，民间有人题诗于壁云：

百千万锭犹嫌少，堆积金银北斗边。

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

伯颜与太皇太后卜答失里私通，“数往太皇太后宫，或通宵不出”。京师里有民谣曰：

上把君欺，下把民虐，倚恃着太皇太后。

至正九年（1349年），脱脱复相后抓了两件大事：一是变更钞法，即印造“至正交钞”，实际上是用旧的中统交钞加盖“至正交钞”字样，使至正交钞比中统交钞升值一倍，专置宝泉提举司，“每日印造，不可计数”；又发行“至正通宝钱”，与历代旧钱通行，钱钞并用，并以钱来实钞。结果，“行之未久，物价腾涌，价逾十倍。”二是贾鲁开河，即采用贾鲁“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复故道”的方案，自至正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开工至当年十一月十一日完工，疏浚黄陵岗哈只口的黄河故道和从凹里村到杨青村的减水河，堵塞黄河故道下游上段各决口、豁口，修筑北岸堤防，然后堵塞白茅决口。工程进展是顺利的。总而言之，变钞与开河，前者失败，后者成功。但由于政府腐败，社会矛盾尖锐，黄河决口治与不治，成功与否，农民起义总要爆发。在老百姓看来，失去民心的政府，每干一件事都是坏事，因而把变钞开河与农民起义联系在一起是十分正常的。当时民间有诗嘲曰：

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

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

又有《醉太平小令》一首：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民谣也是农民领袖用来动员群众的宣传工具。众所周知的“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的民谣，就是韩山童、刘福通等农民领袖在大起义前在民间散布的。同年，徐州芝麻李起义于徐州，也散布“挖了石佛眼，当年木子反”的歌谣。

大起义爆发后，松江流行的一首歌谣极其形象地描绘了起义军占领松江时的情景：

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

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

（选自王春瑜主编的《中国反贪史》）

李秀成百万家财 和百万大军的烟销云散

□ 魏文华

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百万大军的统帅，但在最后孤身逃亡时竟然戏剧性地成为“人为财死”的牺牲品，不能不引起后人的感叹。

李秀成被俘后在为曾国藩写供状（即《自述》）时带着悔恨交加的心情，谈到他从天京突围出来独自逃到山中破庙因财而丧身的经过：“我命该绝，身上带有宝物，用绉纱带捆带在身，不知此日如此心迷，到破庙休息，遂将珍珠宝物吊在树下，欲宽身乘凉，不意民家寻到……，那帮百姓得我宝物，民家见利而争，带我这帮百姓，去问那帮百姓，两欲分用。那帮百姓云：‘你问我分此物，此物天朝大头目方有，此外别无。尔问我分此物，尔必获此头目’，云言该百姓带我，必有私忌，两家并争，因此我藏不住，被两个奸民查获，解送前来。”他的百万私财与百万大军两梦，就这样同时破灭了。

忠王财宝知多少

李秀成在广西加入太平军时只是一名兵，随军到天京。到1856年天京事变时虽然升为中级官衔的地官副丞相，但太平天国前期严禁官兵私藏金银珠宝，所以他在前期不会聚敛私财。从天京事变到1860年占领苏州以前，李秀成驻军在安徽相城、江苏浦口一带贫困的地方，行军战斗频繁，所辖的兵员不多，虽然他此时已被封侯、封王，但私财也不会聚敛很多。直到占领苏州后，李秀成的私财才急剧地膨胀起来。

英国翻译兼代理宁波领事富礼赐，于李秀

成占领苏州10个月后天京访问，从1861年3月至9月在天京住过半年，并在忠王府住过，与李秀成见过面。离开天京以后他发表《天京游记》（《太平天国》VI）一书，比较客观翔实地记述了他在天京的见闻。如受忠王兄弟李明成招待宴会的情景：“盛饌饌的盘子是磁制的，共九个，形如花瓣，彼此配合而成为一个玫瑰花形……席上筷子、叉、调羹均用银制，刀子为英国制品，酒杯为银质镶金的。”他还在李明成的带领下参观忠王府内的宝藏，他在《天京游记》中记录着这次奇遇：“他把忠王所藏的许多珍奇的东西给我看。除了天王之外，只有忠王有一顶真金的王冠，以余观之，此真极美珍品也。冠身为极薄片，镂成虎形，虎身及虎尾几可绕冠前冠后，两旁各有一小禽，当中则有凤凰屹立冠顶。冠之上下前后复镶以珠宝。余曾戴之头上，其重约三磅。忠王又有一金如意，上面嵌有许多宝玉及珍珠……各室内置有雕琢甚工的玉器及古铜器多件。吾友——王弟所自用之文具均有大价值，砚是玉制的，盛水的盂是由红石雕成的，笔是金制的，笔架乃是一块大红珊瑚，装在银座上，水晶和玉的押纸具多具，四散放在桌上。桌上又置有七个时钟，时间都不一致。凡各器物可用银质者皆用银制，刀鞘及带均是银的，伞柄是银的，鞭子、扇子、蚊拍，其柄均是银的，而王弟之手上则金镯银镯累累也。”

富礼赐所记的忠王府珍贵器物，有的注明来自苏州（如九瓣玫瑰盘），有的虽然没有注明出处，但也只有工艺发达的苏州才能生产出如此珍贵如此精美的金宝王冠、如意之类的宝

器。所以,李秀成的私财积累,主要是从苏州开始的。当时昭王黄文英就说过:“那忠王也是顾己不顾人,顾私不顾公的。”(《太平天国》11858页),这大约反映了李秀成占领苏州繁华地以后一心营私的基本情况。

李秀成究竟敛积了多少私财,撇开他在苏州和天京新建及旧的三座宏伟王府不计,就现金而言,从他在《自述》中提到的钱粮支出,除去其中难以分清公私的部分,仅就其中的六笔私财,仍然可以窥见其富有的程度:

(1) 1863年他离开天京赴苏州时:“主及朝臣要我助饷银十万,方准我行。后不得已,将合家妇女首饰以及银两交十万。”

(2) 苏州失守以后,李秀成回到天京。天京的事虽然由天王兄洪仁达提理,不归李秀成管,但在1863年秋,大约是天京臣民向这位著名的富豪起哄要救济,李秀成不得不为贫民“开造册者七万余,穷苦人家各发洋钱二十元,米二担,俱到保堰领取。”

(3) 发过了银、米以后,还有人闹,李秀成“不得已将自己家存之米谷,发放城内穷人。自辖之官兵又不均匀,再不得已,将家内母亲以及妇女首饰概变为军资。”(见《自述》)

(4) 李秀成的朋友松王陈德风因为阴谋叛变投敌而被捕,由李秀成出面营救时“代用去银一千八百余。”(《自述》)

(5) 李秀成的妻舅宋永祺偷到南门外曾国荃大营,接洽献城投降,事情泄露被捕后,也由李秀成托补王莫仕葵营救,用去了一笔为数不少的银两。

(6) 即本文开头所提,李秀成带在身上因而被俘丧命的那一带绉纱包裹的珍宝,其价值更是难以估计了。

以上六笔中有具体数目的三笔,少则千两以上,多则十几万两(元)。最后那笔落难丧身的珍宝价值连城,但也只是他在天京沦陷仓促突围时抓到的一小部分,而大部分难以随身携带的财物则连同王府一起落入湘军手中了,换了主人。

李秀成的动产如此惊人,他的不动产尤其可观。他在天京有两座忠王府。与天京新忠王府



忠王李秀成

兴建的同时,在苏州又另建一座远远超过天京忠王府的豪华忠王府。苏州沦陷后,李鸿章进驻这座忠王府时竟惊叹为“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这些王府内究竟贮存着多少珍宝金银,谁也无法计算得清楚,但从英国人富礼赐参观天京旧忠王府宝库时所见到的无价之宝,再从曾国荃揭露李鸿章从苏州忠王府论斤卖锡器一次卖了20多万斤,就可以看到李秀成宝藏的丰富,说其拥有“百万家财”实非虚估。

靠私兵聚敛掠夺私财

李秀成占领苏州以后发了大财,而掳聚这些财物主要是靠他手下的兵丁掠夺豪夺,因此除了自己占有外,还要拿出一部分财物用以养兵。他拥有的兵力在占领苏州以前不会超过万人,如他在《自述》中说,他在进苏州两个半月前,从天京奇袭杭州时,兵力只有六七千之众。”从杭州返回天京到苏州时:“自李文炳、何信义献城而降,我即引兵入城,收得其部众五六万人。”兵力增加了七八倍。随即利用苏州地区的

财富继续招兵，数量更大。半年后他到江西湖北招兵，临行前点派苏州留守部队交给部将陈坤书时已有十万之众，李秀成自己也要带几万人，合计他在苏州已有一二十万人。其后 1861 年 6 月在湖北将“来降之人招齐，大概三十万之数”。同年 8 月他从湖北撤退到江西河口时，遇见一支从广西脱离翼王石达开回归天朝的百战精兵，又收“得其二十余万”，以上一年时间，他在苏州、湖北、江西三地即扩军七十余万人，其后当然还会继续招兵。所以四年后李秀成被俘写“自述”时自言他“部辖百余万众”，这当是真实的。

这百余万大军汇集在苏、浙狭窄地区，军费浩大，可想而知。而军费来源只能向百姓加征赋税、掠取财物。这些财物除一部分用以养兵外，大量的还是用来兴建李秀成的新王府、新官舍，供他个人敛聚私财，挥霍享受。甚至连兴建王府官舍的工役也来自军工。

英国人富礼赐在李秀成占领苏州 10 个月后天京参观访问时，用对比的手法，记述他从现场看到的王府与忠王府两处建设工地的情景。他写道：“天宫工程只完成其一半，全宫面积将倍于现在，但在那里做工的兵工只寥寥十余人，究未知其何时方竣工也。”他又观看了天王洪秀全的几个王兄王弟的王府，规模和陈设都无法与宏伟的忠王府比拟。李秀成曾当面向他夸耀新忠王府为天王府以下最佳最美的建筑物。富礼赐还由王弟引导他去参观正在建造中的忠王新邸。他描述此处王府说：“此真是宏伟的工程，其大仅亚广州之总督衙门一筹耳。工人千余方在此工作，有些造上盖，有些雕工刻石，又有数人站在一旁拿着藤鞭在手，凡有懒惰者即鞭之。工程大部已完，全府气象即如一间中国大衙门，栋梁崇伟，雕刻精致。我问：‘工人得工资多少？’王弟答：‘你们英国人给工资雇人做工，我们太平军知识多些（意谓工人皆不付工资之强迫工役也），我们天朝是不是很伟大呢？’……”（《天京游记》）

富礼赐记录中透露的信息是，从天王府到忠王府，都在使用军人作“不付工资之强迫工役”，所以手握兵权的李秀成能够派出多于天王

府百倍的兵力建筑新王府，能够在占领苏州不到一年即建成“太平天国中最佳最美的建筑物”，与天王府的寥寥十余兵对比，可知李秀成拥兵私用，而不把天王府放在眼里。

苏州那座规模更大的“神仙窟宅”般的忠王府，最初使用三千人，后来有增有减，大部分使用的也是不付工资的“军工”。几千人从 1860 年太平军占领苏州到 1863 年底苏州失陷，“工尚未竣，城已破矣”。上行下效，可以想见苏、浙地区有记载有遗迹的许多王府官舍，当年该使用多少“不付工资之强迫工役”的军工、又会耗费多少物资财富呵。

不听军令 拥兵自重

李秀成从进入苏州以后，就拒不服从天朝的军令，开始拥兵自重。本来太平天国为争取列强中立，始终执行“东守西攻北伐”的战略，未曾向上海进军。1860 年 6 月太平军占领苏州以后，李秀成为谋求上海的关税，不顾天王所颁到苏州为止的诏令，贸然进军上海，从而招致了列强以保护租界为借口而发动的武装干涉。后来遵王赖文光在他写的《赖文光自述》中指责李秀成，说：“……忠王李秀成者，不知君命而妄攻上海，不唯攻之不克，且失外国和约之大义，败国亡家皆由此举。”

李秀成把百万大军视为私有，不许任何人调动他的一兵一卒。他在《自述》中直率地向曾国藩表白：“我在天朝时用文盖印者，无我亲书密号，其将不从。”提到天朝为统一军权所作的军事改革，他说：“营称天营，兵称御林兵，那时人人遵称，独我与李世贤不服。”对天王调他赴援天京上游门户的几次严诏，李秀成再三抗拒不肯遵行，还自鸣得意地说他“管主从与不从”、“主本不从，我强行而止”。

太平天国后期的战略重点，是迎战从上游大举攻扑安庆威胁天京的曾国藩湘军，对此天朝曾有五次具体的战略部署，都因李秀成的逆命而流产。

这五次战略部署是：

第一次是 1860 年 5 月太平军破清军江南

大营以后，天王洪秀全命令太平军乘胜追击到常州、苏州，限一个月肃清残敌后回师到上游安庆，集中兵力消灭湘军。可是太平军6月2日占领苏州完成了追歼残敌的任务后，陈玉成立即领兵到皖北奋战安庆城下，而李秀成则把天王严诏置之脑后，自行越过苏州进军上海，开辟了与列强苦战不胜又难以脱身的第二战场，使太平军由天京解围后取得的战略主动陷入致命的东西两面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主战场安庆方面，过去陈、李合军曾经几次击退过敌军对安庆的进犯和围困，这一次只有从苏州赶来的陈玉成孤军奋战，使曾国藩得以乘太平军陈、李分军的机会，完成了对安庆的战略包围；

第二次援皖是1860年11月前后，天朝命李秀成与杨辅清沿长江南岸向西攻取九江，切断湘军围攻安庆的后路，与奋战在安庆前线的英王陈玉成呼应，击退或消灭湘军。这是五个月前第一次援皖行动流产以后实行的补救措施，仍然有成功的可能。但李、杨联军攻到湖口城东，九江业已在望的时候，李秀成因为谋求浙江，突然撤军东走，影响到杨辅清势孤力单无法再进，迂回援皖的进军计划又一次流产。

因李秀成退军行动匆促，连乘虚突袭曾国藩大营活捉曾国藩的机会也放过了。据说当李秀成领兵经过皖南祁门附近的洋栈岭时，设在祁门的湘军曾国藩大营一片混乱，文武幕僚纷纷逃亡，祁门异常空虚。曾国藩也写好遗书，准备一死。可是李秀成却率部匆匆过境，驰经浙江常山过年去了。曾国藩侥幸得以逃生，这一险局在清军中曾传为笑谈，为曾国藩的一大耻辱。

第三次援皖行动，是在1861年初，安庆保卫战已到最后决战关头。而李秀成从浙江嘉兴到苏州准备到湖北招兵，此时天王严诏命领兵赴上游，支援安庆，但李秀成不从，仍坚持出师江西、湖北。天王盛怒。后经朝臣从中

周旋，天王又作出了李秀成等从江西三路上湖北南岸，英王陈玉成一路出湖北北岸，四路迂回进取武汉，逼湘军从安庆撤退的决策。这一战略部署显然是为了迁就李秀成上江西湖北招兵而作出来的，但仍然不失为一个颇有气魄并为湘军所惧怕的釜底抽薪战略。如果认真实施，还是有可能击败湘军救出安庆，从而稳定天京上游局势的。可惜又因为李秀成迷恋江浙而功败垂成。

这一次大迂回的战略决策，英王陈玉成是很认真执行的。他只用了十几天时间就从安徽翻越大别山，于1861年3月18日占领了距汉口东一百七十里的重镇黄州，准备接应南岸的李秀成会师武汉。而李秀成则因为在江西一路招兵，迟了两个多月于6月才到达湖北境内。而他到湖北后，即不攻武昌，又不渡江增援安庆，仍然是只顾招兵。

李秀成进入湖北境内时，极大地震动了清军。守备力量异常空虚的湖北省会武昌城内，官吏逃亡，百姓骚动，随时有城陷易帜的可能。在安庆前线督战的湖北巡抚胡林翼带病驰返武昌坐镇，并准备随时把围攻安庆的湘军全部调回湖北固守武昌这一根本之地。但出乎湘军将帅的预料，李秀成于6月15日兵至武昌境内并未攻城，而在招齐了三十多万新兵以后，突于7月9日又全部退出湖北，对这一惊心动魄的戏剧性事件，湘军方面直到天京沦陷审讯李秀成时



1862年6月，忠王李秀成召开军事会议，商议援救天京的办法

还心有余悸。曾国荃的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记有他审问李秀成时的一段对话：“余（指赵烈文。下同）又问：‘十一年（即1861年）秋，尔兵至鄂省南境，更进则武昌动摇，皖围撤矣，一闻鲍帅至，不战而退，何耶？’曰（指李秀成。下同）‘兵不足也。’余曰：‘汝兵随处皆是，何云不足？’又曰：‘时得苏州，而无杭州，犹鸟无翼，故归图之’……”（《赵烈文日记》）当时李秀成就是用从湖北、江西招来的兵，尤其是从广西转战回来的翼王旧部20余万精兵，如潮涌东进般去占取浙江全境。

曾国藩当时身任节制安徽、江西、浙江、江苏四省军政大权的钦差大臣，清朝政府和苏浙官绅同声呼吁他领兵东进救援江苏、浙江，但他坚持主攻方向毫不动摇。他认识到安庆战事是与太平军决战的主要矛盾，不但不派兵赴援苏、浙，而且连江西、皖南一带的精兵如主力鲍超等部，也从江西一带调往皖北安庆前线，他自己也把大营从皖南祁门调到安庆附近的水师船上。

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救安庆，是1861年，在曾国藩从江南岸调兵到江北，他自己亲临安庆前线，集中兵力对安庆发动最后总攻击的时候，太平天国的英王陈玉成眼看到安庆保卫战已经到了最后的决战关头，他亲自驰返天京向天王禀陈安庆决战胜负将直接关系到天国的安危兴亡，请求紧急派兵增援。天王首先想到拥兵大户李秀成，派朝中重臣千王洪仁玕赶赴浙江向李秀成求援，却不料遭到刚从湖北、江西招得五六十万精兵的李秀成的拒绝。据洪仁玕三年后被俘写的《自述》回忆到这件事时，他说，当时李秀成说：“天朝有了苏、浙，可以高枕无忧。”洪仁玕当即反驳李秀成：“自古取江山，屡先西北而后江南，……况江之北，河之南，自古称为中州渔米之地，前数年所恃无恐者，实赖有此地屏藩资益也。今弃而不顾，徒以苏浙繁华之地，一经挫折，必不能久远。今殿下云有苏浙可以高枕无忧，此必有激之谈，谅殿下高才大志，必不出此也。殿下之言，非吾所敢闻也。”（《洪仁玕自述》）而李秀成仍一味搪塞，一心进军浙江，坚决不肯派兵救援安庆。结果当李秀成挥其百万雄师如潮涌入浙江的时候，皖北安庆城下陈玉成

军血战经年业已精疲力竭。

第五即最后一次拒绝赴援皖北，是英王陈玉成在安庆战后率领残部退守庐州，为天京保守这一最后屏障，从1861年8月坚守到1862年5月，牵制住攻克安庆的湘军，使湘军在这九个月中迟迟不敢进攻天京。在这关系天国大局的战役中，李秀成只顾取杭州、战上海，而不派一兵一卒去增援庐州，以致庐州失守，陈玉成牺牲。在庐州失守17天后，曾国荃即率领湘军水陆进抵天京城下。

到了天京又一次陷入包围，李秀成才惊恐起来，赶紧调动兵力救援天京城。以前天京曾经有两次解围战，但那两次（1856、1860年）反包围战都有陈玉成参加指挥，得以取得消灭敌军为天京解围的大胜。这一次救援天京之战，由于失去了陈玉成的组织指挥，李秀成虽然在曾国荃的湘军刚到天京三个月，立足未稳并且疫病流行的情况下，率领60万大军投入战斗，但大战45天后，终未能赶走仅有2万人的湘军。此时太平军已军心涣散，诸王以衣单缺粮为借口纷纷离散，解围战以失败告终。

李秀成未能解天京之围，两个月后他又率领20多万大军渡江“扫北”，希图收复皖北失去的地方，但到六安而兵败退回时，兵员已损失了百分之八九十，想远离帝国主义洋枪队而从沿海转到内地的梦想也落了空。到这时，李秀成才看到迷恋苏浙坐视陈玉成苦战皖北而不救援的错误，他的百万大军已经分崩离析各奔前程去了。

由于百万大军统帅李秀成“顾己不顾人，顾私不顾公”，向天王闹独立分裂，拥兵自重和敛聚私财的结果，以致他的部下离心叛变，尤其是他的亲信大将纳王郅永宽裹挟李部嫡系精兵十余万人把苏州完整地奉献给李鸿章，最终彻底搞垮了李秀成。李秀成在吃过曾国藩的临别赐宴后，说了几句“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两手空空地走向人生终点，赫赫威风的百万大军统帅与百万家财富豪，最终也只落得财空、兵空、命丧，这大约是他当初绝没有料到的。

（责任编辑 方 徨）



爱国团结
弘扬中华文化
求实存真
秉笔直书今古大事

欢迎订阅
2001 年

炎黄春秋

《炎黄春秋》自 1991 年创刊以来，高举爱国大团结的旗帜，秉笔直书今古中外大事。不增美，不益恶，坚持求实存真。

《炎黄春秋》拥有大批高水平作者。有的是老革命家，重大革命事件的亲历者；有的是资深专家学者，对重大事件和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2001 年订价每期仍为 4.80 元。全国各地邮局(所)均可订阅。在邮局订阅不便者，可向本刊发行部邮购，不另收邮费。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李秀成百万家财和百万大军的烟消云散

1948年震惊上海的“一·二九”事件

讨回公道耗我42年时光

洪湖赤卫队主角原型钱瑛

一个黄埔生的校园生活回忆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09>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581/K 邮发代号: 82-307 定价: 4.80元